学 校 代 码 10459
学号或申请号 201712092011576
密 级

郑州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晁说之经学思想研究

作 者 姓 名：张文娟
导 师 姓 名：魏涛 副教授
学 科 门 类：历史学
专 业 名 称：中国古代史
培 养 院 系：历史学院
完 成 时 间：2020 年 6 月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Study of Chao Yuezhi's Thoughts of Confucian Classics

By Wenjuan Zhang

Supervisor: Prof. Tao Wei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School of History

June 2020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张文娟

日期：2020 年 6 月 9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及相关的职务作品，知识产权归属郑州大学。根据郑州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郑州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本人离校后发表、使用学位论文或与该学位论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成果时，第一署名单位仍然为郑州大学。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张文娟

日期：2020 年 6 月 9 日

摘要

晁说之学识广博，对《易》《春秋》《诗经》和《四书》学等均有所研究，然学术界在研究晁说之时往往偏重于分析其诗文而忽略其于经学上的成就。对其经学思想展开研究，是全面把握宋代经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经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

晁说之的经学著述具有“博极群经”和“散失几尽”的特点。于《易》学，他作有《古周易》《易规》《易玄星纪谱》等著述，不仅主张恢复古《周易》、反对以己意注解《周易》还提倡将《周易》和《太玄》相参；于《春秋》学，他在《儒言》《辩诬》《三传说》等著述中，不仅借用《春秋》议论时政还从经的角度评析三传的得失；于《诗经》学，他在《诗之序论》和《答贾子庄书》等著述中，不仅怀疑《诗序》作者和内容还主张借用《春秋》解释《诗经》；于《四书》学，他对《论语》《孟子》《中庸》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尊信《论语》却抵制《孟子》，在释读《中庸》的同时又指出《中庸》文本的错乱之处。可以说，无论是他的《易》学思想、《春秋》学思想还是《诗经》和《四书》学思想，都具有博采众家和尊而有疑的特点，也正因如此，他的经学思想尤其是《易》学和《诗经》学的部分观点对后世学者仍具有较大影响。

略观晁说之的经学人生，他始终坚守着特立独行、成一家之说的学术和人生的态度，其经学思想的影响和价值不容小觑，他理应是中国经学史上尤其是《易》学和《诗经》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位学者。

关键词：晁说之；宋代；经学思想

Abstract

Chao Yuezhi was a knowledgeable person, not only study the Yi-ology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Theory, but also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Four Books(*Daxue*, *Lunyu*, *Zhongyong*, *Mengzi*).However, whe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tudied him, they mainly analyzed his poems and essays, but ignored his achievements in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ing his ideolog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t is an indispensable work to fully grasp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e entir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China.

His Confucian Classics writings involve almost all Confucian Classics, but unfortunately most of them are lost. As for the Yi-ology, he has written articles such as *Ancient Zhouyi*, *Yigui*, *Yixuanxingjipu* and so on. He advocated the restoration of ancient *Zhouyi*, oppos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Zhouyi* with own understanding, and agre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Zhouyi* and *Taixuan.* As for the Spring and Autumn Theory, in his writings such as *Ruyan*, *Bianwu*, *Sanzhuanshuo,* he not only borrowed the philosophies in *Spring and Autumn* to discuss the current affairs, but also commented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Zuozhuan* and *Spring and Autumn Gongyangzhuan* and *Spring and Autumn Guliangz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ring and Autumn*. As for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his writings such as *Shizhixulun,Dajiazizhuangshu,* he not only doubted the author and content of *The Preface to the Poetry* but also advocated borrowing the records of *Spring and Autumn* to explain *The Book of Songs*. As for the study of the *Four Books,* his attitude towards *Lunyu Mengzi Zhongyong* were completely different, he respected *Lunyu but* resisted *Mengzi,* and annotated *Zhongyong* while also proposing that there were wrong texts in *Zhongyong*. It can be said, both his the Yi-ology of thoughts, the Spring and Autumn Theory of thoughts,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Four Books of thoughts have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widely absorbs and draws on the doctrines of others, but also doubts the Confucian Classics while respecting Confucian Classics. And

because of this, his Confucian Classics thoughts especially that some of his viewpoints on the Yi-ology and o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still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ake a brief look at his life on Confucian Classics, he always insisted on a unique thoughts and determined to form their own unique doctrine. The influence and value of his Confucian Classics thoughts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he was a person who could not be ignor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especially the Yi-ology and on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Keywords: Chao Yuezhi; Song Dynasty; thoughts of Confucian Classics

目录

绪论.....1

一 选题目的和意义.....1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1

三 解决的主要问题.....7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8

五 创新之处.....9

第一章 晁说之生平及经学著述概况..... 10

第一节 晁说之生平.....10

一 入仕治学（1059-1082）.....11

二 官场浮沉（1082-1126）.....13

三 避难漂泊（1126-1129）.....16

第二节 晁说之经学著述概况.....18

一 博极群经.....18

二 散失几尽.....22

第二章 晁说之的《易》学思想.....24

第一节 主张恢复古《周易》.....24

一 今《易》皆非古《易》.....24

二 稽考古《周易》.....27

第二节 反对以己意注《易》.....28

一 论应、位、承乘.....29

二 论中正、卦主.....34

三 论三才、卦象、卦变、卦德.....37

第三节 主张《易》《玄》相参.....40

一 《易》《玄》相通.....40

二《玄历》《玄图》合谱.....43
第三章 晁说之的《春秋》学思想..... 47
第一节 借《春秋》论时政.....47
一 对内：尊一王之制.....48
二 对外：护“中国”之尊.....51
第二节 评三传之得失.....53
一《左传》之失“专而纵”.....54
二《公羊》之失“杂而拘”.....55
三《谷梁》失之随.....56
第四章 晁说之的《诗经》学及《四书》学思想..... 58
第一节 晁说之的《诗经》学思想.....58
一 论《诗序》.....59
二 以《春秋》解《诗经》.....63
第二节 晁说之的《四书》学思想.....65
一 尊信《论语》.....65
二 抵制《孟子》.....67
三 释《中庸》而不尽信《中庸》.....71
第五章 晁说之经学思想的特点及影响..... 75
第一节 晁说之经学思想的特点.....75
一 博采众家.....75
二 尊而有疑.....78
第二节 晁说之经学思想的影响.....79
一《易》学思想的影响.....79
二《诗经》学思想的影响.....80
结语..... 83

参考文献.....85

附录.....93

附录 A 晁氏《古周易》部分辑佚.....94

附录 B《论语正义》辑佚.....101

附录 C《中庸传》中直谓诚、明、忠恕、礼等为中处.....103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105

致谢.....106

绪论

晁说之质疑《诗序》，主张恢复《古周易》，尊崇《春秋》，作《诋孟》怀疑孟子等，被黄宗羲评价为“经学奥衍，不肯苟同笺疏，自成一家。”[①]其经学思想是宋代经学史乃至整个经学史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他更是北宋疑经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一 选题目的和意义

第一，学术界对晁说之进行研究时偏重于研究其诗歌或散文，对其经学思想的研究较少，然其经学思想既具有北宋疑经的典型特征，又有自己的学术特色，故梳理和分析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可以窥探北宋疑经思潮的特征，也可了解其经学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影响等，有利于对晁说之进行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第二，在分析晁说之经学思想的过程中，不仅阐述其经学思想的内容，还对其与邵雍、司马光等人的学术渊源进行探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其经学思想的学术路径和学术脉络。

第三，希望借此引起学术界对史书中非著名人物的重视。由于《宋史》未为晁说之立传加上其著述散佚严重，使得学术界对晁说之尤其是经学思想的研究甚少。但，在对其经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其学术影响是不能忽视的，故对晁说之的经学思想进行研究也是想尽绵薄之力呼唤学术界在研究如欧阳修这类知名度较高的古代学者的同时，也要去关注一些像晁说之这样在史书中非著名但对学术界影响力不容忽视的人物。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晁说之平生著述甚富，但经靖康之乱，大多亡佚。后经其孙晁子健辑遗亡

①（清）黄宗羲、全祖望著，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896 页。

复编为十二卷，后又续广为二十卷，今存有两个版本：一是《四库全书》本的《景迂生集》二十卷；二是《四部丛刊续编》著录的《嵩山文集》二十卷，后附有张元济跋及卷三《负薪对》的校勘表。可以说，这两个版本的文集是研究晁说之思想最基本的文献资料。另外一些关于晁说之的史料记载则大多零散的分布于宋代的笔记小说中，例如《渭南文集》《邵氏闻见录》《容斋随笔》等等。著作的散佚和史料的零散正是现代学术界对晁说之研究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纵观国内外关于晁说之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家族研究。即在研究晁氏家族时，简要介绍晁说之的经学思想。二是群体研究。将晁说之作为宋代经学史上的代表人物，特别是研究宋代疑经思潮时会提及晁说之的经学思想。三是个体研究。对晁说之个人研究时，或多或少对晁说之的经学思想进行论述。

1. 家族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晁氏家族的研究成果颇丰，无论是著作性研究还是论文性的研究都是十分丰富的，大多是对晁氏家族的世系、师友关系、文学成就以及学术思想进行研究，书中或文中有部分章节对晁说之进行介绍，有时会提到晁说之的经学思想。

关于晁氏家族的著作性研究，主要有刘焕阳的《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①]和《晁补之与宋代晁氏家族》[②]、何新所的《昭德晁氏家族研究》[③]、张剑的《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④]、张兴武的《两宋望族与文学》[⑤]、李朝军的《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⑥]、刘焕阳和刘京臣的《宋代巨野晁氏家族文化研究》[⑦]，但这些著作大多偏向于晁氏家族的文学成就，故对晁说之经学思想的论述比较少。如刘焕阳的《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对宋代晁氏家族的世系、学行、交游、学术贡献、文学成就等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其中，在第三章和第五章对晁说之著述进行了简要介绍还以其现存著述为基础对他主张恢复古《周易》、怀疑《诗序》以及疑孟的思想

① 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 年。
② 刘焕阳：《晁补之与宋代晁氏家族》，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年。
③ 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④ 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年。
⑤ 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⑥ 李朝军：《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⑦ 刘焕阳、刘京臣：《宋代巨野晁氏家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进行了概述。何新所的《昭德晁氏家族研究》中第三章第三节“学术史、思想史与政治史的互动——晁说之的经学思想研究”则是从家族家学、师友渊源、新旧党争的角度剖析晁说之的学术思想及其历史价值所在，对于进一步研究晁说之的经学思想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同时文中提到了晁说之与司马光具有师承关系，主要认为二者在政治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即对荆公新学不满。张兴武的《两宋望族与文学》在第四章论述“昭德晁氏”博学儒雅、笃信释老的家学传统，书中对晁说之《儒言》的评析则沿袭了四库馆臣的观点，认为是抵王安石所作，还指出《晁氏客语》参杂着儒、道、释的味道。虽然本书未涉及晁说之经学思想的内容，但却对进一步了解晁说之有着很大意义。

进入 21 世纪关于晁氏家族的论文性研究直线增加，主要集中于研究家族文学方面，所以很少涉及晁说之经学思想方面的内容。这类论文中仅有两三篇学术论文或学位论文对晁说之经学思想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论述。马纳、马斗成的《宋代澶州晁氏家学试探》[①]在介绍“经史传家”时简略提及晁说之喜读经史，尤精于《易》学，并指出晁说之的读书方法和次序。何新所的《宋代昭德晁氏家族文化传统研究》[②]则是在论述晁说之佛教思想的时候提到他经学思想受司马光的影响，通五经，尤精于《易》，但并未展开论述。滕春红的《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③]第六章是晁说之专论，对晁说之的生平、诗歌、散文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文中有一段关于晁说之大概的经学思想的论述，指出晁说之是司马光《太玄》之学的传人，但并未论证其中的渊源。陈伟的《宋代晁氏家族散文史论》[④]第二章对晁说之的散文进行论述，并根据散文分析晁说之的学术思想，指出其对学术自由的崇尚尤其反对王安石的“一经之学”的思想特点。

总而言之，家族研究的著作或论文的重点一般是研究整个家族，故对家族成员的个体研究是十分单薄的。而关于晁氏家族的研究更是集中于家族的世系、文学成就方面，对学术思想乃至经学思想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2. 群体研究

虽然《宋史》中没有为晁说之立传，然依旧掩盖不住他在宋代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学术界在研究宋代疑经思潮尤其是疑孟思潮时往往会提及晁说之的

① 马纳、马斗成：《宋代澶州晁氏家学试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② 何新所：《宋代昭德晁氏家族文化传统研究》，《中州学刊》2006 年第 1 期。
③ 滕春红：《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6 年。
④ 陈伟：《宋代晁氏家族散文史论》（硕士学位论文），鲁东大学，2009 年。

经学思想。论述疑孟思潮时提及晁说之的论文是较多的，如陈寒鸣的《宋儒孟子观论述》[①]、李传印的《历史上的尊孟与非孟思潮》[②]、夏长朴的《尊孟与非孟——试论宋代孟子学之发展及其意义》[③]、龚来国的《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④]、周淑萍的《两宋孟学研究》[⑤]、杨世文的《宋代经学怀疑思潮研究》[⑥]、张荷群的《北宋孟子学案》[⑦]、颜复萍的《北宋疑孟思想的探究》[⑧]、孔卿的《试探北宋非孟者的非孟动机》[⑨]、岑贞霈的《宋代疑孟索考》[⑩]等。其中，陈寒鸣的《宋儒孟子观论述》主要论述了宋儒对孟子的各种态度和观点，在述论“疑孟”和“非孟”中提到晁说之作《诋孟》非难孟子之事。龚来国的《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重点是介绍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所以对晁说之的介绍十分简略，主要提及晁说之的非孟文章——《奏审皇太子读<孟子>》。李传印的《历史上的尊孟与非孟思潮》则引用周密《癸辛杂识》中对晁说之因非孟言论而致仕回家的事。张荷群的《北宋孟子学案》肯定了晁说之是宋代疑经史上的重要人物，认为晁说之对孟子有关问题的怀疑主要受司马光影响，并指出与司马光比较而言，晁氏对《孟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记载内容失实的考证及孔孟、《论语》《孟子》不当并称等两方面而未涉及孟子的仁政、心性等问题，论文的最后言明晁说之对孟子的态度与王安石及其新学有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本文对晁说之疑孟思想的评述比较正确，然缺乏条理性，尤其是将晁说之文集中关于孟子及其《孟子》的文章未加分析便罗列于正文中显得空泛。颜复萍的《北宋疑孟思想的探究》简短提及了晁说之的疑孟思想，认为晁说之在政见和学术思想上大抵受司马光的影响，又认为晁氏的疑孟思想缺乏是司马光那样坚实的心性论基础，更多染上了党争的色彩，然而本文仅做了结论式的评述并没有过多论述。杨世文的博士学位论文《宋代经学怀疑思潮研究》则主要是对宋代经学怀疑思潮研究，在讲述宋代“非孟”时提及晁说之，

① 陈寒鸣：《宋儒孟子观论述》，《中国哲学史》1997 年第 1 期。
② 李传印：《历史上的尊孟与非孟思潮》，《文史知识》2001 年第 12 期。
③ 夏长朴：《尊孟与非孟——试论宋代孟子学之发展及其意义》，姜广辉：《中国哲学》第 24 辑《经学今诠三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
④ 龚来国：《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0 期。
⑤ 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4 年。
⑥ 杨世文：《宋代经学怀疑思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5 年。
⑦ 张荷群：《北宋孟子学案》（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5 年。
⑧ 颜复萍：《北宋疑孟思想的探究》，《名作欣赏》2012 年第 5 期。
⑨ 孔卿：《试探北宋非孟者的非孟动机》，《绥化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1 期。
⑩ 岑贞霈：《宋代疑孟索考》（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4 年。

指出其文《辩诬》、《申刘》等都含有“非孟”思想。论述疑孟思潮时提及晁说之的著作主要有叶国良的《宋人疑经改经考》[①]、黄俊杰的《中国孟学诠释史论》[②]、杨新勋的《宋代疑经研究》[③]、周淑萍的《两宋孟学研究》[④]、杨世文的《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⑤]、夏君虞的《宋学概要》[⑥]等等。其中，《中国孟学诠释史论》主要论述了司马光、李觏的疑孟思想，对晁说之的介绍仅是只言片语。《宋学概要》上编第四章论述宋儒对孟子之态度时也只是简单提及司马光与晁说之都反对孟子。由此可见，由于研究宋代疑孟思潮时的重点是这些有疑孟思想的群体而非某个个体，所以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仅是将晁说之看做群体中的一员而已，不会做过多论述。

除了论述宋代疑孟思潮的著述外，有些论述宋代《易》学的论文或著作也会涉及到晁说之的《易》学思想，如舒大刚的学术论文《试论宋人恢复古周易的重要意义》[⑦]认为晁说之的《录古易》不仅是复古《周易》的重要成果，也是研究《易》学史不可忽视的内容。杨世文的博士论文《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在讲述《周易》经传的辨疑中提到晁说之注《录古周易》时将经传十二篇合并为八篇，认为他的做法本意不在于区分经传、恢复古《易》原貌，而在于排列经传次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已将其博士论文作为著作《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的主体部分，并对部分内容做了调整和补充，所以参考时可以著作为主。王铁先生的《宋代易学》[⑧]对论述两宋重编“古易”时指明晁说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学者，随后对晁说之所作的《易规》和《易玄星纪谱》做了相对具体的分析，是研究晁说之《易》学思想的鼎力之作。杨新勋的《宋代疑经研究》第二章是北宋疑经述论，其中第四节讲的是李觏、司马光和晁说之的疑经，指出晁说之的疑经思想主要是怀疑《诗序》《周礼》和抵议《孟子》，此外还改定过《周易》和《礼记·中庸》，本书也对晁说之的经学思想的论述比较清晰，但缺少晁说之《春秋》学方面的论述，而且对其《易》学思想的论述

① 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80 年。
② 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③ 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④ 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⑤ 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年。
⑥ 夏君虞：《宋学概要》，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 年。
⑦ 舒大刚：《试论宋人恢复古周易的重要意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⑧ 王铁：《宋代易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仅涉及改定《周易》，这也给我们一些补充和完善研究的机会。

另外，一些论述宋代《诗经》学思想的文章亦或多或少提及晁说之的《诗经》学思想，如李立红的硕士论文《宋儒关于<诗序>问题的争议及其研究》[①]指出晁说之的《诗之序论》力抵《诗序》的缺陷和不足。李冬梅的博士论文《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②]在“《诗序》论”一章提及晁说之对《诗序》作者的辨析，其学术论文《大胆怀疑 勇于创新——浅谈宋代的<诗经>学文献》[③]将晁说之列为“废序派”，并重申晁氏否定《诗序》作者为子夏的观点。

总之，由于群体性研究面向的是群体，故对个体只能是简单介绍而不能详细论述，这是群体性研究显著的特点。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学者在群体性研究过程中提到的重要观点或者重要文献，它们对于我们现在或以后的研究往往具有启发性的指导意义。

3. 个体研究

目前，仅有一部著作将晁说之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即张剑的《晁说之研究》[④]，这本书探讨了晁说之的世系、人生、个性、学术、诗歌、散文等。其中第四章有晁说之的经学思想的论述，如对说之改定《周易》进行论述并分析其求实的学术观，对其非孟思想展开论述并分析其尊古的学术观。

而以晁说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则大多集中于研究其诗歌或者散文上。张庆研的硕士学位论文《晁说之诗歌研究》[⑤]在引言部分对近年来晁说之诗歌研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晁说之诗歌创作背景、思想内容以及艺术价值等进行剖析，此外，还对其诗学观及其对诗坛的影响做出了适度阐释。可以说，这篇论文是研究晁说之诗歌时不能忽视的。除了对晁说之诗歌、散文之类的研究外，亦有几篇论述晁说之经学思想的论文，如江口尚純的《晁說之の詩序批判--王安石の詩經學との關わりに於いて》[⑥]、张剑的《求实与尊古——晁说之学术思想及其意义》[⑦]、裴亚兵的《晁说之专题研

① 李立红：《宋儒关于<诗序>问题的争议及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7 年。
② 李冬梅：《宋代<诗经>学专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7 年。
③ 李冬梅：《大胆怀疑 勇于创新——浅谈宋代的<诗经>学文献》，舒大刚：《宋代文化研究》（第 19 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 年。
④ 张剑：《晁说之研究》，北京：学苑书社，2005 年。
⑤ 张庆研：《晁说之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7 年。
⑥ 江口尚純：《晁說之の詩序批判--王安石の詩經學との關わりに於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1990 年第 7 号。
⑦ 张剑：《求实与尊古——晁说之学术思想及其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4 年第 3 期。

究》[①]、桂枭的《宋代党争与<诗经>学转型——晁说之<诗经>学考论》[②]等等。其中，《晁说之专题研究》分为晁说之交游考、晁说之集版本源流考、晁说之学术论析、晁说之影响四个专题对晁说之进行了研究，其中“晁说之交游考”一章内容最多，对晁说之的交游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分别按司马光集团人物、苏门人物、师友、门生弟子、后辈、释林人物、亲族分类，考证了晁说之的交游事迹，以诗歌、碑铭、书信等为线索，理清了相关人物交游关系，探讨重要人物之间在文学、思想和学术上的相互影响。第三章主要对晁说之的《春秋》学思想进行了研究，从“尊王”、“攘夷”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晁氏的《春秋》学思想，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宋代党争与<诗经>学转型——晁说之<诗经>学考论》对晁说之关于《诗经》的论述进行分析，探析其独特的《诗经》学的理路，并从学术和政治的角度考论他与王安石新学之间的争论，此前学者对晁说之的《诗经》学思想大多集中于其对《诗序》的质疑，而桂枭先生除了分析其质疑《诗序》也指出他“约《春秋》为《诗》”的《诗经》学思想，可以说，这篇文章打开了研究晁说之《诗经》学思想的新局面。

然而，这类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晁说之经学的某一点进行研究，未综合论述晁说之的经学思想，这也是本文选题的重要缘由和出发点。

（二）当前研究的不足

目前关于晁说之经学思想的论述过于散乱，而且研究内容有些单薄。这些研究大多零碎的散落于晁氏的家族研究中或者疑经思潮代表人物的论述中，研究的内容大多集中于其疑孟思想上。即使是专门研究晁说之的经学思想也只是集中于对某一点的论述，缺少综合性的论述。

另外，学者在分析晁说之与司马光的学术渊源时大多只看到二者在疑孟思想上的师承关系，对二者其他方面的学术渊源并未做过多的分析和研究。故需要进一步探究和分析二者的学术渊源。

三 解决的主要问题

晁说之作为北宋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对他进行研究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

① 裴亚兵：《晁说之专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5 年。
② 桂枭：《宋代党争与<诗经>学转型——晁说之<诗经>学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18 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年。

补充宋代经学史，有利于探讨和分析宋代晁氏家族的学术传承，更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宋代文人的文化诉求和精神面貌。所以，研究晁说之的经学思想对于掌握中国古代经学思想史的整体脉络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立足于文献，对晁说之的经学思想进行进一步分析和论述，勾勒出晁说之经学思想的大致面貌。第二，尝试在解读晁说之经学思想的同时分析出其与司马光、邵雍等人的学术渊源以及晁说之本人经学思想的特点和对后世的影响。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基本思路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研究综述，主要对近些年来关于晁说之研究的著作和学术论文进行总结，并分析当前学界关于晁说之经学思想研究的优点和不足。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晁说之的生平及著作，希望在分析其经学思想前对其人和其书有一个相对立体的把握。第三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从《易》学、《春秋》学、《诗经》学以及四书学等角度对晁说之的经学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并试图分析其经学思想渊源。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和总结晁说之经学思想的特点和学术影响，体会其经学思想的独特性。最后对晁说之散佚的著作《古周易》和《论语正义》进行部分辑佚工作。

（二）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比较法。

文献研究法。笔者查阅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原始资料主要以流传下来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景迂生集》二十卷、摛藻堂四库荟要本的《景迂生集》二十卷、《四部丛刊续编》著录晁说之《嵩山文集》二十卷、《宋元学案》以及北宋的笔记小说为主要材料，考证言论真伪，并结合当今学者的研究，梳理晁说之的经学思想，以期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可以将晁说之的经学思想较为完整的呈现出来。

分析综合法。通过分析晁说之现存的经学著述了解其经学思想的内容、特点及影响。

比较法。在解读晁说之经学思想的同时分析其与司马光、邵雍等人的师承

关系及其个人思想的独特性。

五 创新之处

第一，对以往学术界关于晁说之的著作和学术论文进行了搜索和梳理，进一步回顾和反思。由于以往学术界对晁说之的经学思想的论述是比较散乱的，不利于综合性的分析和研究，故本文将对晁说之的经学思想进一步考察和论述，勾勒其经学思想的大致面貌。

第二，最具特色的地方是在探讨晁说之经学思想的同时兼论其与司马光、邵雍等人经学思想的学术渊源。虽然以往学术界也提及到晁说之与司马光的师承关系，但并未做细致的考察，故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究和考察。

第三，在附录部分将对晁说之的《古周易》和《论语正义》进行部分辑佚，虽没有涉及任何学术分析和论述，但这样可以方便学者查阅和研究，为后来的学者研究提供一定的便利。

第一章 晁说之生平及经学著述概况

《孟子·万章下》中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①] 孟子提出了经典解释的一个重要原则——知人论世。对晁说之的生平及经学著述进行简要介绍，是研究晁说之经学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大致把握和了解了晁说之其人和其书，才能对晁说之有一个整体印象，也才能以此为基础去分析和研究晁说之的经学思想。

第一节 晁说之生平

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一字伯以[②]，开封（今河南开封）人[③]。因仰慕司马光为人，自号景迂生。其家族是宋代著名的文学世家——晁氏家族，其高祖晁迥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藏书家。他于元丰五年（1082）登进士第，此后浮沉于官场，建炎三年（1129）卒于金陵，时年七十一岁。他一生致力于学术，所著甚丰，虽存之者百无一二，然后世学者对其学术评价颇高，如陆游在《景迂先生祠堂记》中认为其学“深且博”“卓乎独立，确乎自信，虽引天下而与之争，不能夺。卒成一家之说，与诸儒并传”。[④]全祖望在《景迂先生船场祠堂碑铭》中写到：“先生经学奥衍，不肯苟同笺疏，自成一家，诚如放翁所言。”[⑤]钱钟书在《容安馆札记》中指出：“以道博览深思，为一门白眉……谈艺论道皆矫然自异，可谓特立独行，和而勿同者。”[⑥] 陆、全、钱三位先生身处迥然有别的时空中，然对说之评价可谓是文异而义同，三人一致认为说之知识广博且学术自成一家。

由于《宋史》中未为晁说之列传，故勾勒其一生只能根据《嵩山文集》及

①（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91 页。

② 陆游《景迂先生祠堂记》和《宋元学案·景迂学案》中的《詹事晁景迂先生说之》均为“伯以父”，盖误写。

③ 关于晁说之的籍贯问题，张剑先生在《晁说之研究》“年谱”那一章已有论述，认为晁说之出生于开封，具体可见张剑：《晁说之研究》，2005 年，第 83 页。

④（宋）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38 页。

⑤（清）黄宗羲、全祖望著，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 2 册），1986 年，第 896 页。

⑥ 钱钟书：《容安馆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169-3170 页。

其他学者的文集将他的一生大致分为入仕治学、官场沉浮和避难漂泊三个阶段。

一 入仕治学（1059-1082）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晁说之生于开封。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其父晁端彦官提点淮南东路刑狱，时年十五岁的晁说之与父同居淮南，在此期间结识《资治通鉴》的编修作者之一——刘恕，说之在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写的《与刘壮舆书》一文中提及此事，说："每念十五、六时，在淮南。吾先君尝令立侍先丈之侧，蒙戒告：无从妖学，无读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①]这里的"妖学"和"妖言"指的是王安石新学。刘恕所言对晁说之产生了深远影响，说之虽于元丰五年（1082）试新经义入仕，然中道改路决心脱去科举事业而为五经之学，后在大观年间年已五十仍不忘此言，可谓铭记于心。另外，晁说之亦多次对王安石新学表示不满，如在《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中指出《三经新义》中有"诬经害教，足以病学者"[②]之说。

熙宁七年（1074）晁端彦改任两浙提刑，其友苏轼时官杭州通判，二人曾在此期间同游西湖，有苏轼《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③]一诗为证，此时说之亦随父居，故得以拜见苏轼，说之后来作《东坡先生画像赞》时回忆此事，说："幼而见公浙江兮，知其议论不容于国中也。"[④]而自熙宁七年之后，说之与苏轼的关系可谓是亦师亦友：苏轼曾以说之"文章典丽可备著述荐之"[⑤]，并写有《书晁说之<考牧图>后》《答晁以道索书》[⑥]等诗篇；而说之所作的《题六一东坡像》《题东坡诗》[⑦]《东坡先生画像赞》等诗篇则大多表达了他对苏轼的敬重之情。其中《东坡先生画像赞》的上篇回忆和叙述了不同时期见苏轼的情景："幼而见公浙江兮，知其议论不容于国中也。壮而见公中都兮，知其难合而必不久容也。及其南迁泣别隋岸兮，惜乎不克保厥躬也。今公遗像忽相逢兮，喜公不死亦复如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与刘壮舆书》，《四部丛刊续编》影旧抄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 29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第 38 页。
③（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644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东坡先生画像赞》，第 14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十后杂文《题嵩阳景迂生文集后》，第 6 页。
⑥（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1982 年，第 1966、2748 页。
⑦ 参见（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九《题六一东坡像》，第 25 页以及卷十八《题东坡诗》，第 24 页。

梦也。”所见均有悟，所悟亦有情，可见二人感情至深。而下篇所言“世五百年，生命世才。嗟嗟东坡，何时复来”[①]更是直抒他对苏轼的尊敬与怀念。此外，他还写《太刚辩》[②]与质疑苏轼《刚说》的人进行辩论，亦从侧面表达了他对苏轼的维护和尊敬。

元丰五年（1082）二十四岁的晁说之试新经义，登进士第。然因其不满王安石新学所倡导的“义理必为一说，辞章必为一体”“专为一家章句”[③]，故中道改路，决意为五经之学，他“求之古人之书，稽之老成之论”[④]，如其于《易》学弃王弼《易》学，进而寻到《京氏易》等。这种不专为一家章句而为五经之学的思想对他的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贯穿其一生的治学思想和治学目标。他曾多次表达对“一经之士”的不满以及对五经并学的赞赏：

> 吾年三十而五经立矣，譬之不艺五谷而非上农，不殖百货则非大贾，今学者知自置于经师，而不知有人师，甘心为一经之师，名曰大义，而实以碎义困蹶。[⑤]
>
> 在昔汉时，六经各有名家之博士，并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为已多矣。今六经纷然，为一说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则一而经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讲合六经之说，恐不足尚也。[⑥]
>
> 五彩具而作绘，五藏完而成人，学者于五经可舍一哉？何独并用五材也邪？昔人斥谈经者为鄙野之士，良以此欤。汉武帝命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多《尔雅》之文，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必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经之士又如何哉？盖为师者专一经以授弟子，为弟子者各学群经于其师，古之道也。故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三十而五经立。[⑦]

他向往的是汉时六经“并行而不相排斥”的学术氛围，对宋时“甘心为一经之师”的学者以及王莽“讲合六经之说”嗤之以鼻，也正因如此，他在中道改路中“决意为五经之学”而非一经之学。而他在《答勾龙寿南先辈书》中所说“吾年三十而五经立”正是对“决意为五经之学”的回应，虽很难考证他在三十岁的时候立五经之学的真实性，然观其著作可知他确实通五经之学。他更是将不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东坡先生画像赞》，第 14、15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四《太刚辩》，第 16 页。
③ 参见（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第 36 页以及卷十七《太极传后序》，第 7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第 38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答勾龙寿南先辈书》，第 11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爻乱》，第 10-11 页。
⑦（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一经之士》，第 13-14 页。

专为一家章句而为五经之学视为其一生的学术追求。

可以说，晁说之入仕治学路上遇见刘恕和苏轼两位良师实属幸运，无须二人时时教导，只须一两句良言和善行的点拨便能影响一生，而他能将不专为一家章句而为五经之学作为学术目标更是与刘恕、苏轼这样的良师分不开的。

二 官场浮沉（1082-1126）

古之为官者，大多是宦海浮沉度一生，如家喻户晓且与晁说之亦师亦友的苏轼便是其中一位，他的仕途可用曲折回绕、起落无常来形容。与苏轼相仿，说之的仕途也是起落不定的。

元祐初，苏轼向朝廷推荐晁说之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随后说之官兖州司法参军，元祐三年（1088）说之在兖州初学京氏《易》，为了更好地理解《京氏易传》，曾据传为式作《京氏易式》[①]。后历任蔡州教授、宿州教授。绍圣五年（1098）年四十岁，说之遇洛阳杨贤宝得邵雍《易图》二，感悟出二图所指——“循环无方体者”[②]，后倾心于邵氏《易》学。元符三年（1100）改宣德郎知磁州县事兼兵马监押，在知磁州武安县时作有《朔问》二篇[③]，后在上《靖康元年应诏封事》时附于其后。四月上《元符三年应诏封事》言天下利害和政治得失，具陈十事[④]：其一曰祗德，其二曰法祖宗，其三曰辨国疑，其四曰归利于民，其五曰复民之职，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士得自致于学，其八曰广言路，其九曰贵多士，其十曰无欲速无好名高。建中靖国元年（1101）居磁州武安县作《古周易》和《易规》[⑤]十一篇，今《古周易》不存，仅存《题古周易后》一篇。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落邪中等，据其《靖康元年应诏封事》中所载：“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尝应诏有封事。蒙有司第臣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渐许仕宦……”[⑥]可知，在此期间，说之因落邪中等禁止入京城。从元祐初到崇宁元年这十几年间，晁说之从官兖州司法参军、蔡州教授、宿州教授、宣德郎

①《京氏易式序》中言：“说之元祐戊辰仲冬在兖州，初学京氏《易》，乃据其传为式，以便其私……”原文见《嵩山文集》卷十七《京氏易式序》，第 6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七《太极传后序》，第 8 页。
③ 此记于《靖康元年应诏封事》中，参见《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第 4 页。《朔问》两篇载于《嵩山文集》卷二，第 17-32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第 3 页。
⑤《题古周易后》文末记有“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嵩山晁说之题。”（《嵩山文集》卷十八《题古周易后》，第 3 页。）《易规》则记有“建中靖国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磁州武安县咸池轩。”（《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第 1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第 2 页。

知磁州县事兼兵马监押到因邪中等禁入京城，为说之在官场的一起一落。

崇宁元年（1102），晁说之改承议郎，知定州无极县。在知无极县期间政绩卓然，《无极县志》言："晁说之，嵩山人。宋崇宁元年知县，有惠政……政尚安静，敷惠于民，金时百姓亟称之。"[①]正因如此，金大定二十二年的无极知县冯翼"慕晁说之而法其政"[②]。此外，在崇宁二年（1103）的上半年说之还写有《娱山堂记》[③]和《爱萱堂记》[④]两篇杂记。然在下半年他却呈递弹劾自己的状文，辞官后领嵩山中岳庙祠禄，隐居嵩山，与刘壮舆的书信中曾回忆此事，他说："自中山无极投劾归……幸而圣治恩宽，使得食祠庙之禄……说之自是家嵩山下，颇适平昔之志，岁一入洛，省亲旧于司马公家及范淳甫家见先丈《外纪》《纪年》二书，叹息大儒用心何其博哉！至其论著处，如听上林之乐，铿锵闛鞳，洞心骇耳，不觉茫然自失。"[⑤]由此可知，说之在嵩山曾拜访司马光的家与范祖禹的家，见到刘恕所写的《通鉴外纪》和《五代十国纪年》二书赞叹不已。从崇宁元年知定州无极县到崇宁二年下半年辞官后隐居嵩山，是说之在官场的二起二落。

崇宁五年（1106）冬，四十八岁的晁说之得官监陕州集津仓。大观元年（1107）冬，领华山西岳庙祠禄，作《传易堂记》[⑥]。大观二年（1108）年春夏之交归新郑东里。在大观二年与刘壮舆的书信中他简要回忆了此段经历，他说："前年冬得官陕之河仓，去冬再蒙厚恩领祠庙，其授命时适有役解梁且棲薄，俟春夏之交宜道途时东归……"[⑦]这里，前年、去冬、春夏之交分别指的是崇宁五年、大观元年以及大观二年。从崇宁五年官监陕州集津仓到大观二年归新郑东里，此可为说之在官场的三起三落。

大观四年（1110）说之赴明州造船场，候潮浙江上，偶遇欧阳修第三子欧阳

① 耿之光、王桂照修，王重民纂：《无极县志》卷七《职官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05页。
② 耿之光、王桂照修，王重民纂：《无极县志》卷七《职官志》，第305页。
③《娱山堂记》文末载："崇宁二年癸未四月乙丑嵩阳晁说之记。"（《嵩山文集》卷十六《娱山堂记》，第3-4页。）
④《爱萱堂记》文末载："崇宁二年癸未夏六月戊辰承议郎知无极县事兼兵马都监武骑尉赐绯鱼袋晁说之记。"（《嵩山文集》卷十六《爱萱堂记》，第5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与刘壮舆书》，第28页。
⑥《传易堂记》文末载："大观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说之记。"（《嵩山文集》卷十六《传易堂记》，第12页。）
⑦（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与刘壮舆书》，第30页。

棐，与其相谈甚乐，期间二人追忆了邵雍的学术与品行[①]。到明州之后，作《易玄星纪谱》[②]，南宋吕祖俭作《晁景迂大观庚寅冬为四明船场。后七十余年，某适以仓氏之职至此间，而王兄季和亦来作景迂官，相与访问旧迹，尚有可改，偶成数语，简季和并呈叔晦》[③]一诗记有说之在明州船场之事。宋徽宗政和年间，说之仍在明州，然多留意佛教尤其是天台教，故写有许多与佛教或天台教相关的文章，如政和元年（1111）作有《跋东坡刚说》《纪赠法智诗序》《止观妙境辨正序》[④]等，政和二年（1112）作有《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序》《不二门指归叙》[⑤]等。政和四年（1114）说之五十六岁，通判鄜州。在鄜州留有《初至鄜州感事》《初至鄜州见月》《四明岁晚水仙花盛开今在鄜州辄思之此花清香异常妇人戴之可留之日为多》[⑥]等诗篇。政和五年（1115）在鄜州校证《京房易传》作《记京房易传后》，作《刘氏藏书记》，校毕《中庸传》[⑦]。政和六年（1116）据《京房易传》修定《京氏易式》作《京氏易式序》[⑧]。政和七年（1117）罢官归新郑东里，与叶梦得等人唱和。[⑨]从大观四年官明州船场到政和七年罢官东归，此为说之在官场的四起四落。

宣和二年（1120）冬至，说之为祭鼎阁差充太祝，后有成州之命。宣和四年

---

① 此事记于《康节先生谥议后记》中，见《嵩山文集》卷十八《康节先生谥议后记》，第11页。

②《易玄星纪谱后序》在《嵩山文集》中有两处，一处位于卷十，一处位于卷十七，二者的区别是卷十七文末标有“大观四年庚寅十有一月庚寅，甬江官舍，嵩山晁说之记”。见《嵩山文集》卷十七《易玄星纪谱后序》，第6页。

③（清）黄宗羲、全祖望著，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2册）1986年，第1682页。

④《跋东坡刚说》末载：“政和元年辛丑嵩山晁说之谨题。”（见于《嵩山文集》卷十八，第19-20页。）《纪赠法智诗序》末载：“政和元年十月庚申具位晁说之叙。”（见于《嵩山文集》卷十七，第14-15页。）《止观妙境辨正序》末载：“政和元年辛卯十一月癸未嵩山晁说之序。”（见于《嵩山文集》）卷十七，第11页。）

⑤ 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序》末载：“政和二年壬辰四月癸卯朝请郎飞骑尉赐绯鱼袋晁说之序。”（见于《嵩山文集》卷十七《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序》，第12页。）《不二门指归叙》末载：“政和二年壬辰五月癸亥嵩山晁说之序。”（见于《嵩山文集》卷十七《不二门指归叙》，第13页。）

⑥ 分别参见（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四《初至鄜州感事》，第35-36页；卷六《初至鄜州见月》，第33页；卷七《四明岁晚水仙花盛开今在鄜州辄思之此花清香异常妇人戴之可留之日为多》，第3-4页。

⑦ 分别参见（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记京房易传后》，第3-7页；卷十六《刘氏藏书记》，第14-17页；卷十二《中庸传》，第1-22页。

⑧（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七《京氏易式序》，第6-7页。

⑨ 见王兆鹏：《两宋词人年谱·叶梦得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73-177页。

（1122）时为朝请大夫、知成州军事，到成州之后先后为纪念杜甫所修建的濯凤轩、杜工部祠堂、发兴阁撰文写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濯凤轩记》《发兴阁记》[①]三篇碑文，成为了解杜甫草堂比较重要的历史文献。随后因减免受旱灾百姓的税收遭到转运使的督责，乞宫观，然不与，故乞放罢东归。[②]宣和七年（1125）已居新郑东里。从宣和二年差充太祝到宣和六年致仕东归，此可为说之在官场的五起五落。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二月说之应诏封事，上书《靖康元年应诏封事》[③]直言天下利害，主要言二事：一言河间、中山、太原三镇之形势，指出不能割弃之必要性；二愿钦宗弃用谄谀大奸之人，任用贤能之士。五月，以著作郎召，迁秘书少监兼太子左谕德。六月，免试除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上《奏审覆皇太子所读<孝经><论语><尔雅>劄子》[④]请废《孟子》，钦宗从之，然遭士大夫和太学诸生的反对，如侍御史胡舜陟曾上书，说："臣恐此说一传，惑天下学者，使后进相习成风，妄出臆见，抵经诮史，无所不至，害教甚矣。愿陛下诏东宫官依旧例先读《论语》，次读《孟子》。说之知识乖陋，岂宜辅道春宫？亦乞睿罢太子詹事，奉圣旨东宫依旧读《孟子》。"[⑤]正因与多数官员政见不合，说之又被罢，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从靖康元年二月应诏封事到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再到被罢，此可为说之在官场的六起六落。

三 避难漂泊（1126-1129）

靖康元年（1126）九月，完颜宗翰率领的西路金军攻克太原后于十一月向汴京进攻。说之听闻金军将至，遂觅舟东下至睢阳，然睢阳河水有冰冻断流使舟无法前行，又听闻金军已破拱州将攻睢阳，遂决定跟随士族百姓逃亡，幸得小舟渡淮至高邮，此段逃亡经历说之曾记于《答钟离中远先辈书》[⑥]一文中。靖康二年（1127）六十九岁的说之身处高邮，在此地写下《初到高邮》[⑦]《寓高邮禅

① 分别参见（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六《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第 34-37 页；卷十六《濯凤轩记》，第 22-24 页；卷十六《濯凤轩记》，第 28-30 页。
② 此事记于《与宋运使书》，见《嵩山文集》卷十五《与宋运使书》，第 3-6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第 1-17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奏审覆皇太子所读<孝经><论语><尔雅>劄子》，第 46-48 页。
⑤（宋）《靖康要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92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答钟离中远先辈书》，第 26-28 页。
⑦（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八《初到高邮》，第 30 页。

居寺》[①]等诗篇。然身体每况愈下，曾卧病两月，所作《大辩》中有“说之避地高邮，卧病两月”[②]的记述，在《书与郭寿》亦有类似记载：“僕去年自睢阳避金人至高邮，夏五月悲伤欝塞中，疽发于背，赖叔脱死而生。”[③]从这两处记载也不难看出，年近七十的晁说之在外漂泊不定且卧病数月，其生活之困苦，其身心之俱疲！

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六月，召说之赴行在，除徽猷阁待制兼侍读。建炎元年（1127）十月，高宗不听李纲等人还都汴京的主张，而南迁至扬州，此时说之在真州。建炎二年（1128）张遇焚真州，说之为避难自真州往海陵，《正月二十八日避难至海陵，从先流寓兄弟之招，仍邂逅冯元礼故人》[④]一诗记录了此事。在海陵，他著述极为丰富，写有《流寓海陵半年忽得周元仲分宁书欣慰与常日不同辄有作代书》《海陵寒食》《海陵闲居》《题写本老子后》《题僧希白摹法帖》《题周景夏所藏东坡帖二》[⑤]等诗文，但也因生活拮据曾向右相黄潜善请求帮助[⑥]。另外，说之仍有病缠身，他在《太极传后序》中写到：“建炎二年戊申正月，真州巨寇遽至……是时老病之躯存于灰烬之外者，幸也。乃避地海陵，病能饮食……”[⑦]即便身体欠佳，说之仍不忘学术之事，《太极传》六卷、《外传》一卷、《因说》一卷就是他在海陵期间用七十多天的时间追作完成的，由此可见其对学术有着至死追随的态度。

建炎二年冬，说之飘流至金陵，于冬至前一日作《洪范小传》，此时，说之身体已十分糟糕，在《洪范小传》后记中曾写到：“今年戊申（即建炎二年）冬飘流金陵，遇东里好学后生，尝标记予传之五行于本书，予欣然见之，如睹再生之物也。方抱病危弱于冬至前一日，因作此小传，自安其私也。”[⑧]建炎三年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八《寓高邮禅居寺》，第 33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四《大辩》，第 11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书与郭寿》，第 28-29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九《正月二十八日避难至海陵，从先流寓兄弟之招，仍邂逅冯元礼故人》，第 20-21 页。
⑤ 分别参见（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八《流寓海陵半年忽得周元仲分宁书欣慰与常日不同辄有作代书》，第 38 页；卷九《海陵寒食》，第 27-28 页；卷九《海陵闲居》，第 28-29 页；卷十八《题写本老子后》，第 8-9 页；卷十八《题僧希白摹法帖》，第 31-32 页；卷十八《题周景夏所藏东坡帖二》，第 32-33 页。
⑥ 向黄潜善求助一事记录于《与黄丞相书》一文中，见《嵩山文集》卷十五《与黄丞相书》，第 42-43 页。
⑦（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七《太极传后序》，第 7-9 页。
⑧（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洪范小传》，第 30 页。

（1129）正月，说之卒于江宁府舟中，年七十一，假葬于江宁府正觉寺，赠通奉大夫。

晁说之的人生与宋代大多数文官是相仿的，官场与学术贯穿一生。虽然七十多年的人生用短短数页是难以尽数概括的，但也能看出其一些显著特点。如，其于官场，在浮沉中尽知官场百态却未趋炎附势；其于学术，在寻古中辑老成之论却未随波逐流。统而言之，晁说之一生都秉承着特立独行、成一家之说的人生和学术态度。

第二节 晁说之经学著述概况

晁说之一生著述颇丰，然“晚遭离乱，散失几尽”[①]。后其孙晁子健等人往来于江浙间求访遗文于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编成《嵩山景迂生文集》十二卷，后又在江浙蜀淮荆襄等地往来博访，在十二卷的基础上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重编为二十卷。[②]今易于查询到的版本有四库全书荟要本和四库全书本的《景迂生集》、四部丛刊续编本的《嵩山文集》以及国家图书馆的三个版本的清抄本。[③]除却诗歌外，经学著述是说之著述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其经学著述的特点大致可用“博极群经”和“散失几尽”来概括。

一 博极群经

中国古代图书可按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主要收录儒家经典以及历代注经之作，由易类、诗类、书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四书类等几类组成。通过考察晁说之文集以及《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元学案·景迂学案》《经义考》等书目发现晁说之的经学著述几乎涉及经部所有类别。

其易类著述主要有：《易商瞿大传》《商瞿小传》《商瞿易传》《商瞿外传》《京氏易式》《易规》《易玄星纪谱》《周易太极传》《因说》《外传》《古周易》等。其孙晁子健为文集所写的跋、《晁氏世谱节录》以及《宋元学案·景迂学案》中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十，第 50 页。

② 晁子健为说之文集所写的跋较为详细的交代了所编文集时间及卷数。见于《嵩山文集》卷二十，第 47-51 页。

③ 现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可以检索到三个版本，一是清初抄本，八行二十字，红格，白口，四周单边，十二册。二是清抄本，九行十八字，无格，七册。三是清初抄本，九行十八字，无格，七册。

大多未列卷数，惟其侄晁公祖在《题嵩山景迂生文集后》写到：“（晁说之）尝著《易商瞿大传》十卷，《易商瞿小传》十卷，《商瞿易传》卷，《商瞿外传》六卷，《京氏易式》一卷，《易规》一卷，《易玄星纪谱》三卷……”[①]由于未见原书且无文献记载与之相同，故公祖所说不可尽信。现存文集中《太极传后序》一文记有《周易太极传》《外传》和《因说》写作的时间及卷数，文中这样写到：“……凡用七十有二，稿草具，或忘其旧，或得厥新，凡六卷，名之曰《太极传》，又有《外传》一卷，《因说》一卷，备为《易》一家之书。”[②]《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和《宋元学案·景迂学案》所记与此相同，《晁氏世谱节录》只言《周易太极传》六卷而未言《因说》、《外传》的卷数，仅《宋史·艺文志》误写“《太极传》五卷”[③]，然这对于明确《周易太极传》有六卷，《外传》《因说》各一卷并无影响。此外，《易规》有十一篇也是可以确定的，文集中所收录的《易规》十一篇及篇前所言“说之山县无事，辄以所闻读《易》自娱。若著书则不敢，而又未能忘言于斯世也，作《易规》十有一篇”[④]足以证明《易规》的篇数。至于晁氏《古周易》的卷数更是众说纷纭，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晁以道《古易》十二卷”[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古周易》八卷”[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载“晁以道《古易》十二卷”，后又有“并十二篇为八篇”[⑦]的记载；《宋史·艺文志》载“晁说之《录古周易》八卷”[⑧]等等。但通过考究《题古周易后》，根据所列文章框架以及所说的“如古者竹简重大，以经为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⑨]可以大致断定其《古周易》的篇数为八篇，至于卷数仍无法断定。而现文集中仅存《易规》《易玄星纪谱》《京氏易式序》《太极传后序》《题古周易后》《记京房易传后》等数篇文章，其余易类著述皆亡佚。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十后杂文《题嵩阳景迂生文集后》，第 6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七《太极传后序》，第 8-9 页。
③（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百零二《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5038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第 1 页。
⑤（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43 页。
⑥（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2 页。
⑦（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六《经籍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523 页。
⑧（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百零二《艺文志》，第 5038 页。
⑨（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题古周易后》，第 3 页。

其春秋类著述主要有：《春秋晁氏传》《春秋辨文》《春秋年表》《三传说》等。晁子健为文集所写的跋和《晁氏世谱节录》所列名同为《春秋晁氏传》、《春秋辨文》和《春秋年表》，晁公祖在《题嵩山景迂生文集后》中言：“《春秋晁氏传》十二卷，《春秋辨文》六卷，《春秋年表传》三十卷。”[①]由于无旁证，故无法判断公祖所记卷数是否准确，另外，《春秋年表传》中“传”字可能是衍文。《宋元学案·景迂学案》中所记为：《晁氏春秋传》《春秋辩文》《春秋年表》。[②]《晁氏春秋传》与《春秋晁氏传》盖为同书异名，而《春秋辩文》中“辩”与“辨”在古文中为通假字，可通用，故应与《春秋辨文》为一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书目中均未列书名及卷数。现文集中仅存《三传说》一篇，而《春秋晁氏传》《春秋辨文》《春秋年表》皆已亡佚。

其诗类著述主要有：《诗晁氏传》《毛诗传》《诗论》《诗之序论》等。晁子健为文集所写的跋、《题嵩山景迂生文集后》《晁氏世谱节录》所列书名为《诗晁氏传》和《诗论》，《宋元学案·景迂学案》中名为《晁氏诗传》和《诗论》，《诗晁氏传》与《晁氏诗传》名有差别，然很有可能是同一书，而晁说之在《答张仔秀才书》中所提的“三十年尝为《毛诗传》二十卷”[③]与晁公祖所言“《诗晁氏传》十卷”[④]是否是同一书也因不见原书无法考证，故本文俱列。另外，《题嵩山景迂生文集后》《晁氏世谱节录》以及《宋元学案·景迂学案》中均只列《诗论》而未列《诗之序论》，可推测文集中所收录的四篇《诗之序论》很有可能原是《诗论》的一部分。与春秋类著述一样，其诗类著述在《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书目中均未提及。《诗晁氏传》《毛诗传》《诗论》皆亡佚，今文集中仅存《诗之序论》四篇。

其书类著述主要有：《书晁氏传》《书论》《尧典中气中星》《日法》《洪范小传》等。晁子健为文集所写的跋、《晁氏世谱节录》记有《书晁氏传》和《书论》，《宋元学案·景迂学案》为《晁氏书传》和《书论》，《书晁氏传》和《晁氏书传》盖为同书异名。晁公祖《题嵩山景迂生文集后》所言“《书晁氏传论》”[⑤]为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十后杂文《题嵩阳景迂生文集后》，第 6 页。
②（清）黄宗羲、全祖望著，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 2 册），1986 年，第 861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答张仔秀才书》，第 9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十后杂文《题嵩阳景迂生文集后》，第 6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十后杂文《题嵩阳景迂生文集后》，第 6 页。

《书晁氏传》和《书论》的合称？亦或是别书？所列“七卷”是否属实？由于未见《书晁氏传论》，这些问题也只能是无解之题了。另外，陆游曾写有《跋晁以道<书传>》[①]，可证说之确著有《书传》一书。然《书晁氏传》和《书论》皆亡佚，今文集只收录了《尧典中气中星》《日法》和《洪范小传》三篇文章，至于这三篇文章是否为《书晁氏传》或《书论》的部分章节亦是无法断定的。

其四书类著述主要有：《论语讲义》《诋孟》《中庸传》等。晁公袒、晁子健所言以及《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晁氏世谱节录》《宋元学案·景迂学案》和《经义考》等书中均列有《论语讲义》。而所标《论语讲义》的卷数又分为两种情况：晁公袒《题嵩山景迂生文集后》和《宋史·艺文志》同标为“五卷”;《郡斋读书志》和《文献通考·经籍考》标为“十卷”，其余各书只列书目未标卷数。现存可见文献中，余允文于乾道二年（1172 年）所作的《尊孟续辨序》中所说“近世如何深之《删孟》、晁说之《诋孟》、刘原父、道原、张俞辈皆非议孟子，然皆不取信后学兹同，不足辨”[②] 盖为最早言说之作《诋孟》的文字。后南宋王楙的《野客丛书》附录《野老纪闻》也提及说之《诋孟》一书，云：“司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余篇，皆求瑕语。余欲作辨疑示后人，未暇也。晁说之以道自云受学于司马公因作《诋孟》一书。”[③] 周密的《齐东野语》总结前代批评孟子的文章时亦列出说之《诋孟》:“王充作《刺孟》，冯休著《删孟》，司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诋孟》，黄次伋作《评孟》……”[④] 周密之后言《诋孟》者大致袭周密语。然晁公袒《题嵩山景迂生文集后》、晁子健为文集所写的跋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均未列《诋孟》，仅《经义考》中列《诋孟》名目[⑤]。至于《中庸传》，《题嵩山景迂生文集后》、晁子健为文集所写的跋、《郡斋读书志》《宋元学案·景迂学案》和《经义考》中均列有《中庸传》，除晁子健为文集所写的跋和《宋元学案·景迂学案》外，其余各书均表明《中庸传》有一卷。《论语正义》和《诋孟》皆亡佚，现文集中仅存《中庸传》一卷。

总之，晁说之的经学著述不但涵盖《易》、《春秋》、《诗》及四书等几类，

①（宋）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56-257 页。
②（宋）余允文：《尊孟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7 页。
③（宋）王楙著，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54 页。
④（宋）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03 页。
⑤（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183 页。

而且篇文极其丰富，足以用博极群经、著述甚富来概括。

二 散失几尽

虽然说之著述颇丰，然因离乱，“散失几尽”，所存仅二十卷。陆游在为说之写的祠堂记中曾说：“公（晁说之）之文章，本二百卷。中原丧乱后，其家复集之，益以南渡至殁时所作，才得六十卷，而士大夫尤未尽见也。”[①] 即便后世未见陆游所提及的六十卷，但二百卷仅得六十卷已足以说明说之著述“散失几尽”这个特点。

晁说之之孙晁子健在为其搜集和整理文集时亦为说之著述“散失几尽”感到惋惜，他说：

> 先大夫平生著书……合有三十二书，其他文章不在焉……靖康之后，兵火屡更，平生文字与五经图书悉为灰烬。建炎二年侨寓海陵，乃自叹曰：“平生述作，无复存者……”……先大父平生所述文字，亡轶尽矣。今得之者百无一二，子健倘未死，谨当继继博求，随其所得以编次，然不敢以一言述美先德。[②]

> 先大父待制生平著述甚富，晚遭离乱，散失几尽。绍兴初，子健编集所得之文，止成十二卷。但窃记所亡书目于后。及既官，游江浙蜀淮荆襄，往来博访，所得加多，重编为二十卷。而东南之士多未之见，谨用锓木于临汀郡庠，以广其传。唯是收拾兵火之余，传写讹阙异同，不敢辄易改补去取，尚俟他日访本校正。[③]

上述子健所言摘自他在绍兴二年（1132）和乾道三年（1167）两次为说之文集所写的跋中。这两篇跋虽时隔三十余年，但子健对说之著述“散失几尽”的惋惜未减，也正因如此，他才立志用余生访求说之遗文编订成册以供后人览阅校正。同时，子健亦分析造成说之著述“散失几尽”的原因之一是“兵毁屡更”“晚遭离乱”，以此可见战火对书籍存留的影响。

虽然陆游和晁子健所言皆是对说之整体著述的评价，但说之经学著述亦有“散失几尽”这一特点，如其易类著述虽有《易商瞿大传》《商瞿小传》《商瞿易传》《商瞿外传》《京氏易式》《易规》《易玄星纪谱》《周易太极传》《因说》《外传》《古周易》等，然今文集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仅有《易规》和《易玄星纪谱》，《京氏易式》仅存序，《周易太极传》仅存后序，《古周易》仅存《题古周易后》，

①（宋）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2015 年，第 239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十，第 47-49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十，第 50 页。

其余如《易商瞿大传》《商瞿小传》《因说》等皆不存，易类著述所存不及所著的一半，足见亡佚甚重。而说之的其余各类经学著述的亡佚情况较易类著述更为严重，如诗类著述《诗晁氏传》《毛诗传》《诗论》皆不存，仅留四篇《诗之序论》；书类著述《书晁氏传》和《书论》皆不存，仅有《尧典中气中星》《日法》和《洪范小传》三篇小文；春秋类著述《春秋晁氏传》《春秋辨文》《春秋年表》皆不存，仅留《三传说》一文；四书类著述《论语讲义》和《诋孟》皆不存，仅有《中庸传》一文。说之经学著述的所著和所存数量差距如此之大，用“散失几尽”来形容是不为过的！

小结

略观晁说之的一生，可以感受到官场与学术是其人生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在官场中沉浮而未迷失自我，在学术中徜徉亦未随波逐流，一直坚守着特立独行、成一家之说的人生和学术态度，这些足以显现其人生价值。其经学著述含盖《易》、《春秋》、《诗经》等多类，可见其学识的广博，然在感叹其著述颇丰之余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战火年代会带给人以及书籍毁灭性的灾难，而这种灾难不仅影响当时亦影响后世。对晁说之生平及其经学著述进行简要的梳理，使我们对晁说之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为下一步研究其经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晁说之的《易》学思想

宋代是《易》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义理派易学和象数派易学均有所发展，两派之间亦有斗争和融合。从晁说之所存易类著述《易玄星纪谱》、《易规》等文中所阐述的内容和观点来看，他的《易》学当属象数派。他反对如王弼般以己意注解《易》，认为学者提出的应、位、承乘等说大多是对《易传》的过分延伸，既无根据又不合理。同时指出如王弼《易》一样流传于世的《易》大多经传相掺或援引老庄或错误百出，皆非古《周易》，故他主张恢复古《周易》，进而稽考诸儒之传作《古周易》。此外，他还继承并发展了邵雍和司马光的部分易学，在《易》《玄》相通观点的基础上主张《易》《玄》相参，合谱《玄历》《玄图》。可以说，晁说之的《易》学有其独特的治学路径，他的《易》学思想是研究宋代《易》学史乃至整个《易》学史时不能忽略的一部分。

第一节 主张恢复古《周易》

三国王弼援引老庄，以义理解《易》，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等书，形成独树一帜的王弼《易》学，后逐步取代象数易学成为南北朝时期《易》学发展的主流。到了唐代，孔颖达奉命编纂《五经正义》，其《周易正义》采用王弼、韩康伯注本，因《五经正义》属于官方教材，故此后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易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占据主导地位。到了宋代，王弼《易》学仍存在较大影响，如程颐曾说：“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胡瑗）、王介甫（王安石）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①]将王弼《易》学列为《易》学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然而，晁说之在初学《易》时便不喜王弼《易》学，认为王弼等《易》不仅经传相掺、援引老庄还错误百出[②]，已然非古《周易》本来面目，故他主张恢复古《周易》，并矫王弼之失作《古周易》。

一 今《易》皆非古《易》

今《易》指的是在宋代广泛流传的《易》，如王弼《易》等，然宋代学者如欧阳修等则认为这些《易》皆非古《周易》，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叙释·易类》

①（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613 页。
② 详情可参见本文“反对以己意注《易》”一节。

中曾对《周易》传承谱系及古《周易》的亡佚经过、原因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总结，他说：

> 前史谓秦焚三代之书，《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汉募群书，类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学者传之，遂分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传之孔子，《卦》《彖》《爻》《象》与《文言》《说卦》等，离为十二篇，而说者自为章句，《易》之本经也。二曰焦赣之《易》，无所师授，自言得之隐者，第述阴阳灾异之言，不类圣人之经。三曰费直之《易》，亦无师授，专以《彖》《象》《文言》等参解卦爻。凡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田何之学，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费氏初微，止传民间。至后汉时，陈元、郑众、康成之徒皆学费氏，费氏兴而田学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为注，亦用《卦》《象》相杂之经。自晋已后，弼学独行，遂传至今。①

欧阳修认为《易》发展到汉朝分为田何、焦赣、费直三家，唯田何之《易》保留了古《周易》的本来面目，其余两家《易》均有所变动，如费直将“《彖》《象》《文言》杂入卦中”。然田何《易》仅在汉末之前兴盛，而费氏《易》传于郑玄、王弼等人，王弼亦用“《卦》《象》相杂之经”，遂使古《周易》失传。

晁说之继承了欧阳修这一观点，他在《题古周易后》中说：

> 晋太康初，发汲县旧冢，得古简编蝌蚪文字，散乱不可训知，独《周易》最为明了，上下篇与今正同，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杜预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远国，而《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其初费氏不列学官，唯行民间，至汉末陈元方、郑康成之徒皆学费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颖达又谓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当爻，则费氏初变乱古制时，犹若今《乾》卦，《彖》《象》系卦之末欤！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惜哉！②

他先借晋太康年间所发现的“汲冢书”中的《易经》二篇及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时所说的“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指出古《周易》应是经传相分的。

---

①（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879 页。另外，欧阳修在《传易图序》中所言与此类似，详情参见（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第 948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题古周易后》，第 1-2 页。

接着指出古《周易》在流传过程中始变于费直“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大乱于孔颖达等承王弼之意“分爻之《象》辞各附当爻”，即认为费直、王弼、孔颖达所注《易》均是经传相掺的，皆非古《周易》。

除了经传相分外，晁说之还认为以三才论《易》才是古《周易》之真谛，他说：

> 汉之《易》家盖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尝有书……汉自田何授东武王同、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四人者，乃始为之传矣。然王氏、周氏、服氏书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过训诂举大义云耳，岂为巧慧组绣之靡也耶？而《易》家著书则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杨何，所谓“易杨”者是也。丁宽授砀田王孙，王孙授沛施仇、东海孟喜、琅琊梁丘贺三家，又皆列于学官，最为盛矣。其弟子颛门者众，厥后又有东郡京房之学亦得立，而学官则自杨何始。又其后有东莱费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传民间。此三家者虽户牖不同，而堂奥之安则一也，盖皆兼三才，而备错综极变通焉。①
>
> 吾康节先生所谓《易》者，伏羲氏之《易》也。②
>
> 惟康节先生天资既卓越不群，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学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错综变通之妙始大著明矣。③

在阐释《易》学传承谱系之时，晁说之指出京房、费直和高相《易》虽分三家，然它们均承古《周易》“兼三才，而备错综极变通”的思想，即以三才论《易》。而后世研究《易》的学者仅邵雍继承这一思想，“其兼三才而错综变通之妙始大著明矣”，故其认为邵雍《易》乃是伏羲之《易》也。在此观点的基础上，他又指出援引老庄所注之《易》亦非古《周易》，他说：

> 唯弼年少，厌旧喜新，乃一切摈弃师法，攘庄老恍惚虚无之论，专于人事，以快后生耳目，而称为《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奥妙自有所在，而无用庄老汩之也。譬之惰农乞市以饱，而弗顾南亩之可耘耔，惜哉！《易》之杂乎庄老而专明人事，则自王弼始，《易》家乃始失其所传焉。……陆澄《贻王俭书》云：“《易》自商瞿之后，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年后乃有王弼之说。王济云弼所误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予赏味其言，未尝不三叹息之也。……不幸隋兴，缙绅学士反浮丽是慕，弼之学遂为中原之师，而唐因之，于是乎《易》家古法始泯灭无闻矣。④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六《传易堂记》，第 8-9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三才》，第 1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六《传易堂记》，第 11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六《传易堂记》，1985 年，第 9-10 页。

在他看来，王弼“攘庄老恍惚虚无之论”解释《周易》，只是为了吸引后生的注意力而已，自以为借助老庄思想理解了《易》的奥妙，却不知《易》的奥妙在于《易》本身，并不是能借助“庄老恍惚虚无之论”就能理解的。此外，他认为陆澄在《贻王俭书》中所说的“王济云弼所误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的观点是十分正确，指出王弼《易》学在魏晋乃至隋唐时期成为“中原之师”，是造成“《易》家古法始泯灭无闻”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他看来，王弼等人自以为援老庄入《易》可参透《易》之奥秘，殊不知引老庄所注之《易》已偏离古《周易》原义，故所注之《易》非古《周易》。

总之，在晁说之看来，以王弼《易》学为代表的流传于世的《周易》版本皆非古《周易》本来面目，而欲想知《周易》奥秘理应借助古《周易》，故他主张恢复古《周易》。

二 稽考古《周易》

晁说之主张恢复古《周易》并非空谈，其所作《古周易》就是为恢复古《周易》所做出的的努力，他秉承着经传相分的观点将框架结构设计为：“《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①]

至于晁氏《古周易》的完整面目究竟如何，因其早已失传，也就不得而知了。[②]不过，《题古周易后》以及《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等书中留有关于晁氏《古周易》内容的线索：

> 其幸而诸儒之传，今有所稽考者，具列其异同舛讹于字下，亦庶几乎同复于古也。或曰：子能古文，何不古文写之？曰：有改于华而无变于实者，予不为也。[③]

> 以诸家《易》及许慎《说文》等九十五书，是正其文字，且依汉田何本，分易经上、下，并十翼，通为十二篇，以矫费氏、王弼之失。谓刘向尝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至蜀李譔又尝着古文《易》，遂名之曰《古易》。[④]

> 晁氏专注北学。凡故训多取许叔重《说文解字》、陆德明《音义》；僧一行、李鼎祚、陆希声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黄聲隅辈所论，亦时采掇。……景迂则辑诸家异同，或断以己意，有增有损；篇第则放费长公，未解辅嗣未注以前旧本，并十二篇为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题古周易后》，第 1 页。
② 对此，本文对晁氏《古周易》进行了部分辑佚，详情参见附录 A。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题古周易后》，第 3 页。
④（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 43 页。

八篇[①]

结合三家所说可知，晁氏《古周易》主要是稽考诸家《易》异同，在字下具列异同舛讹，参考许慎《说文解字》等书正其文字，文本所用文字为今文而非古文。

另外，在查找宋代学者对古《周易》的研究状况时，偶然发现邵雍亦作过《古周易》，邵氏《古周易》的结构记录于其孙邵博所作《邵氏闻见后录》中："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其次第不相杂也。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今入《彖》《象》《文言》于卦下者，自费氏始。盖古《易》已乱于费氏，又乱于王氏也。予家藏大父康节手写《百源易》，实古《易》也。百源在苏门山下，康节读《易》之地，旧秘阁亦有本。"[②]对比来看，邵雍和晁说之所作《古周易》的结构完全一样，而这真的是巧合吗？当查看晁说之的生平事迹时便会发现他虽未拜师于邵雍门下，但其曾在邵伯温手中得邵雍遗编残搞，"宝而藏之，服勤不知昼夜"[③]，已然是邵雍私淑。所以，他的《古周易》很大程度上是在邵雍《古周易》的启发下所作的。

总之，王弼等《易》经传相掺、援引老庄且错误百出已改变古《周易》本来面目，而这些既是促使晁说之主张恢复古《周易》的根本原因又是直接原因，为了恢复古《周易》，他以经传相分、三才论《易》的思想为指导，稽考诸儒之传作《古周易》，成为宋代主张恢复古《周易》且影响较大的一位学者。

第二节 反对以己意注《易》

《周易》可分为《易经》和《易传》，《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由《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序卦传》《说卦传》《杂卦传》等组成。《易传》释经时曾提出三才、应、位、承乘等概念，后被王弼这类学者延伸总结而成为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易》学的主要思想，被后世学者广泛运用。对此，晁说之在《易规》中通过对三才、应、位、承乘等概念的阐发表达了他的不满，

① 此为马端临引用李焘对晁氏《古周易》的评价，参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六《经籍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523 页或（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77 页。

②（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7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七《太极传后序》，第 8 页。

他认为《易传》对三才、应、位、承乘等概念的阐释和论述不仅详细而且明了，而王弼等人对《易传》中三才、应、位概念的解读往往凭借己意，不免偏颇。王铁先生在《宋代易学》一书中认为《易规》十一篇是晁说之对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易》学的全面批判[①]，观《易规》全文发现，先生所言极是，然说之所批判并未局限于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易》学，故与其说《易规》是晁说之批判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易》学，不如说是他反对以己意注《易》的《易》学更为恰当。

一 论应、位、承乘

晁说之《易爻相应》《位》《承乘》三篇文章分别对《易传》中应、位、承乘概念进行了论述与辨析。如其在《易爻相应》中先对学者所说的“初应四，二应五，三应上”提出质疑，他说：

> 学者以初应四，二应五，三应上，予不知其何以也。《系辞》言卦爻象数，刚柔变通之数非一也，其详至于三言五言七言而不已，未尝及所谓初四、二五、三上之应也。《系辞》论《咸》九四之类凡十有七爻，阐弘明著，若恐无以告人，谆谆勤矣，又未尝一言及乎应也。在爻凡三百八十四《象》，示其吉凶悔吝无咎，所以然者，亦未尝一言在应也。惟《师》《小畜》《履》《同人》《大有》《豫》《临》《无妄》《咸》《恒》《遯》《睽》《损》《萃》《升》《未济》十有六卦之《彖》，以应为言，而实非初四、二五、三上之应也。[②]

他从《周易》文本本身出发，据《系辞》《象》《彖》来说明学者所提出的“初应四，二应五，三应上”是毫无依据的，指出《系辞》虽言卦爻象数，讲卦爻吉凶悔吝无咎等，但未尝一言及乎应，更未尝及所谓初四、二五、三上之应。而《象》虽示其吉凶悔吝无咎，然亦未说是“应”的缘故。同样，《师》《小畜》《未济》等十六卦的《彖》虽有说“应”的地方，也并非初四、二五、三上之应。

在对“初应四，二应五，三应上”提出质疑之后，他接着指出卦爻有应无应并不能代表善或不善，亦与卦爻之得失无关。他先以八纯卦为例，指出《乾》《艮》《坎》《震》《坤》《兑》《离》《巽》这八个卦虽然都无应，但不能以此为依据而认为它们不善。接着以《大有》《中孚》等卦爻为例并从六类情况进一步

① 王铁：《宋代易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97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易爻相应》，第 2-3 页。

分析论证卦爻有应无应与善、不善以及得失是无关的。其一，无应之爻亦善。他以《大有》卦为例，指出《大有》卦的九三、上九爻虽没有应，但九三爻“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①]和上九爻“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均是善的。其二，有应之爻并不一定比无应之爻善，甚至存在有应之爻不如无应之爻的时候。这里他将《中孚》卦的无应之爻九二爻、九五爻与《大有》卦的有应之爻九二爻、六五爻进行比较，指出《中孚》卦的九二爻“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和九五爻“有孚挛如，无咎”并不比《大有》卦的九二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和六五爻“厥孚交如，威如，吉”差多少。又将《中孚》卦的有应之爻六三爻、上九爻与《大有》卦的无应之爻九三爻、上九爻进行比较，指出《中孚》卦的六三爻“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和上九爻“翰音登于天，贞凶”反不如《大有》卦的九三爻和上九爻。其三，有应的阳爻和有应的阴爻与善、不善或利、不利无关。这里他以《遯》卦和《颐》卦为例。指出 《遯》卦初六、九四爻皆有应，初六爻“遯尾，厉，勿用有攸往”是阴爻、不善。九四爻“好遯，君子吉，小人否”是阳爻、善。据此可以推断出有应的阴爻不善而有应的阳爻善，然这种结论并不能适用于全部的卦爻，即存在与“阳利应而阴不利应”截然相反的情况——“阴利应而阳不利应”，《颐》卦的初九、六四爻便是证明存在“阴利应而阳不利应”这种情况的例子之一，《颐》卦的初九、六四爻皆有应，初九爻“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是阳爻、不善。六四爻“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是阴爻、善。故有应的阳爻和有应的阴爻与爻的善、不善并无关联。其四，无应的阴爻和无应的阳爻亦与善、不善或利、不利无关，即便无应也可善，也可利。这里他以《升》卦和《丰》卦为例。指出《升》卦的初六、六四爻皆无应且均为阴爻，初六爻“允升，大吉”和六四爻“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都是善、利的，而《丰》卦的初九、九四爻皆无应且均为阳爻，初九爻“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和九四爻“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也都是善、利的。故“阴无应而俱得”、“阳亦无应而俱得”，即无应的阴爻和无应的阳爻均可为善、利。其五，同一个卦中，有应的爻和无应的爻之间有时存在相似的语句，如《鼎》卦的六五爻有应、上九爻无应，六五爻“鼎黄耳金铉，利贞”和上九爻“鼎玉铉，大吉，无不利”都有“金铉”或者“玉铉”这种带有“吉”色彩的词语。同样，《睽》卦

① 因本文所引《周易》文本太多，故不注卦辞和爻辞所引之处，仅注《彖》《象》《系辞》等《易传》所引。

的九四爻无应、上九爻有应，九四爻“睽孤，遘元夫，交孚，厉无咎”和上九爻“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失张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中都有意为乖离而孤独的“睽孤”一词。故有应无应与卦爻吉凶、得失是无关的。其六，以《咸》卦为例，指出《咸》卦有三个阴爻和三个阳爻且皆有应，但“六爻乃俱不以应而为得”，即有应的爻并不一定就善或者得。总之，在他看来，有应无应与得失无关，故不能由应判断吉凶、得失。

在《位》中他则先对学者所说的“以阳居阳、阴居阴为得位，得位者吉；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为失位，失位者凶”[①]的观点进行批驳，指出不仅圣人没有类似说法，而且这种结论并不准确，因为如果卦爻皆以此为准则，那么，六二爻、九三爻、六四爻、九五爻一定都是善的，吉的；而九二爻、六三爻、九四爻、六五爻一定都是不善的，凶的。然三百八十六爻的得失、吉凶与此并不完全相符。基于此，说之提出爻的得失、吉凶取决于爻本身而与位无关，他说：

> 《系辞》谨于爻而略于位，盖爻有变而位不变也。吉凶、悔吝、无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位有贵贱而无吉凶、悔吝、无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位皆不与焉。……《系辞》以断其吉凶，不遗拇指之微，不讳豕鬼之怪，研极之不已乎？《系辞》论位之详且明者，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夫六五、六三谓之危可也，讵皆凶乎？[②]

他据《系辞》文本进行分析，认为爻的得失、吉凶源于爻本身与位无关，位有贵贱，但无吉凶、悔吝、无咎，同时指出《系辞》中对“位”的论述虽已十分详尽明了，也没有“得位者吉”和“失位者凶”的说法。此外，他认为《系辞》言“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③]，故六五爻、六三爻皆可称“危”，但不能皆“凶”。

为了进一步说明爻的吉凶与位无关，他又以卦爻举证，提出失位的爻可吉、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位》，第 5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位》，第 5 页。
③（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18 页。

可安，而得位的爻可凶、可危。如《谦》卦的初六爻“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和《升》卦的初六爻“允升，大吉”都是阴爻居阳位属于失位，然两爻所言均为吉；《大有》卦上九爻“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和《鼎》卦上九爻“鼎玉铉，大吉，无不利”则都是阳爻居阴位属于失位，这两爻亦都是吉而非凶；《解》卦的九二爻、九四爻是阳爻居阴位属于失位，六三爻、六五爻是阴爻居阳位亦属于失位，但这四爻[①]“于《解》而安”，非凶。《旅》卦的九四爻“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是阳爻居阴位属于失位，此爻对于旅客而言是吉，对于主人来说是凶，故不能将此爻断为简单的吉凶。而《蹇》卦的六二爻、六四爻是阴爻居阴位属于得位，九三爻、九五爻是阳爻居阳位亦属于得位，但这四爻却“于《蹇》而危”；《旅》卦的九三爻“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是阳爻居阳位属于得位，然此爻所言可定为不吉。故爻得位失位与吉凶、安危无关，即爻的吉凶与位无关。随后他又指出爻得位、失位与当位、不当位无关。如《蹇》卦六二爻、九三爻、六四爻、九五爻均属于得位，但是只有六四爻的《象传》言“当位实也”，其余三爻皆未言；《解》卦九二爻、六三爻、九四爻、六五爻皆属于失位，只有九四爻的《象传》言“未当位也”，其余三爻皆未言；《困》卦九四爻“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是阳爻居阴位属于失位，然《象传》却言“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②]《需》卦上六爻“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是阴爻居阴位属于得位，但《象传》却说“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③]《困》卦失位言不当位，《需》卦得位亦言不当。对此，他说道：“参差反复如此，则有得失，初不系于位之当否，果何足论哉！”[④]明确指出爻得位、失位与当位、不当位的关系是毫无规律可循的，而爻之吉凶、安危、得失与位无关本就是事实，不必再讨论。

最后，他又直言提出“得位者吉”和“失位者凶”的学者只是自我欺骗而已，他说：

> 呜呼，圣人之告人明矣，其义必在爻位者，则兼爻位而称之。《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庆”之类是也。有爻位之义兼在卦者，则又亦兼卦著之，“比之

①《易规·位》原文：“《解》之六三、九四、六五号俱失位……《解》之四爻既俱失位……”，前文举三爻而后文言四爻，结合《解》卦各爻的得位失位情况可知前文遗漏九二爻，故补充说明。

②（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197页。

③（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45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位》，第7页。

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无交害”之类是也，顾弗明乎？学者乃倡之，喜于自昧而已。[①]

他指出爻义即爻的得失、吉凶、安危等若在爻位，以圣人“告人明”的特点来论圣人必定“兼爻位”称之，如《大畜》卦的六四爻和六五爻的《象传》就直接言“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庆也”[②]。亦有一些爻义“兼卦”者，它们也是直言的，如《比》卦的初六爻的《象传》言“比之初六，有它吉也”[③]，《大有》卦的初九爻的《象传》言“大有初九，无交害也”[④]。

《承乘》一文则是他对学者所提出的承乘之说“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阳乘柔则吉，阴乘刚则凶”[⑤]的批驳，他认为这种承乘之说是学者因为“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求之或不通”才提出来的，如“狡兔三窟，期必一安”[⑥]。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说明承乘之说的不合理性：其一，若依据承乘之说，那么凡是卦中有离体的皆“得于上而失于下”，而有坎体的皆“得于下而失于上”，然而事实与之并不完全符合，故承乘之说不可信。其二，《系辞》中无一字提及承乘之说，所说的“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⑦]是在论说《易》的“情”而已，虽与承乘之说相似而并非承乘之说。其三，《象传》虽然有所谓的“从上舍下‘志在内’‘志在外’”[⑧]的论说，与《系辞》一样虽与承乘之说相似但并非承乘之说。即使《象传》中有五处[⑨]提及“乘刚”的地方，然《屯》《噬嗑》《震》卦的六二爻和《豫》卦的六五爻这四爻的《象传》所言“乘刚”皆是因为震体的缘故，与承乘之说无关。同样，《师》卦九二爻的《象传》所言“承天宠”，《蛊》卦初六、六五爻的《象传》所言“意承考”“承以德”，《归妹》卦初九、上六爻的《象传》所言“跛能履吉，相承也”“承虚筐也”，《节》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位》，第 7-8 页。
②均见于（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21 页。
③（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55 页。
④（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77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承乘》，第 8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承乘》，第 8 页。
⑦（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321 页。
⑧（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承乘》，第 8 页。
⑨ 这五处指的是《屯》、《噬嗑》、《震》卦的六二爻、《豫》卦的六五爻以及《困》卦的六三爻，仅《困》卦无震体。

卦六四爻的《象传》所言“承上道也”[①]等也并非全部是因“位”而言的。基于以上三点他认为这种承乘之说不可信。

二 论中正、卦主

《周易》十分注重“中正”，而义理派学者认为当爻处于内卦或外卦的中间位置时称为得中；阳爻处于一、三、五位，阴爻处于二、四、六位的时候，称为得正。故阳爻居五位，阴爻居二位时称为“中正”，且大部分是吉爻。晁说之在《中正》一文中认为《周易》所说的“中正”应是针对整个卦而言，即“中正”并非指位之中正，而是卦之中正，他指出《系辞》中所说的“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②]并非言位之中，而“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③]也并言非位之正。

随后他又从《周易》文本本身入手，并借助文本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义理派“中正”之说的不正确性。其一，若按此说，那只有六二爻和九五爻“中正”，而其余爻皆不“中正”，然《艮》卦六五爻的《象传》言“艮其辅，以中正”、《未济》卦九二爻的《象传》言“贞吉，中以行正”，这两爻位非“中正”却可言“中正”；其二，若据此说，只有二、五爻为“中”，而其余爻皆不“中”，然《复》卦六四爻的《象传》言“中行独复，以从道”，《泰》卦六四爻的《象传》言“不戒以孚，中心愿也”，这两爻位非“中”却可谓“中”；其三，若遵此说，那只有初九、六二、九三、六四、九五、上六爻为“正”，而其余爻皆不“正”，然《晋》卦初六爻的《象传》言“独行正也”，《艮》卦初六爻的《象传》言“未失正也”，《蒙》卦初六爻的《象传》言“以正法也”，《离》卦上九爻的《象传》言“以正邦也”，这四爻位非“正”却可言“正”。[④]最后，他用《未济》、《中孚》等卦为例证指出位非“中正”者亦可“贞吉”，并藉此提出是否“中正”与爻位无关而与卦有关，他说：

> 《未济》六爻，在彼学者皆失正失中，而九二、九四、六五，何以皆贞吉邪？以

①（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52、93、94、221-222、223、241 页。
②（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317 页。
③（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295-296 页。
④ 此段所引《象传》，分别见于（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216、254、114、69、153、214、39、138 页。

卦言之，《中孚》用“中”，《蒙》、《颐》“养正”，《中孚》独二五备德，而《蒙》之六五不得为童蒙之吉，《颐》六五不得有居贞之吉邪？盖《彖》之所谓“中正”者，自因卦而为言，又安得以爻卦为一体哉？曾卦爻之不辨也，悲夫！[①]

他指出按照义理派“中正”之说，那《未济》卦的六爻皆非“中正”，然九二爻“曳其轮，贞吉”，九四爻“贞吉，悔亡；震有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六五爻“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都言“贞吉”。另外，《蒙》卦的《彖传》言“蒙以养正，圣功也”[②]，得中不得正的六五爻可为“童蒙，吉”；《颐》卦的《彖传》言“颐贞吉，养正则吉也”[③]，得中不得正的六五爻亦可言“拂经，居，贞吉”，由此他推测“中正”源于卦本身与爻所在的位置无关，而义理派因卦爻不分才会提出“中正”之说。

除“中正”之说外，晁说之还指出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派所提出的“一爻为主说”亦是卦爻不分的缘故。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说：“凡《彖》者，通论一卦之体者也。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卦体不由乎一爻，则全以二体之义明之，《丰》卦之类是也。”[④]其中“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就是“一爻为主说”。晁说之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说：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是卦爻各有所自也。卦以象告，爻以情言，又其为用亦不同也。学者正指一爻而成一卦，是爻犹颈也，卦犹赘也，圣人何喜多端而蕴崇哉？得非学者见《小畜·彖》言“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同人·彖》言“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大有·彖》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遂尔妄意欤？《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因以成《大有》之卦，似可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何能成《小畜》之卦乎？《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亦能成《同人》之卦乎？[⑤]

他先将卦、爻进行对比，指出卦、爻“各有所自”“其为用亦不同”，接着指出学者所说的“一爻而成一卦”，使“爻犹颈也，卦犹赘也”，即“一爻而成一卦”会造成一种爻极为重要而卦可有可无的假象。他认为学者之所以提出“一爻而成一卦”的观点，大概是因《小畜·彖》《同人·彖》《大有·彖》中所言的“柔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中正》，第 10 页。
②（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39 页。
③（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22 页。
④（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615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卦爻》，第 10-11 页。

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①]“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②]“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③]，然而据他看来，《大有》卦六五爻“厥孚交如，威如，吉”成《大有》卦是可以勉强认同的，而《小畜》卦六四爻“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和《同人》卦六二爻“同人于宗，吝”是不能成《小畜》卦和《同人》卦的。

他还特别对王弼注解《履·彖》所说的“成卦之体，在六三也”[④]和注解《大过·彖》“‘栋桡’，本末弱也”所说的“初为本，而上为末也”[⑤]进行辩驳，认为《履·彖》所言“履虎尾，不咥人，亨”[⑥]与六三爻所说的“履虎尾，咥人，凶”是相对的，故《履》卦的成卦之体并不在六三爻。而《大过》卦的初六爻“藉用白茅，无咎”与上六爻“过涉灭顶，凶，无咎”所表达的意思也并不弱，故卦、爻各有义而不同义。总之，在他看来，王弼等学者提出的“一爻为主说”并不适用于《周易》文本。

然而，“一爻为主说”仅是王弼“卦主说”的一个方面而已，王弼的“卦主说”还有其他方面，如“内外二体说”和“卦名、卦辞以定卦义说”[⑦]，这也就意味着王弼并未主张《周易》中所有卦爻均符合“一爻为主说”，那晁说之对王弼“一爻为主说”的批判也就显得过于偏颇了。而说之为何仅论王弼的“一爻为主说”而忽视“卦主说”的其他方面？究竟是他无意遗漏还是有意忽视呢？吾等皆非说之，故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王弼的“一爻为主说”又分为两种原则，曹树明和宋锡同先生在《王弼“卦主说”探微——对<易传>以来“卦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⑧]一文中将这两种原则总结为唯一原则和尊位原则。唯一原则指的是有些卦中，六爻中唯一的阳爻或者阴爻是“卦主”；尊位原则指的是居于尊位的第五爻是“卦主”。而

①（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58 页。
②（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72 页。
③（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76 页。
④（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63 页。
⑤（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25 页。
⑥（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63 页。
⑦ 曹树明、宋锡同的论文《王弼“卦主说”探微——对<易传>以来“卦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认为王弼的“卦主说”可分为“一爻为主说”、“内外二体说”、“卦名、卦辞以定卦说”三个方面。详见曹树明、宋锡同：《王弼“卦主说”探微——对<易传>以来“卦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管子学刊》2009 年第 1 期，第 85 页。
⑧ 曹树明、宋锡同：《王弼“卦主说”探微——对<易传>以来“卦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管子学刊》2009 年第 1 期，第 84-88 页。

晁说之主要是对“一概主之于五”即尊位原则提出质疑，他先用历史事实说明“卦各有主”，说：“一概主之于五，不知孔子鲁逢掖何乃为百代文教之主欤？纣商王曾不得以独夫自全，其故何邪？”[①]认为孔子只是鲁国儒生未处于尊王却能为百代文教之主，而纣王帝辛是商王处于尊位却“不得以独夫自全”[②]，因此他反对以位论主。

为了进一步证明“卦各有主”，并非“一概主之于五”。他又用《屯》卦、《谦》卦等为例进行论证。他说：

> 《屯》之初九“以贵下贱，大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谦》之九三“劳谦君子，万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主果何在邪？《丰》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果以谁为之主邪？[③]

他将《屯》卦初九、九五爻的《象传》进行对比，认为《屯》卦的卦主应在初九而非九五。又将《谦》卦九三、六五爻的《象传》进行比较，亦认为《谦》卦的卦主不在六五而在九三。又指出《丰》卦初九爻明言“遇其配主”，九四爻直言“遇其夷主”，此二爻皆不在“五”却能言“主”，故虽卦各有主，然非“一概主之于五”。

三 论三才、卦象、卦变、卦德

在《三才》一文中，晁说之指出《系辞》已言明三画卦和六画卦皆有三才，然有些学者却仅言六画卦，他说：

>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卦之时，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谓“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者，言三画既兼三才、而六画又以两之，故卦成于六画也。又曰：“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盖兼两之者，别有所属，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圣人前后反复告人明矣，奈何后之学者以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乎？伏羲初画卦时，三才不备乎？有地与人，而独无天，可乎？夫所谓仰观俯察者，无所不寓也。[④]

他认为《易传》所说的“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⑤]和“兼三才而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主》，第 13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主》，第 13 页。
③ 此段中“《屯》之初九”误写为“《屯》之初六”，今改正，参见（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主》，第 13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三才》，第 1 页。
⑤（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326 页。

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①]已反复告明三画卦和六画卦皆具三才之象。而学者独以“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显然是不明《周易》的表现。

于卦象，王弼曾在《周易略例·明象》一文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出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若。”[②]认为象能尽意，晁说之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

> 昔稽康作《言不尽意论》，殷融作《象不尽意论》卓哉，吾意夫二子者，可谓言《易》也，其深得圣人之言者欤！圣人谓“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意”，使意尽于象，则亦尽于言，而意非言之所尽，则亦非象之可尽，姑立象以尽之，果莫之尽也。意如其尽，则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尽不尽之意，非尽不尽之言也。[③]

他十分赞赏嵇康所作的《言不尽意论》和殷融所作的《象不尽意论》，认为二人才是“深得圣人之言者”。《系辞》中所说“言不尽意”才“立象以尽意”暗含着“意非言之所尽，则亦非象之可尽”的意思，即言不能尽意，象也不能尽意。故王弼所说的“意以象尽”并不准确。

此外，他还主张“一物俱有六象，非一象各著一物”[④]，认为何妥、萧该二人之所以提出“六象论”[⑤]“四象论”[⑥]是因为他们“不知一物俱有六象，非一象各著一物”的缘故，而王弼所说的“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为马？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⑦]亦是他不知“《易》之立象，犹诗人之托兴于草木鸟兽”[⑧]，《易》只是借用“牛”“马”比喻，并非非“牛”“马”不可。

至于卦变，晁说之认为“智者观变于几微之初，而昧者则不然，见雨施而知天之变物，感叶落而知物之变秋，亦已晚矣”[⑨]，他赞成《系辞》中所说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

①（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318 页。
②（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 609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象》，第 12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象》，第 12 页。
⑤ 何妥（何襄城）提出的“六象论”的六象即实象、假象、偏象、圆象、义象、用象。
⑥ 萧该提出的“四象论”的四象即实象、假象、义象、用象。
⑦（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 609 页。
⑧（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象》，第 12 页。
⑨（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变》，第 15 页。

时，归奇于扐以象闰……是故，四营以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①]即四营十八变，四营指的是“分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这四个步骤，十八变指的是一爻需要三变，一卦有六爻需要十八变。他认为这才是卦变的精髓，而京房、虞翻、荀爽等人所说的卦变，如《泰》卦、《否》卦变为《咸》卦、《恒》卦；《咸》卦、《恒》卦变为《损》卦、《益》卦，只是简单的阴爻与阳爻的位置互换而已。再如《贲》卦是由《泰》卦的九二爻与上六爻互换而来的，《贲》卦的上九爻居二柔之上，故“刚上而文柔”，六二爻居二刚之间，故“柔来而文刚”，亦是阴爻、阳爻互换而已。他还指出王弼作《明爻通变》和《明卦适变通爻》是王弼不知何为卦变的缘故，说：

> 王弼独知《贲》有《乾》、《坤》之变，而区区以情明爻通变，以辞明卦适变，又何其晚邪？夫情之好恶，辞之险易，变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变也。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则将变而情亡矣。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则既变而辞亡矣，弼曾未知思乎？孙盛诮弼以傅会之辨，丽于浮义，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五气相推，皆摈落，多所不关，非诬也。[②]

晁说之认为王弼以情之好恶作《明爻通变》，以辞之险易作《明卦适变通爻》皆是因为他未明白“情之好恶，辞之险易，变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变也”的道理。故他认为孙盛对王弼的评价十分准确，并不偏颇。

对于卦德，他主张一卦非一德，故批评那些“于八卦惟知一德，执一德而不知屈伸”[③]的学者，认为这类学者[④]“于《巽》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于《艮》知其止而不知其行也，于《震》知其动而不知其恐惧也，于《兑》知其说而不知其忧伤也，于《坎》知其陷而不知其为阴之中也，阴阳之所始也，陷不自陷也。于《离》知其丽而不知其为阳之中也，阴阳之所终也，丽不自丽也。”[⑤]即他们以为一卦仅一德，是根本不懂得屈伸变化的表现，又怎么能自称崇尚“居观

①（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279-282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变》，第 15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德》，第 14 页。
④ 这类学者特指孔颖达等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注解《巽》卦时言“以‘入’为主”，注解《艮》卦时说“‘艮，止也’，静止之义，此是象山之卦，其以‘艮’为名”；注解《震》卦时言“震，动也”；注解《兑》卦时言“兑，说也”注解《坎》卦时言“‘坎’是险陷之名”，参见（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231、213、209、234、129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易规・德》，第 14 页。

其象，动观其变，消息盈虚”呢？他曾在《答陈廷藻先辈书》中引用《艮·彖》所言“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①]认为《艮》卦不仅说“止”，亦是说“行”。为了进一步证明一卦非一德，他又以《乾》卦有“元、亨、利、贞”四德以及《系辞》所言“夫乾，天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②]为据，认为《乾》卦和《坤》卦均并非仅有一德！

晁说之论应、位、承乘等概念，皆通过对《周易》文本的分析，以卦爻、《彖》《象》《系辞》所说为据层层推翻学者提出的不合理观点。总之，《易规》一方面显现出他对《周易》经传的尊重，认为《易传》对《易经》的解释已十分完备；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他对《周易》部分注疏的不满，指出注疏中对《易传》应、位、承乘等概念的阐释大多是过分延伸且毫不合理，故他反对以己意注疏《周易》。

第三节 主张《易》《玄》相参

《玄》指的是西汉末年扬雄所作的《太玄》，该书模仿《周易》题材而成，研究者甚众，北宋学者对扬雄及其《太玄》的研究和讨论尤其突出，形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些学者在研究《易》学时往往参考或借助《太玄》而促使其在研究《易》学的同时亦研究《太玄》。如晁说之在研究《易》学时便主张《易》《玄》相参，不仅指出《易》《玄》具有相通之处，而且还将司马光的《太玄历》和邵雍的《太玄准易图》合谱为《易玄星纪谱》，成为北宋主张《易》《玄》相参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一 《易》《玄》相通

《嵩山文集》中保留了两段晁说之对《太玄》和《周易》关系的论述，他说：

> 自古经解之士多而著书之士寡。扬雄耻与当时章句之徒并而时著《玄》，乃所以明《易》也。是故学《易》者不可不学《玄》，知《玄》则知《易》矣。[③]
>
> 呜呼，苟不明乎《易》，则亦无以《玄》为；而不通乎《玄》者，则又乃徒为《易》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答陈廷藻先辈书》，第 35 页。
②（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320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七《送郭先生序》，第 40 页。

也，可不勉诸！今之学者知尚其辞耳，而莫知其辞之所以来，宁顾此邪？或曰：欧阳公不读《玄》，而于《易》何如？曰：子非欧阳公，奈何！[①]

其一是他在《送郭先生序》中所言，认为扬雄作《太玄》而明《易》，进而提出“知《玄》则知《易》”的观点。其二是他在《易玄星纪谱后序》中指出虽然存在如欧阳修一样不读《太玄》而明《周易》的非等闲之辈，然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不理解《周易》是很难知《太玄》之大概的，同样，未通晓《太玄》而学《周易》亦是艰难的。由此可见，晁说之认为《易》《玄》是相通的，即通晓《易》《玄》中任何一书对于另一书的学习均是有帮助的。

另外，晁说之《易》《玄》相通的观点很有可能是他从司马光和邵雍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原因有二个，其一，司马光和邵雍二人均有类似观点，如司马光在《读玄》[②]和《说玄》两文中论述《易》《玄》关系时说：

夫畋者所以为禽也，纲而得之与弋而得之何异？书者所以为道也。《易》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设纲而使弋者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扬子作《法言》所以准《论语》，作《玄》所以准《易》。……学者能专精于《易》诚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为之阶也。子将升天而废其阶乎？”[③]

《易》与《太玄》大抵道同而法异，《易》画有二，曰阳曰阴；《玄》画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错于方、州、部、家为八十一首。……《易》每卦六爻，合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赞，合为七百二十九赞。……《易》卦六爻，爻皆有辞，《玄》首四重，而别为九赞以系其下。……《易》有元亨利贞，《玄》有罔直蒙酋冥。……《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辞也，《首》者亦统论一首之义也。《易》有爻，《玄》有赞。《易》有《象》，《玄》有《测》。《测》所以解赞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赞，《文言》之类也。《易》有《系辞》，《玄》有《攡》、《莹》、《掜》、《图》、《告》。五者皆推赞《太玄》，《系辞》之类也。《易》有《说卦》，《玄》有《数》。《数》者论九赞所象，《说卦》之类也。《易》有《序卦》，《玄》有《冲》。《冲》者序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易玄星纪谱后序》，第 33-34 页。
②《温国文正公文集》（四部丛刊景宋绍兴本）和《司马光集》（（宋）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都为《说玄》，然《太玄集注》（中华书局 1998 年版）和《嵩山文集》（《四部丛刊续编》景旧抄本）却为《读玄》。因《太玄集注》和《嵩山文集》有另一篇名为《说玄》的文章，为了区分两篇文章，故此篇从《太玄集注》和《嵩山文集》为《读玄》。
③（汉）扬雄撰，（宋）司马光集注，刘韶军点校：《太玄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2 页。

八十一首，阴阳相对而解之，《序卦》之类也。《易》有《杂卦》，《玄》有《错》。《错》者杂八十一首而说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皆本于太极两仪三才四时五行，而归于道德仁义礼也。①

司马光在《读玄》中先将《周易》和《太玄》形象的比喻为种田时驱赶鸟类的两种方式，认为《周易》是纲，即网而捕之；《太玄》是弋，即射而捕之。两种方式虽不同然目的都是驱赶鸟类，可以相互补助。换句话说，司马光认为《易》《玄》就如纲、弋，可以相互补助。又将《易》比喻成天，将《玄》比喻成升天的阶梯，认为《玄》是理解《易》的基础。在《说玄》一文中则直接将《周易》与《太玄》的准应关系罗列出来，指出二者具有“道同而法异”“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特点。

邵雍《康节先生太玄准易图》亦有类似观点，他说：

所谓《玄》之于易，犹地之于天也，如斯而已。准而作之，不亦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序，舍气候，明卦爻，冠首赞，位列八重。先以夜赞布诸外，然后画赞。首位爻象，候卦气卦、宫分度数次诸内，复会于辰极，而《玄》《易》显仁藏用之道，循乎数者可见矣。是故始于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后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复会于太初之上元者，《玄》之赞也。自上元甲寅青龙之首气，起《未济》之九四，后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复会于太极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原始要终，究其所穷，则体用虽殊，其归一而已矣。②

邵雍认为“《玄》之于《易》，犹地之于天也”，《太玄》是准《易》而作的。又将《玄》之赞和《易》之爻进行比对，指出二者“体用虽殊，其归一而已矣”的特点。司马光和邵雍虽未明言《易》《玄》相通，然二人所说的“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和“体用虽殊，其归一而已矣”本质上就是将《易》《玄》视为相通的。

其二，晁说之曾得司马光《太玄集注》和邵雍《玄图》并反复读之，他在《易玄星纪谱后序》中说：

说之在嵩山，得温公《太玄集注》读之，益知扬子云初为文王《易》而作《玄》……温公又本诸《太初历》而作《玄历》，其用意加勤矣，然简略难明。继而得康节先生《玄图》，布星辰，辨气候，分昼夜，而《易》《玄》相参于众，为极悉矣。复患其传写骈委易乱，岁月斯久，莫知其蠹，手欲释而意不置。乃朝读夜思，取《历》于《图》，合

①（汉）扬雄撰，（宋）司马光集注，刘韶军点校：《太玄集注》，第 3-5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康节先生太玄准易图序》，第 2 页。

而谱之，于是知子云以首准卦，非出于其私意，盖有星候为之机括，不得不然。[①]

据此可知，他在嵩山读司马光《太玄集注》后，才更加理解扬雄的《太玄》是为《周易》而作，后反复阅读司马光《太玄历》和邵雍《太玄准易图》才明白扬雄“以玄准卦”，并非本人捏造，而是有“星候为之机括，不得不然”。虽未直言承二人思想，然司马光《太玄集注》和邵雍《太玄准易图》中均蕴含《易》《玄》相通的观点，又因说之“朝读夜思”二书，故其未参透二书《易》《玄》相通观点的可能性很小，也就是说，说之《易》《玄》相通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受司马光、邵雍二人影响的。

二《玄历》《玄图》合谱

在认识到《易》《玄》相通的特点之后，他接着继承并发展了司马光和邵雍等人《易》《玄》相参的主张，将司马光的《玄历》（《太玄历》）和邵雍的《玄图》（《太玄准易图》）合而谱之作《易玄星纪谱》，并于后序中交代了作谱缘由：一是《太玄历》“简略难明”[②]；二是“患其（《玄图》）传写骈委易乱，岁月斯久，莫知其蹠，手欲释而意不置”[③]。

因由《太玄历》和《太玄准易图》合谱而成，故《易玄星纪谱》（下文皆简称《谱》）中有很多地方是对司马光、邵雍主张的继承，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谱》中所列“天度、次舍、气、候、卦爻、首、昼赞、画赞”八条目与邵雍所说的“分天度，列次序，舍气候，明卦爻，冠首赞，位列八重”[④]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二，十二星次与二十八星宿的度数与司马光、邵雍所用同，且均依《三统历》；其三，十二消息卦共七十二爻值七十二候，大雪第一日当《复》卦初九第一日，冬至当《复》卦六四第一日[⑤]，亦与《太玄准易图》同；其四，《谱》中除去四正卦的六十卦共三百六十爻，一爻值一日。每五卦为一个单位，五卦值一月，先是五卦初位爻轮值五日，再有二位爻轮值，后面以此类推。如《太玄准易图》亦有类似说法：“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引而伸之为三百六十爻，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易玄星纪谱后序》，第 31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易玄星纪谱后序》，第 31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易玄星纪谱后序》，第 31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康节先生太玄准易图序》，第 1 页。
⑤王铁先生在《宋代易学》一书中误将“冬至当《复》卦六四第一日”写成“冬至当《复》卦六三第五日”，（王铁：《宋代易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108 页。）今据《易玄星纪谱》改正。

各司其日，则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进退之道，阴阳之运备矣。”[①]其五，《谱》中《玄》首所准之卦与司马光所准一样，与范望、郭元亨等人略有差异。例如，《永首》，宋衷、宋惟干、陆绩、范望、王涯皆主张准《恒》卦，许翰准《节》卦，《谱》与司马光则准《同人》卦。同时，晁说之结合“候”对《永首》准《同人》卦而非《恒》卦进行解释说明，他说：“先此‘凉风至’，《常》已准《恒》；继之以‘白露降’，《度》乃准《节》；今《永》当‘寒蝉鸣’，则准《同人》，岂可汩乱后先，乃复准《恒》于后邪？”[②]即他认为《常》首已准《恒》卦，《常》首后面的《度》首已准《节》卦，《度》首后面的《永》首则不能再准《恒》卦，不然先后次序便乱了。对《疑》首准《贲》卦而不准《巽》卦亦用了相同的方式解释。其六，《谱》将《太玄》的七百二十九赞分昼夜而用事，每首九赞共值四日半。例如《难》首初赞值昼，二赞值夜，三赞值昼，四赞值夜……九赞值昼，以下是《勤》首初赞值夜，二赞值昼，三赞值夜等等，以此类推。司马光《太玄集注》中凡言赞值昼夜者与此大致一样。

其实，《谱》中除了上述这些承司马光或邵雍主张的地方之外，亦有很多不同于司马光和邵雍之处，如《谱》中二十四气所在星度大部分不同于《三统历》，因现存《太玄历》与《三统历》的二十四气所在星度一致，故《谱》在此点亦不同于司马光的《太玄历》。[③]今按《谱》查找，便知除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这六个节气的星度与《三统历》《太玄历》一致外，其余十八节气的星度皆不同。例如在《谱》中“实沈初毕十一度立夏，中参八度小满，鹑首初井十四度芒种，中井二十九度夏至，鹑火初柳七度小暑，中星七度大暑，鹑尾初张十五度立秋，中翼十二度处暑，寿星初轸九度白露，中角七度秋风”，[④]而《三统历》和《太玄历》中则是“实沈初毕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满，鹑首初井十六度芒种，中井三十一度夏至，鹑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张三度大暑，鹑尾初张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处暑，寿星初轸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风”。[⑤]又如《谱》中《坎》《震》《离》《兑》四正卦，共二十四爻一爻值一气，而这四卦的初位爻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康节先生太玄准易图序》，第 1-2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易玄星纪谱后序》，第 31-32 页。
③ 现存《太玄历》大部分内容与《三统历》同，这不禁让人质疑是不是司马光所作《太玄历》的本来面目，至于《太玄历》究竟是何面目有待进一步考证。本文依《嵩山文集》和《太玄集注》中的《太玄历》，其内容大多同于《三统历》。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易玄星纪谱》，第 8-30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温公太玄历》，第 2-3 页。

和四位爻分值八节。如立春当《坎》之九四、春分当《震》之初九、立夏当《震》之九四、夏至当《离》之初九等等。邵雍《太玄准易玄图》亦有“以《坎》《离》《震》《兑》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四气”[①]的说法，不同之处是对八节的对应，《太玄准易图》主张“《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以司八节”[②]，比较而言，应是晁氏说法正确，因为八节既已在二十四气之中，也必然是由四正卦中的某爻当值，不可能由《乾》《坤》《艮》《巽》当值。另外，司马光认为“易以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因爻象而定名，分《坎》《离》《震》《兑》直二十四气，其余六是卦，每卦直六日七分。《玄》以一二三错布于方州部家，而成八十一首，每首直四日有半，起于冬至，终于大雪，准《易》卦气直日之叙而命其名。或以两首准一卦者，犹闰月之正四时也。《坎》《离》《震》《兑》在卦气之外，故因《中》《应》《释》《饰》附分至之位而准之”[③]，晁说之在《易玄星纪谱后序》中则表达了与之不同的观点，他说：“惟《震》《离》《兑》《坎》是谓四正卦，《易》所不用，则《玄》亦无所准矣。”[④]由此可见，《易玄星纪谱》并非简单的合谱《玄历》和《玄图》，而是在二书基础上的补充与修正。

通过分析可知《易》《玄》相通的观点应是晁说之主张《易》《玄》相参的基础与源起，而合谱《玄历》《玄图》作《易玄星纪谱》则是其对《易》《玄》相参的具体运用。此外，《易玄星纪谱》中与司马光、邵雍某些主张的不同之处，则从侧面反映出他于学术有着严肃谨慎的态度，不会一味认同某一观点，而是有选择性的加以继承或批判。

小结

晁说之的《易》学思想，未被当时的权威——王弼等《易》学所束缚，在对、位、承乘、中正、卦主、卦象、卦变、卦德等概念进行论述时，他借用《周易》文本指出如王弼般学者用不完全归纳法提出的学说或观点的无根据性与不合理性。在认识到古《周易》应是经传相分，且以三才论《易》方知《周易》奥妙后，指出流传于世的《易》大多经传相掺或援引老庄等皆非古《周易》本来面目，故主张恢复古《周易》，并以经传相分为准则作《古周易》。同时在司马光、邵雍的影响下认识到《易》《玄》相通，进而主张《易》《玄》相参，合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康节先生太玄准易图序》，第 1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康节先生太玄准易图序》，第 1 页。
③（汉）扬雄撰，（宋）司马光集注，刘韶军点校：《太玄集注》，第 4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易玄星纪谱后序》，第 31 页。

《玄历》、《玄图》作《易玄星纪谱》，但他并未完全沿袭司马光和邵雍的观点，而是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可以说，他于《易》学亦坚守着特立独行、成一家之说的人生和学术态度。

第三章 晁说之的《春秋》学思想

在政治和学术环境的影响下，宋代《春秋》学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亦有学者称宋代的《春秋》学是宋代的显学之一。[①]其繁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著述宏富和名家辈出。[②]晁说之是宋代众多《春秋》学学者中的一员，他虽不是宋代《春秋》学的名家，但他的《春秋》学思想亦是宋代《春秋》学的一部分，故研究其《春秋》学思想不仅有利于了解他本人的学术特点，而且也有助于发现宋代《春秋》学的特色。据相关史籍记载，晁说之写的关于《春秋》的专门著作有《春秋晁氏传》、《春秋辩文》以及《春秋年表》等，但皆以亡佚。这大概也是晁说之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他的文集《嵩山文集》中还保留了一些其《春秋》学思想的内容，可以从他对时政的看法和对《春秋》三传的评析两方面去分析和体悟他对《春秋》的态度及看法，进而勾勒出他《春秋》学思想的大致面貌。

第一节 借《春秋》论时政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言《春秋》，他说：

>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馋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③]

---

① 董锡阁在《简析宋代<春秋>学繁荣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宋代《春秋》学是宋代显学之一。（董锡阁：《简析宋代<春秋>学繁荣的原因》，《安徽文学》2008 年第 12 期，第 235 页。）李建军在《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一书中认为《春秋》学在宋代"最称显学"。（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 页。）张尚英在《宋代<春秋>学专题研究》一书中对比宋代《春秋》学、《尚书》学、《诗经》学文献，指出"宋代《春秋》学最为发达，为宋代显学之一，言出有据。"（张尚英：《宋代<春秋>学专题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1 页。）

② 张尚英：《宋代<春秋>学专题研究》，第 19 页。

③（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4003 页。

司马迁对《春秋》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春秋》具有“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等特点，认为为君者、为臣者、为父者、为子者均应通晓《春秋》，指出《春秋》对社会现实的指导作用，亦从侧面揭示了《春秋》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在司马迁这个观点的影响下，历代治《春秋》的学者在论说时政时经常引用《春秋》大义阐发观点，当代学者李建军在《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①]一书中对《春秋》学与政治的历史渊源进行了简单分析，他指出从先秦到两宋的《春秋》学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牟润孙先生在对两宋《春秋》学进行阐述时则直言“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②]。可知，以《春秋》论时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并不是宋人所发明独创的，但北宋以《春秋》论时政者尤多。

一 对内：尊一王之制

《春秋》中所蕴含和阐发的“尊王”之义经常被宋代学者借用以论时政。李建军先生在《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一书中便根据《宋史》相关记载列举了杨文仲、黄裳、宋祁等人借《春秋》“尊王”大义论时政的事情。[③]晁说之亦多次引用《春秋》“尊王”大义论时政，如其在论说《春秋》被罢于学官以及“孔孟”并称时均以《春秋》“尊王”大义作为其观点的支撑。

北宋时期，《春秋》不列于学官始于王安石熙宁变法期间，后绍圣年间，章惇为相时从王安石新法，取消置《春秋》博士，使得《春秋》不列于学官，针对此事，晁说之提出不满，他说：

> 《春秋》，孔子笔削以懼万世乱臣贼子者也。有国者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春秋》者，人伦大教也。元祐之初，常列于学官矣，今乃弃之，恐非所以尊经术也。昔孟子欲言《周礼》而患无其籍，今之《周礼》最出汉末，杂之以六国之制，多汉儒之所伦次者，或谓六国阴谋之书，则过也。大要敛财，多货黩祀，烦民冗碎，可施于文而不可措于事者也。犹以王制之所存，得列于学官，而《春秋》法百王之制，反可黜乎？[④]

此为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上书时言“士得自致于学”一条时所说，他先引用司马迁的话重申《春秋》一书对于为人君者和为人臣者的重要性。接着

① 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第 80-85 页。
②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41 页。
③ 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第 194-196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第 40 页。

追忆元祐之处《春秋》常列于学官，反观“今乃弃之”，认为此举是不尊经术的表现。又将当时被为政者所推崇的《周礼》与《春秋》进行对比，指出《周礼》存在无法确定写作年代和内容只适合写在书中而不适用于行事两个不足之处，即便如此，《周礼》却能凭借着书中存有王制得以列于学官，而《春秋》中存有百王可以效仿的制度竟不能列于学官。对此，晁说之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他恳请皇上可以恢复“春秋”一科，让士大夫们自由选择其所学。可以说，此段文字不仅表达其对《春秋》不列于学官的不满还流露出他想要朝廷恢复“春秋”一科的迫切请求。

此外，他在《奏审覆皇太子所读<孝经><论语><尔雅>劄子》和《答勾龙寿南先辈书》两文中亦以《春秋》“尊王”大义为由反对黜《春秋》于学官，他说：

> 臣闻《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与礼之尊无二上，其旨实同。……前者学官罢黜孔子《春秋》，而表章伪杂之《周礼》，以孟子配孔子，而学者发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论语》，固可叹矣。①

> 黜《春秋》而尊尚伪《周礼》，弃《孝经》而以《孟子》配《论语》，几何不使文武之道坠地也耶？②

指出《春秋》“尊王”大义可正天下之本，认为为政者罢黜《春秋》而尊尚《周礼》会加速“文武之道坠地”。这两段文字与《元符三年应诏封事》中所表达的中心观点是一样，即在晁说之看来，“伪杂”之《周礼》与“尊王”之《春秋》一比高下立判，黜《春秋》而章《周礼》显然是因不解《春秋》及其“尊王”之义所造成的。

而他反对“孔孟”并称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认为“孔孟”之称不符合《春秋》所提倡的“一王之制”，他说：

> 孔孟之称，谁倡之者？汉儒犹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欤？其学卒杂于异端。而以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岂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称，荀卿抵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隐而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奏审覆皇太子所读<孝经><论语><尔雅>劄子》，第 46-47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答勾龙寿南先辈书》，第 11 页。

无说，闭约而不解”，未免为诸子之徒，尚何配圣哉？[①]

他先指出不仅不知“孔孟”并称的提出者是谁，而且汉时并无“孔孟”并称的说法。随后认为凡是知晓《春秋》提倡的一王之制的人，“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即是不会将孔子和孟子并称的。最后，他以孟子“其学卒杂于异端”以及荀子评价孟子所说的“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不解”[②]为依据，认为孟子不能配圣。总之，在他看来，“孔孟”并称与《春秋》倡导的“尊一王”是完全不符的，故他反对“孔孟”并称。

另外，他在《辩诬》一文中重申了反对“孔孟”并称的观点，他说：

> 《春秋》不之贵者，尊一王也。门内妾妇且知尊无二上矣。予不知所谓孔孟云者，孰自而得耶？其尊孔子欤，尊孟子欤？盖天下万世之尊师者，孔子一人而止耳，容孰偶之也邪？学者于是乎权有度，无欲挽二子以并驾，又无乃甚邪？荀卿非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王充著论曰《刺孟》，则亦过矣。然不为无谓也。知其不尊周室，劝诸侯僭王以国叛，人人可为汤武，予学《春秋》而有感焉，未敢发之言也。后见江东李覯所论著，则有前得于予者也。又如士师可杀人之类，强辩桀骜，视当时所谓策士者不甚远。今学者以孟子班诸颜渊，而原宪、子贡、曾参、宓子贱之徒，悉后之者，不知世无孔子，果孰可以诸子优劣邪？使孟子与诸子并生，而从容弦诵阙里中，当自有次第哉！[③]

在这里，他也是以《春秋》所倡导的“尊一王”为依据，认为妇人都皆知“尊无二上”，故“天下万世之尊师者”，也就孔子一人而已，是不允许有第二人的，即“孔孟”并称亦是不被允许的。接着他指出荀子、王充对孟子的评价虽有些过分，但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如孟子所说的“人人可为汤武”、“士师可杀人”等不合君臣之别、君尊臣卑的话以及“劝诸侯僭王以国叛”的行为都与孔子《春秋》所倡导的“尊王”大义是完全相悖的。因此，他认为 “孔孟”并称并不合理。

《春秋》不列于学官和“孔孟”并称看似是学术问题，然并非单纯的学术问题。《春秋》不列于学官是以王安石为主的新法实施者所推行的政治举措，而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孔孟》，第 19-20 页。另《嵩山文集》原文为“荀卿抵孟子：‘僻违而无类，幽阴而无统，闭约而不解’”，所载与《荀子》原文不符，今据《荀子》改“幽隐而无统”为“幽隐而无说”。参见（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94 页。

②（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 94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四《辩诬》，第 7-8 页。

“孔孟”并称则得益于王安石变法期间提出的一系列促使“孟子升格”的政策[①]。故晁说之借《春秋》“尊王”大义来反对《春秋》不列于学官和“孔孟”并称便是他对时政的看法，亦从侧面反映他对王安石等人推行的新法并不赞赏。

二 对外：护“中国”之尊

靖康元年，金军南下，渡过黄河，直抵开封城下，宋钦宗派使者与金议和，金提出交金帛数千万，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予金，以宋宰相、亲王作为人质等条件方可议和。面对这样屈辱的条件，宋代很多官员上书反对此事，晁说之便是其中一员。他以《春秋》“重信诛盟”为据指出与夷狄结盟将失“中国”之尊，他说：

> 《春秋》重信，盟生于不信。《春秋》是以诛盟，中国诸侯之盟固在所诛，况以中国盟夷狄乎？又况以王人与盟乎？……兵而不已至于盟，盟而不已至于质子，则又《春秋》所不诛也。在汉唐时，但闻夷狄有质子于中国，不闻中国有质子于夷狄，礼则然也。今人一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质子，苟有明《春秋》之大臣，则其责当如何，无乃失中国之所以尊者乎！[②]

他指出《春秋》“重信诛盟”，对“中国”诸侯内部之间的盟约都加以谴责，也必定会谴责“中国”与夷狄之间的盟约，即宋金签署盟约亦在《春秋》“重信诛盟”所谴责的范围内。接着指出“但闻夷狄有质子于中国，不闻中国有质子于夷狄”，认为宋朝将宰相、亲王作为质子给金国这样的事情有失“中国”的尊严，皇上应该尽力保全宰相和亲王，不能将他们作为质子交给金国。总之，在晁说之看来，《春秋》所推崇的“重信诛盟”等大义均是将“中国”放于高高在上的地位，绝不允许发生宋朝与金国结盟和宋朝将宰相、亲王作为质子交给金国这样有失“中国”尊严的事情！

此外，他还坚决反对将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割给金朝，他说：

> 金贼不避利，求割地以河为界，执事者不尽河以赐之，姑赐高阳府、中山府、太原府暨其郡县，无虑名城将百数，自以为有谋也。不知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孰敢以寸土不在网会图哉？高阳、中山者，我太祖、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艰难而得之者，乃一日谈笑而弃之邪？太原则太祖、太宗相继亲征，冒矢石甚于河北，其艰难

① 详情可参见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8-109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负薪对》，第8-9页。

则久于河北，真宗自谓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顾弗重邪？又忍如坠甑而弃之邪？[①]

他指出高阳、中山、太原等地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历经艰难才获得的，理应万分珍惜，然今时却“一日谈笑而弃之”，欲将三地割于金朝，令人难以接受。除此之外，他还特写《重地》一文，分析三镇为宋朝的重地，欲使统治者认识到割三地给金朝是不明智之举，他说：

有国家者重地，而不得已于征伐，作《重地》。《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地而安。有人焉，虽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贱，不当书者，邾庶其以漆、闾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兹之地而重也，邾黑肱以盐之地而重也。下国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为重？所以重其诛也。苟不以地叛，则一身之罪，一时之祸也。其以地叛，则不特一身之罪，贻百世之祸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爱民也，正天下国家之本也。邾莒之君，孰与天下之君大？漆、闾丘之地，孰与中国形势之地重？属者黄头女真猖狂京师城下，执政大臣遽以高阳、中山、太原三镇赐之，窃恐非《春秋》之旨也。……中国，以中控制夷狄者也，乃委此地于夷狄，使以控制中国乎？……昔之一荆州，今之瀛、定、并门，三荆州也，又可不大惧乎？……古今识者皆恨唐不能有河北，而委之于三叛，不知唐失河北于三叛之后，继失秦、陇、河、湟于吐蕃，自凤翔西门之外即为吐蕃之境，顾无自而远制大河之北也。今京师视瀛、定、并门，犹唐长安之视秦、陇、河、湟，其利害不亦逼乎？嗟夫，唐失陇右而不能制河北，今失河北而宁无西师之忧乎？又将何以制之乎？言及此，则三镇之利害又急于汉之荆州也。……若不得保北之重镇而弃之，窃恐江介之民，鱼虾之俗先叛而后服者，足摇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弃朝廷而必行，恐朝廷之我弃也。故曰所忧不在河北，而在京师也。[②]

他承《左传》所言“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③]的观点认为《春秋》理应不书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等卑贱之人，然因他三人拥有漆、闾丘这样的重地而书，表明《春秋》蕴含“重地”之义，即“地”尤其是“重地”对君主和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晁说之直言若将土地割让给他国所引发的祸患不仅会威胁本朝利益亦影响后世。他还将春秋时期的漆、闾丘之地，汉之荆州以及唐之河北与宋之太原、中山、高阳三地进行比较，认为三地对宋朝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负薪对》，第 6-7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重地》，第 25-31 页。
③（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521 页。

的重要性远大于荆州之于汉和河北之于唐，而将如此重地割让给金国必将给宋朝带来巨大灾祸，所以他恳请皇上放弃割高阳、太原、中山三地给金国的想法。总而言之，在他看来割让三地给金国与《春秋》“重地”之义是相违背的，不仅不明智更有损“中国”之尊！

他借《春秋》“尊王”之义反对《春秋》不列于学官和“孔孟”并称，又以《春秋》“重信诛盟”和“重地”之义指出宋朝与金国的签署盟约、 宋朝将质子送至金国以及宋朝割让高阳、太原、中山给金国等举措皆是不合理的，这些借《春秋》论时政的例子足以显现其对《春秋》及其大义的重视和尊信。

第二节 评三传之得失

据《汉书·艺文志》载：“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①]其中“《春秋》分为五”指的是《春秋》分为《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五家。后由于“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②]，所以五家之中只存《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家，即《春秋》三传。因三传的解经方式、行文特点等不同，历代学者经常将三传进行比较和评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就总结了部分学者对三传的评价，他说：

> 三传皆有得于《经》而有失焉。“《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讖，《谷梁》善于经”，郑康成之言也。“《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义有三长，二《传》之义有五短”，刘知几之言也。“《左传》拘于赴告，《公羊》牵于讖纬，《谷梁》窘于日月”，刘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浅，《公羊》失之险，《谷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专而纵，《公羊》之失杂而拘，《谷梁》不纵不拘而失之随”，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或失之诬，或失之乱，或失之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谷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叶少蕴之言也。“《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朱文公之言也。[③]

①（汉）班固撰：《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第 1701 页。
②（汉）班固撰：《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 1715 页。
③（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乐保群、田松青、吕宗力点校：《困学纪闻》（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784-785 页。

从王应麟对学者观点的这些转述可知，由于学者分析的角度不同，故对三传的评价不一：郑玄主要肯定三传之长；范宁、胡安国、叶梦得、朱熹等人认为三传各有长短；刘知几则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超《公羊》、《谷梁》二传；刘敞、崔子方、晁说之等人主要指出三传之失。其中，王应麟所引晁说之对三传的评价源于说之所作《三传说》，属于晁说之对三传评价的核心观点，那么，具体而言，晁说之又是怎样评析三传的呢？

一《左传》之失“专而纵”

在《三传说》中他分三段依次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进行分析评价，在首段他是这样评价《左传》的，他说：

> 《左氏》于《经》而合者，夐初二传及百氏之上，惜夫观者未之悉观也。盖其于《经》言约而意含，其序事则文侈而辞丽。侈固足以胜约，而焕丽又易以掩夫含蓄。是使好文采者知有传而不知有经，幸而偶躭经之士，则甘心于《公》《谷》之下，不复省澄源于洪流也。①

他从“经”的角度入手，认为《左传》与《春秋经》相合的地方远超于《公羊》、《谷梁》二传。接着指出《春秋经》具有“言约而意含”的特点，《左传》偏重序事，“文侈而辞丽”，认为《左传》“文侈”和“辞丽”的特点固然可以丰富和补充经文，但另一方面不仅会掩盖《经》本身“笔削”的特点，而且还会使学者在研读过程中经常被“传”的文辞所吸引而忽略“经”的微言大义，使好文采的学者“知有传而不知有经”。

除了对《左传》本身的评价外，晁说之还对研究《左传》的学者杜预及其《春秋左传集解》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杜预研究《左传》时虽然勤奋用功，但其所作《春秋左传集解》亦存在不足有二：一是“屈《经》以申《传》”②。即杜预在《春秋经》和《左传》的不合之处从《左传》而舍弃《经》。对此，晁说之指出《左传》中亦含有一些“无传之经”，那“屈《经》申《传》”的杜预又该如何处理这些“无传之经”呢？二是杜预虽然明确表明反对贾逵、服虔等人注解《左传》时杂引《公羊》、《谷梁》，但晁说之认为杜预在解释《左传》时也“参援二传而强纳之”③，其与贾逵、服虔并没有区别。此外，他认为《春秋》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三传说》，第 22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三传说》，第 22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三传说》，第 22 页。

成书时所依据的旧史大多保存较好，而《左氏》成书之时旧史比较零散，相比而言《春秋》的记载会比《左传》更为可靠，然杜预却“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①]。

上述这些他对《左传》的具体评价与其所总结的《左传》“专而纵”的特点之间很难建立联系，然刘敞在《春秋权衡》中对《左传》的评价与晁说之相近，可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左传》“专而纵”的特点，刘敞说：“然丘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泛以旧章常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见成败耳，其褒贬之意，非丘明所尽也，以其不受经也”[②]，即刘敞认为左丘明用己意解经和注经虽是为了避免流传过程中“失其真”，但过于专断和随心所欲，使《左传》“未能尽得圣人褒贬之意”。结合刘敞所说可知，其实，晁说之评价杜预时指出其“以《左传》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就是在批评《左传》“专而纵”的特点。

二《公羊》之失“杂而拘”

裴亚兵学者在其硕士论文《晁说之专题研究》中认为晁说之相较于对《左传》的严厉批评，对《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态度要缓和一些。[③]然而，综合分析晁说之《三传说》中对三传的评价之后可知，实际上晁氏对《公羊传》的批评比《左传》更甚。他评价《公羊传》时说：

> 虽曰父子以口授受而密矣，不能无所遗误舛逆，亦人情之所不免也。如昭三十一年冬，“黑弓以溢来奔”，曰：“文何以无邾娄？”何休曰：“据读曰邾娄。”说者曰：“公羊子口读则邾娄黑弓。”是口读与策书不无同异也。既曰一家之传，而特书子公羊子者，孰谓谓高欤？且又载鲁子、高子之辞何邪？而又复有子沈子者、子女子者、子北宫子者，高之所子欤？抑平、地、敢、寿之所子欤？此五子者既多异同，于子公羊子不知何以不本诸子夏之初邪？彼阙疑不决之故，若有待于来者，信高也，何以不决于子夏乎？以故一章之间玉石错出，而精深昭远之功少，其酿谬亿措之害，不胜其多也，可不惜乎！夫其所谓精深昭远者特绝乎？……呜呼，公羊家既失之舛杂矣……[④]

他指出《公羊传》最主要的缺点就是“舛杂”，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公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三传说》，第 22 页。
②（宋）刘敞：《春秋权衡》卷一，通志堂经解本。
③ 裴亚兵：《晁说之专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5 年，第 53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三传说》，第 23-24 页。

羊传》中记录的是“黑弓以滥来奔”[①]，读的却是“邾娄黑弓以滥来奔”，口读与策书有着明显的差别，显得过于舛杂。其二，《公羊传》虽自称是“一家之传”，但文中却有不知道师承关系的“鲁子、高子、子沈子、子女子、子北宫子”等人的传文。其三，《公羊传》中错误百出，不能做到“精深昭远”，时常引用诮让嘲笑之辞，援引他经，使得传文更加杂乱。

与评价《左传》时一样，他评价《公羊传》的同时，亦对《公羊传》的研究学者何休及其《公羊解诂》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何休在《公羊传》研究上虽然很见功夫，但仍无法弥补他的过失。指出其不足有三：其一，他认为何休提出的“五始、三科、九音、七等、六铺、二类、七缺”[②]这些义例显得过于繁碎，且最为有害的是“王鲁”“黜周”“新周”“故宋”。其二，认为何休的《公羊解诂》一书中受当时谶纬学说的影响而广引谶纬杂说，强行将灾异与人事对应，不免诞妄和牵强。其三，何休提出“三世说”将隐、桓、庄、闵、僖定为衰乱之世，将文、宣、成、襄定为升平之时，昭、定、哀定为太平之时，对此晁说之指出凡是知晓历史的人都知道鲁国从隐到哀处于不断衰败的过程，根本没出现所谓的升平、太平之时，故何休“三世说”与历史史实是不相符的。基于以上三点，晁说之认为何休的《公羊解诂》“徒勤而功亦不除过矣”[③]，即何休所作的《公羊解诂》的得大于失。

另外，晁说之对《公羊传》和何休这些评价并非他所独创，如刘敞在《春秋权衡》中对《公羊》的评价就与之相似，刘敞说：“《公羊》所以异二传者，大指有三，一曰据百二十国宝书而作，二曰张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吾以此三者皆非也……”[④]可见，《公羊传》的这些缺点早已成为部分学者共识。

三《谷梁》失之随

相较于《左传》和《公羊传》，晁说之对《谷梁传》的评价显得尤为缓和。他评价《谷梁传》时说：

> 《谷梁》晚出于汉，因得监省《左氏》《公羊》之违畔而正之，然或失贼而不讨也，

①（汉）公羊寿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538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三传说》，第 24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三传说》，第 24 页。
④（宋）刘敞：《春秋权衡》卷八，通志堂经解本。

且或与之同恶焉，重可惜哉！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欤！范宁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也，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汲汲然不敢异同也。盖谷梁失之随，而宁或失之不随。呜呼，学之难也如此哉！《左氏》之失专而纵，《公羊》之失杂而拘，《谷梁》司典刑而不纵，崇信义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变通矣，不免失之随也。[①]

他首先指出《谷梁传》是为了纠正《左传》和《公羊传》中的过失而作的。认为《谷梁传》的优点有四：一是文中有“精深远大”的地方；二是“司典刑而不纵”；三是“崇信义而不拘”；四是“有意乎蹈道而知变通矣”。其不足有二：一是“或失贼而不讨也，且或与之同恶焉”；二是范宁“申《谷梁》之志也，其于是非亦少公矣”。

他主要是从“经”的角度对三传以及研究三传的学者进行评价，虽然亦有对三传的肯定，然大部分是指责三传的过失，即在他看来，无论是《左传》还是《公羊传》或《谷梁传》对《春秋经》的注解均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误。

小结

因晁说之所著《春秋晁氏传》《春秋辨文》《春秋年表》等《春秋》学著述的亡佚，使我们失去了分析他《春秋》学思想完整面目的先天条件，只能借助《三传说》以及文集中的部分相关文章来勾勒其《春秋》学思想的大致面貌。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可以看出他借《春秋》论时政未超出宋代《春秋》学重“尊王”和“攘夷”的特点，对内主张“尊一王”，对外则强调护“中国”之尊；他从“经”的角度评析三传，指出《左传》之失“专而纵”、《公羊》之失“杂而拘”、《谷梁》失之随的特点，然实质未超脱前代学者的观点，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总之，这仅仅是晁说之《春秋》学思想的“冰山一角”，虽不能窥看其《春秋》学思想的完整面目，然足以表明他对《春秋》及三传均有其独特心得。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三传说》，第 24-25 页。

第四章 晁说之的《诗经》学及《四书》学思想

汉至唐中叶，对《诗经》的诠释基本上是由《毛传》《诗序》《郑笺》以及《孔疏》[①]等汉学的权威著作所支配的。[②]唐中叶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些“权威”提出或多或少的怀疑和批驳，如欧阳修所作《诗本义》就指出《毛传》和《郑笺》中存有百余篇谬误[③]，并对《诗序》提出质疑。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晁说之作四篇《诗之序论》提出对《诗序》作者和内容的质疑，成为他《诗经》学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观点。而《四书》学[④]专指学者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儒家经典的阐发和研究，除了《大学》外，晁说之对《四书》中的《论语》、《孟子》和《中庸》都有论述，他尊信《论语》、质疑《孟子》、释《中庸》而不尽信《中庸》，这些都是他《四书》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而无论是《诗经》学思想还是《四书》学思想都是他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其经学思想的重要环节。

① 在这里，《毛传》是《毛诗故训传》的简称；《诗序》指的是《毛诗序》，又分为“大序”和“小序”；《郑笺》是郑玄所作《毛诗传笺》的简称；而《孔疏》则是孔颖达等人所作《五经正义》之一的《毛诗正义》的简称，因其大部分是对《毛传》和《郑笺》的疏解又称为《毛诗注疏》，故简称为《孔疏》。

② 《毛诗正义》是奉唐太宗的诏命而作的，故成书之后，成为唐至宋初科举考试的官方用书，也促使它与《毛传》、《郑笺》等成为诠释《诗经》的权威著作。朱熹所说的“《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得传，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毛氏之学，传者亦众，而王述之类今皆不存，则推衍毛说者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讹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参见（宋）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 2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3654-3655 页。）和四库馆臣所说的“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参见（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五《经部十五 • 诗类一》，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17 页。）正是对这种现象的描述。

③ 欧阳发在述《先公事迹》中言：“为《诗本义》，所改正百篇……”，可参见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第 2627 页。

④ 关于“四书”作为专书之名始于何时，可参考顾宏义：《宋代<四书>文献论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6-15 页。此外，学术史上“四书”一名起于南宋朱熹对《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儒家典籍合并注释而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而朱熹之前的很多学者亦对这四部经典进行研究，他们虽未明确提出“四书”的概念，但他们的研究已然属于“四书”这个系统，故在此借助“四书”的概念来论述晁说之对《论语》《孟子》《中庸》的注解与评价。

第一节 晁说之的《诗经》学思想

由于晁说之所作《晁氏诗传》和《诗论》的亡佚，其《诗经》学思想则主要体现于四篇《诗之序论》以及《与张明仲书》《答贾子庄书》《答张仔秀才书》等数篇文章中。大体而言，他的《诗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诗序》，对《诗序》的作者和内容等提出质疑；二是以《春秋》解《诗经》，即借助《春秋》的记载或者春秋大义来解释《诗经》。①

一 论《诗序》

《诗之序论》是晁说之对《诗序》的看法，统而论之，他主要从三方面论《诗序》：一，《诗序》与《诗》是否同时所作；二，《诗序》作者；三，《诗序》是否可信。

对于《诗序》与《诗》是否同时所作，晁说之从多个角度进行阐释和分析认为《诗序》与《诗》并非同时所作。首先他认为《诗》的作者如周公、吉甫、家父、孟子等大多是圣人、贤人或者善士，“其感惟深，其诚惟加，其辞惟缓，徘徊自致吾爱君之心焉”②，绝不会如《诗序》那样“所刺不讳时君之恶而暴其私无所不及”③“所美直而且倨”④。他还指出有些诗若如《诗序》所言只是为了“讦”，那“余怒悉纾而罢矣”⑤，不必托之鸟兽草木虫鱼、文之训诂、比之音声以成诗，同样，有些《诗》若只是为了“美”，那么“考功所书县令最状”⑥，亦不必托之鸟兽草木虫鱼、文之训诂、比之音声以成诗，即若如《诗序》所言《诗》仅是为了“美”“刺”是不必作的。接着他指出有些《诗序》已将《诗》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了，如《山有枢》之序和《车攻》之序，使“诗无遗思矣”⑦“夫既有序而直陈其事，则诗可以不作矣”⑧。随后，他以唐初所发现的岐山石鼓文

① 桂枭先生在《宋代党争与<诗经>学转型——晁说之<诗经>学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18 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年，第 124-137 页。）一文中亦指出晁说之《诗经》学的主要宗旨可归纳为两点：一、激烈反对《诗序》，不只怀疑《诗序》的作者，更从义理上否定了《诗序》的解经价值；二、“约《春秋》以为《诗》”，晁氏解《诗》不仅参考《春秋》即三传的历史记载，更大瞻地以《春秋》为解释《诗经》的义理标准。然先生有的地方稍显简略，故本文在先生论证的基础上详其所略，略其所详。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一》，第 31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一》，第 31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一》，第 31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一》，第 31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一》，第 31 页。
⑦（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一》，第 32 页。
⑧（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一》，第 31 页。

中的诗无序、《离骚》序的作者是东汉王逸而非屈原、秦汉时期的古诗无序以及孟子、荀卿、左丘明、贾谊、刘向和其他论说《诗》的人亦无一语论及《诗序》为据，推测诗可以不必有序，故《诗》之《序》很有可能非当时所作。

对于《诗序》作者是谁，向来众说纷纭，张西堂先生在《诗经六论》一书中将前人论述加以总结，认为大约有十六种说法。[①]其中，《诗序》是子夏所作和《诗序》是毛公所作是最常见的两种说法。在论《诗序》作者时，晁说之首先对这两种说法提出不同意见。

他提出《诗序》并非子夏所作，主要是从子夏严守礼教的特点入手进行分析论述，他说："子夏苟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正而抑篡弒，尊王而贱夷狄，明乎周之王业，谨乎风雅颂之体，则序《诗》者非子夏也。"[②]即认为子夏是孔子学生，定会谨遵师教，故会从《春秋》以及春秋大义。但晁说之发现《诗序》中有多处与《春秋》以及春秋大义不符的地方：其一，《春秋》对隐公十年周王命诸侯伐宋时卫宣公不从王伐宋[③]一事贬卫宣公，《诗经·伯兮》记载桓公五年卫人从王伐郑的事，若按《春秋》评价标准评析此事理应褒卫从王伐郑，然《诗序》不仅未赞卫人从王伐郑反而刺周王不体恤民情而出师。其二，《春秋》中记载了周桓王五聘于鲁[④]的事情，表明在周桓王时期王室并无威严可言，诸侯对周王及王室也并不亲近。《诗经·葛藟》的序言："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⑤]其实，自平王东迁后王室地位逐渐下降，根本不会出现此序所说的平王"弃其九族"的事，更多的是《春秋》所记桓王五聘于鲁这样周王室降低身份亲近诸侯的事。其三，《春秋》推崇的是"与正而抑篡弒"[⑥]，晁说之据此认为郑昭公姬忽是郑庄公的长子理应当立，然《山有扶苏》《蓷兮》《狡童》的序却皆

① 具体参见张西堂：《诗经六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年，第 120-125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二》，第 34-35 页。
③ 晁说之所作《诗之序论二》原文是"文宣工不知从王伐郑，《春秋》罪之矣"，然桂枭先生认为说之在这所言有误，应是隐公十年，卫宣公不从王伐宋。具体论证见于桂枭：《宋代党争与<诗经>学转型——晁说之<诗经>学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18 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年，第 126-127 页。
④ 周桓王五聘于鲁指的是桓王派人五次来鲁国聘问的事情。这五次分别是：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来聘；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据《礼记·曲礼》言："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但在这里却是天王聘诸侯，可见周天王无威严可言。
⑤（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64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二》，第 33 页。

言“刺忽也”，而晋武公是杀了晋侯缗才成为晋国君主的，属于“内弒而盗立之君也”[①]，《无衣》的序却言“美晋武公也”。即在晁说之看来，郑昭公这类按照正统而继承君主之位的人不能有“刺”，而晋武公这类内弒而盗成为君主的人则不能有“美”。其四，晁说之指出“尊王而贱夷狄，天下通义也”[②]，秦襄公获得周王室赠予的岐山以西的土地与刘聪、刘曜等人制造永嘉之乱来开拓疆域领土得到性质是差不多的，均不应有美誉。然《驷铁》、《小戎》的序却言“美襄公也”。基于以上几点，晁说之认为谨遵师教而从《春秋》大义的子夏是不会写出与《春秋》大义格格不入的《诗序》的。最后，他引韩愈所说的“子夏不序《诗》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③]再次强调子夏身处乱世，诸侯仍存，绝不会如《诗序》那样“暴中冓之私”而“美刺”诸侯的。此外，他还对部分学者所主张的《韩诗》的叙和《毛诗》的序均为子夏所作提出质疑，说：“是何一人之手异同如此邪？无乃各托所尊以求信于人乎？”[④]认为如果都出自子夏，二者的差距不会那么大。总之，在他看来《诗序》并非子夏所作。

对于《诗序》是否为毛公所作，他虽说“予疑不能明”[⑤]，但从其所论可知他的观点倾向于《诗序》非毛公所作。他先指出毛公从未提及《诗序》，说：“毛公无一言以及序，而传诗甚略，得非以其大旨已见于序欤？”[⑥]认为不仅毛公未提及《诗序》，而且《毛诗训诂传》（以下简称《毛传》）本就十分简略根本无需用《诗序》表达其大旨。随后指出《诗序》与《毛诗》亦存在多处不合之处，如《彤弓》的序曰：“天子锡有功诸侯也”[⑦]，《毛传》却说：“彤弓，朱弓也，以讲德习射。”[⑧]前者将彤弓视为一种特别的赏赐，后者则认为只是平常的一种礼而已，二者释义不同，故毛公很有可能不是《诗序》作者。

在对《诗序》作者是子夏和毛公的观点提出反对意见后，他又对《诗序》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二》，第 33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二》，第 34 页。
③ 韩愈现存文集中并无此段记载，此段引文见于（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二》，第 35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三》，第 36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三》，第 35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三》，第 36 页。
⑦（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624 页。
⑧（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626 页。

文本进行分析，认为“其多骈蔓不纯之语，亦似非出于一手故也”[①]。他说：

> 序《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鸤鸠》“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采绿》“刺怨旷也。幽王之时多怨旷者也。”其骈蔓无益多如此。序《樛木》“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谓之“逮下”可也，诚于“逮下”，则何嫌于“嫉妒之心”耶？序《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谓之“伤己”可也，庄姜近无以制“州吁”，而远念旧恶于先君，则孰谓先君之思耶？其骈蔓自戾多如此。《春秋》闵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卫。”序《定之方中》曰：“卫为狄所灭。”不亦过乎？序《木瓜》则曰：“卫国有狄人之败。”又何其不及耶？其不纯多如此。《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为注；《般》之注曰：“般，乐也。”或以为序。失其传又多如此。[②]

他指出《子衿》、《候人》、《采绿》等序多冗词赘句，《樛木》、《日月》等序则前后文互相矛盾，《定之方中》和《木瓜》的序对闵公二年狄入卫之事所言或太过或不及，《桓》的序看起来像注，《般》的注看起来像序等等，故他认为《诗序》绝非一人所作而应是习《诗》之人为习《诗》所作，指出习《诗》之人“断会一诗之旨而序之”[③]，只是为了“庶几乎发明先民之言，以告后生弟子”[④]，故所言与《诗》本义有些差距。也正是基于这个观点，他对李延寿等人的观点比较认同，他说：“魏郑公、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谓《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卫敬仲又加润益之，其言良有以夫。”[⑤]即认为李延寿等人所说的《诗序》是由子夏所创，毛公、卫宏等人加以补充、改正而成的观点基本正确。

除了分析和论述《诗序》是否与《诗》同作以及《诗序》的作者外，晁说之还对《诗序》的文本提出质疑，他认为不可尽信《诗序》，他说：“诸儒之论与序《诗》者异，而谓序无一言非者，非余所学也。”[⑥]即认为《诗序》亦存在不合理之处。此观点的提出是基于他对《诗序》文本的分析，他说：

> 序《庭燎》因以箴宣王，则《云汉》之作妄也。序《沔水》规宣王，则《韩奕》之作妄也。序《鹤鸣》诲宣王，序《白驹》《黄鸟》《我行其野》刺宣王，则《崧高》《烝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三》，第 37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三》，第 37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一》，第 31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一》，第 31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三》，第 38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四》，第 39 页。

民》之作妄也。序《祈父》刺宣王，则《江汉》之作妄也。[①]

他指出《庭燎》《云汉》《沔水》等序对周宣王的“美”与“刺”不一，前后矛盾，即在他看来，《诗序》对宣王的评价应前后一致。然而，他的这个观点也并非完全正确，若对一个人的若干行为只褒或只贬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诗序》中对人物的评价存在前后褒贬不一并不能作为其质疑《诗序》文本的依据。

不过，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论据支撑其观点，他说：

> 序《驺虞》“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者，风其为雅欤？文王其为僭王欤？序《鱼丽》“美万物盛多，可以告神明”，雅其为颂欤？序《闵予小子》“嗣王朝于庙也”，《敬之》“群臣进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颂其为小雅欤？[②]

晁说之指出《驺虞》若据序而言似乎不属于“风”而是“雅”；《鱼丽》若据序而言似乎不属于“雅”而是“颂”；《闵予小子》《敬之》《小毖》若据序而言似乎不属于“颂”而是“小雅”。对于如何定性为“风”“雅”“颂”，他主要依据《诗序》所说的“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③]来判断。藉此，他指出《诗序》大序文本对“风雅颂”的定义与小序中对各诗的叙述并不一致，前后矛盾，故《诗序》不可尽信。

他通过对《诗》和《诗序》的文本进行分析，指出《诗序》与《诗》并非同时所作，而且《诗序》既非子夏所作亦非毛公所作而是由子夏所创，毛公、卫宏等人加以补充、改正而成的，针对《诗序》中前后文本的不一致性，他则提出不可尽信《诗序》。

二 以《春秋》解《诗经》

晁说之借用《春秋》解释《诗经》源于其对孟子所说的“《诗》亡然后《春秋》作”[④]的理解，他说：“若之何谓之亡耶，其可不约《春秋》以为《诗》乎？”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二》，第 34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二》，第 34 页。
③（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6-18 页。
④（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226 页。

[①]桂枭先生对晁说之《诗经》学思想进行分析时指出：“晁说之的‘约《春秋》以为《诗》’不只是以《春秋》中的记述为解释《诗经》的历史背景，更著重于从《春秋》义法中寻找判断《诗经》经义的依据。”[②]诚如先生所言，晁说之在分析子夏非《诗序》作者时就借用《春秋》大义进行论证，此点已在前文论述，故不赘述。又如他在论及《豳风·七月》的历法时则引用《左传》申丰之言所说的“日在北陆而藏冰”进行论证，也是以《春秋》解《诗经》。[③]

另外，他曾就秀才张仔提出的能否以《鲁颂》质《春秋》的问题给予回答，他说：

> 辱书以《鲁颂》质《春秋》为问，甚善。此义在新学未出前学者犹及之，新学务以碎义，以铢称锱纷然，卒使铢锱两失而落于恍惚杳冥中，谁能斯之问哉？足下但观鲁僖公宜有颂乎？周王不作而鲁公僭颂，夫子不得而轻重之，遂亦颂之。则彼异姓庶邦初不以周礼称者，吾尚何望也耶？平王之诗降而风，僖公之诗僭而颂，则天下之治乱可胜言也耶？春秋之王可没而夫子之，鲁僖公之颂不可没而颂之，则僖公之罪大于吴楚之僭王矣。彼颂之体制，事之有无，与夫僖公之为人，尚何待质之《春秋》哉？说之孤陋，偶不及闻前辈说此果如何。[④]

在这里，他先对张仔能提出这个问题表示赞赏，认为张仔能在新学兴盛之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属不易。随后他对这个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指出周平王作为周王理应作颂，鲁僖公作为诸侯王本应不作颂，然《诗经》中却将平王的诗降为风，将僖公的诗僭为颂，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若试图用鲁僖公有颂诗去质问《春秋》亦是不可以的，他提出“颂之体制，事之有无，与夫僖公之为人，尚何待质之《春秋》哉？”即不应以《诗经》的不合理之处去质问《春秋》。这也就意味着，晁说之所提出的“约《春秋》以为诗”只是主张用《春秋》去解释《诗经》，并不主张逆向用《诗经》去理解或质问《春秋》。

总之，无论是他论《诗序》与《诗》是否同时所作还是论《诗序》作者或论《诗序》是否可信均显露出他对《诗序》的质疑，而以《春秋》解《诗经》则体现了其治《诗经》的独特学术路径。

---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答贾子庄书》，第 14 页。
② 桂枭：《宋代党争与<诗经>学转型——晁说之<诗经>学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18 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年，第 128 页。
③ 这一点，桂枭先生在《宋代党争与<诗经>学转型——晁说之<诗经>学考论》所述甚详细。详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18 辑），第 130-132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答张仔秀才书》，第 9 页。

第二节 晁说之的《四书》学思想

“四书”一名起于宋代，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儒家典籍的专名。除《大学》外，晁说之对“四书”中的《论语》《孟子》《中庸》均有阐述，注解《论语》作《论语正义》，质疑孟子作《诋孟》一篇，论《中庸》作《中庸传》一卷，亦有散论分布于文集各处。大体而言，他的《四书》学思想可用尊信《论语》、质疑《孟子》以及释《中庸》而不尽信《中庸》来概括，那具体而言，晁说之是如何尊信《论语》，如何质疑《孟子》，又是如何释《中庸》而不尽信《中庸》的呢？

一 尊信《论语》

晁说之对《论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所作的《论语正义》中，《嵩山文集》亦留有一些散论，将他的这些论述加以分析之后发现他对《论语》十分尊信。他曾上《奏审覆皇太子所读<孝经><论语><尔雅>劄子》建议东宫官讲学时先读《孝经》再读《论语》，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太子入德，在劄子中他还对当时“学者发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论语》”[①]的现象表示叹惜，故此幅劄子可从侧面反映出他对《论语》的尊信。

他对《论语》进行注解所作的《论语正义》虽已亡佚，但可从蔡节的《论语集说》和朱熹的《论语集注》中辑出七条，[②]综合分析此七条后可知晁说之注解《论语》并不是单纯的注解《论语》所言的意思，而是将重点放在解释《论语》为何这样言上，即他试图用自己的解释维护《论语》的合理性，而这也正是其尊信《论语》的表现。

如在《大辩后说》中他对《论语·学而》为何言“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给予解释，说：

> 仁义一也，忠孝一也，其敬一也，若其所事则有不同者。子之于父，一家之事焉尔，臣事则国事也。谏争则忘其生，军旅则誓以死，奉使则死不辱，未尝顾其家也，家事则未尝不顾吾国也。故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③]

他指出事君时或因谏争亡其生，或因军旅誓其死，或因奉使死不辱，都是将生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奏审覆皇太子所读<孝经><论语><尔雅>劄子》，第 47 页。
② 此七条可见于《附录》B。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四《大辩后说》，第 12 页。

死置之度外的表现，故《论语》言“事君能致其身”。

又如对《论语·述而》中“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注解时，说：

> 当时有称夫子圣且仁者，以故夫子辞之。苟辞之而已焉，则无以进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将使圣与仁为虚器，而人终莫能至矣。故夫子虽不居仁圣，而必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处也。①

他指出孔子拒绝他人对其“圣且仁”的评价是因为孔子知晓“圣与仁”是人终其一生也不能达到的境界，故孔子不以“圣与仁”自居，而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处。

再如他对《论语·里仁》“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颜渊》“不忧不惧”以及《论语·乡党》“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等进行注解时，说：

> 依于义而行，则此既宜之，故无所怨；依于利而行，专利于此，贻害于彼，不胜怨也。②

> 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故无入而不自得，非宾有忧惧而强排遣之也。③

> 孔子，定公九年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间绝无朝聘往来之事。疑使摈执圭两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如此尔。④

他将“依于义”和“依于利”而行的目的和后果进行对比，指出“依于利”而行是专注于自己的利益而危害他人利益，所以才会招致怨恨，故言“放于利而行，多怨”。对“不忧不惧”他则解释为因德全故不忧不惧。对《论语·乡党》的注解则与前几条不同，他指出孔子在定公九年到十三年这段期间没有朝聘往来之事，故认为《乡党》“使摈”“执圭”这两条所言史实有误，他接着表示不能因此质疑孔子所秉承的礼。换句话说，晁说之认为《论语》所记史实的错误不能掩盖《论语》中所含义理的正确性，即他对《论语》所含义理是十分认同的。

另外，在论学与思孰轻孰重时，晁说之则倾向于孔子所说的思不如学的观点，他说：

> 老罢尝谓学而不思者，不足以为学，而适足以为罔；彼思而不学者，亦不足以思

①（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四《述而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01 页。
②（宋）蔡节：《论语集说》卷二《里仁第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颜渊第十二》，第 134 页。
④（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五《乡党第十》，第 118 页。

称，而徒殆耳。二者何不兼修并进乎？如不得已，二者孰重？盖学为重，则善学者必精思，如不已于行者，必图所济。苟徒思而幸得之，则不顾学矣。如世富贵，动如所欲，岂服稼穑艰难哉？夫子固以身为众人率也，其言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可谓勤矣，而卒无益，不如学之益我也。有思涉者，当益之以舟航。若曰一岁之思不如一日之学也。其后子夏得此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之，曰仁。又其后子思得此道，博学之则审问之。而后慎思之则明辨之，终以笃行之。[①]

对于学与思，他首先主张的是学与思兼修并进。至于二者不能兼修并进的情况下，他则主张学重于思。他认为“善学者必精思”，即善于学习的人亦擅长深思，随后他引用孔子所说的“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②]和子夏所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③]重申学重于思的观点，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对孔子及《论语》中所含义理的赞同。

总之，无论是他建议东宫讲学时读《论语》或是其《论语正义》尊《论语》义理，亦或是他论述学与思孰轻孰重时引《论语》支撑其观点均可以看出他对《论语》的尊信。

二 抵制《孟子》

周予同先生将孟子及《孟子》在唐宋间发生的重大变化过程称之为“孟子升格运动”，[④]已被学界广泛接受。然而，我们亦应注意到在孟子升格过程中也产生了一股“非孟”或者说“疑孟”思潮。晁说之便是这股思潮中持“非孟”观点的学者之一，[⑤]因其《诋孟》一篇的亡佚，故只能从《嵩山文集》中窥看其“诋孟”思想的大概。

将他对孟子及《孟子》的论述进行整理和分析后发现他多次对《孟子》文本中的部分观点提出质疑，而这大抵是其“诋孟”的主要原因。如《儒言》所收录的《大神》、《善美》和《心迹》三篇文章都对《孟子》中的一些观点提出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答张直孺先辈书》，第 6 页。
②（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16 页。
③（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256 页。
④ 周予同先生在《群经概论》中将孟子其人和其书在唐宋间的变化称为“孟子升格运动”，详见周予同：《群经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75 页。
⑤ 余允文在《尊孟续辨序》中说：“近世如何深之《删孟》、晁说之《诋孟》、刘原父、道原、张俞辈皆非议孟子，然皆不取信后学兹同，不足辨。”（余允文：《尊孟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7 页。）其中，列举疑孟的学者时便提及晁说之及其《诋孟》。

质疑，他说：

《易》以大人圣人为一位，而不达孟子答问之言者，以大人未至于圣，书之圣神，文武为一。已而为庄子荒唐之言所惑，则复自有神人。横渠先生亦云:“圣不可知为神。”庄生缪妄，又谓有神人焉。①

或因孟子可欲充实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顾孔子叹《武》之尽美而未尽善，乾元为善而利以美称邪？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谨乎训字之名，学者之大患也。②

孟子以心却之，无以辞却之，判心迹为二端。是教天下之伪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杀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赖夫贤哲欤？③

《大神》和《善美》均是针对《孟子·尽心下》中所说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④而作的。在《大神》中他指出《易》中仅言大人和圣人，而《孟子》中除了大人、圣人之外还言神人，显然是被庄子的荒唐话所迷惑的。在《善美》中他则指出孟子将可欲称之为善、充实称之为美，显然是忽略了孔子对《武》乐评价时所说的“尽美矣，未尽善也”，即认为孟子“善不及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还指出如孟子这样“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谨乎训字之名”是学者经常犯的错误。《心迹》则是他对《孟子·万章下》“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⑤的批评，他认为孟子将心迹叛为两端会使人们心迹有二、言行不一，故反对将心迹视为两端。

又如他在《卢沃字子献序》中对《孟子·离娄上》所说的“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孟子周流不遇，疾愤群小在位，一时之言”⑥，不可尽信，指出想要献忠心之人不是非大人不可。在《大辩》和《志学》中他主要对孟子“分仁义于君亲”的观点进行批判，他说：

昔之人分仁义于父子君臣之间，曰仁不遗亲，义不遗君。又曰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盖为一家户牖之言也，质诸孔子则戾矣。吾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又曰“以孝事君则忠”，又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焉云尔，则无分乎仁义也。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先儒谓父子之常道，加以尊严，又有君臣之义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神人》，第 1-2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善美》，第 27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心迹》，第 22 页。
④（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394 页。
⑤（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279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七《卢沃字子献序》，第 31 页。

也。愚尝观《易》象，《家人》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温公谓"家人之中，父母之事，即得尊君之道，故特曰父母之谓也。"愚以是知君父无二体，忠孝非两端，仁义不可于君臣父子而分矣。①

后乎孔子，而因曾子之辞气，不尽信书，分仁义于君亲，以亢乎孔子者，孟子之徒也。②

他指出《孟子·梁惠王上》所言"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③即"仁不遗亲，义不遗君"的观点与《孟子·尽心下》所言"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④都是分仁义于君亲，是孟子一家之言，不可尽信。接着指出孔子在《孝经》中所说的"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⑤"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⑥"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⑦等均体现了孔子合仁义于君亲的观点，此外，《家人·彖》所说的"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⑧以及司马光对《家人》卦的注解均未分仁义于君亲。因此，他认为君父并无二体，忠孝亦非两端，仁义不可与君臣父子而分，故 反对孟子分仁义于君亲的观点。

另外，他在与吕公著之孙吕好问的书信中也存有其对《孟子·离娄下》"人乐有贤父兄"⑨的评价，他说：

乐贤而恶不才，在敌以上有所不行，况吾父兄之间哉？父兄天性，甘勉其孝悌而不能已，宁知所乐贤不贤耶？贤可乐矣，顾不贤则如之何？且如何而可谓之贤？颜氏之子、闵氏之弟，视孔鲤不免有惭色矣。舜五十而慕，为瞽瞍之贤欤？文王问王季安否而忧喜，王季之德不与也。孔子亦曰："喜父母之年耳。"以此三圣人之迹求之，似孟子之言无所当也。⑩

他认为父子兄弟之间只需要注重"孝悌"即可，不必因其贤而乐。接着指出舜五十岁怀念父母与瞽瞍贤不贤无关、文王问其父王季安否而忧喜与王季的德行无关、孔子因父母高寿而欢喜亦与其父母贤不贤无关，故其认为孟子所言"人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四《大辩》，第 11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四《志学》，第 28 页。
③（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3 页。
④（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393 页。
⑤（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6 页。
⑥（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4 页。
⑦（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34 页。
⑧（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58 页。
⑨（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218 页。
⑩（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与吕舜徒书》，第 10 页。

乐有贤父兄”并不恰当。

而他“诋孟”则主要表现为他反对“孔孟”并称和奏请去《孟子》于讲筵这两件事情上。他主要以《春秋》“尊一王”以及《孟子》中存在多处与《春秋》大义不合为由反对“孔孟”并称，此点已在本文对晁说之《春秋》学思想进行论述时已说明，故在此只论其奏请去《孟子》于讲筵一事，他曾上书《奏审覆皇太子所读<孝经><论语><尔雅>劄子》，说：

> 臣闻《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与《礼》之尊无二上，其旨实同，盖国之于君，家之于父，学者之于孔子，皆当以而不可二者也。……今国家五十年来于孔子之道二而不一矣，其义说既归之于老庄，而设科以《孟子》配六经，其视古之黜百家而专明孔氏六经不亦异乎？前者学官罢黜孔子《春秋》而表章伪杂之《周礼》，以孟子配孔子而学者发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论语》，固可叹矣。……臣愚切以为宜讲《孝经》而读《论语》，恭俟讲说《孝经》毕日，复讲其已读之《论语》，则其入德亦以易矣。或间日读《尔雅》，以视文字训诂之本源，而明天地百物之名实。先儒谓《尔雅》本是周公训成王之书，信不诬也。[①]

他建议东宫讲学时先读《孝经》再读《论语》、《尔雅》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太子“入德”而且有利于太子知“文字训诂之本源”，明“天地百物之名实”。指出设科《孟子》配享六经，与《春秋》所倡导的“尊一王”并不相符，故奏请去《孟子》于经筵。而在这幅劄子的最后他还预言自己的这个观点定遭他人侮谤，他说：“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侮谤不浅矣。”[②]也正如其所料，他建议东宫废读《孟子》一事很快得到时人胡舜陟的反对，胡于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上《奏请诏东宫官读<孟子>疏》，说：

> 伏见中书舍人晁说之之奏，乞皇太子讲《孝经》，读《论语》，间日读《尔雅》，而废《孟子》。臣窃谓孔氏之后，深得圣人道者，孟子而已。汉扬雄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又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唐韩愈以为“道者尧传之舜，舜传之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曰：“孟氏醇乎醇，功不在禹下。”……本朝欧阳修曰：“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苏洵曰：“孟子之文，语约而意深。”苏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奏审覆皇太子所读<孝经><论语><尔雅>劄子》，第46-47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三《奏审覆皇太子所读<孝经><论语><尔雅>劄子》，第47页。

轼曰：“自孔子没，诸子各以其所闻著书，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无有统要。若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矣。”……神宗皇帝圣学高明，尤好其书，故以之设科取士。说之本州县俗吏，初无学术，岂知孟子？乃以为百家而黜之，不惟欺罔圣德，使皇太子不闻七篇之义，以开发智慧。臣恐此说一传，惑天下学者，使后进相习成风，妄出臆见，抵经诮史，无所不至，害教甚矣。愿陛下诏东宫官依旧例先读《论语》，次读《孟子》。①

胡舜陟明言他此封奏疏是因晁说之奏请东宫弃讲《孟子》所上。他认为孟子是孔子之后，最深得圣人之道的学者，又引扬雄、韩愈、欧阳修、苏洵、苏轼等人对孟子的评价，认为神宗皇帝设科《孟子》取士是高明之举。至于晁说之乃“州县俗吏，初无学术”，提出废读《孟子》乃是“欺罔圣德”，并认为若去《孟子》于讲筵将“惑天下学者，使后进相习成风，妄出臆见，抵经诮史，无所不至，害教甚矣”。

另外，亦有学者将晁说之“诋孟”思想定性为为反王安石而反孟，如南宋学者汪应辰在《与吕逢吉书》中曾说：“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尊孟子，并孟子而非之。”②认为晁说之的“诋孟”思想是为了反对王安石新学而提出来的。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析《儒言》时沿袭这一观点，说：“至于因安石附会《周礼》而诋《周礼》，因安石尊《孟子》而抑《孟子》，则有激之谈，务与相反，惟以恩怨为是非，殊不足为训。”③然结合其对《孟子》文本的质疑可知，他“诋孟”思想并非单纯为反王安石而反，亦是他的学术见解。

总之，他对孟子和《孟子》的抵制虽存有为反王安石而抑《孟子》的嫌疑，但从质疑《孟子》文本到反对“孔孟”并称和请去《孟子》于经筵，又显现出他对孟子及《孟子》的抵制大部分源于他对《孟子》文本质疑。

三 释《中庸》而不尽信《中庸》

晁说之不满近世学者将中庸分为二事的观点，进而将《中庸》支分节解为八十二节，并借助胡瑗、程颢、司马光等人对《中庸》的论述逐条加注作《中庸传》一卷。在《中庸传》中他不仅提出了“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一物”的观点，还对《中庸》的部分文本提出质疑，故他的《中庸》学思想大致可用释中庸而

①（宋）《靖康要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91-192 页。
②（清）黄宗羲、全祖望著，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 896 页。
③（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二《子部二・儒家类二》，第 2359 页。

不尽信来概括。

他指出近世学者谓“既极高明而反道中庸，末乎中庸也”[①]是将高明、中庸分而为二事，不知“诚之一致”的缘故，并对这些学者提出质问，说：“或者既以一事极高明，又正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刚柔缓急相济之常理,何必是之云哉?广大精微之类亦然。”[②]认为高明、中庸为一物如“日正中而万物融和，未尝槁物作疹也”[③]，此为常理不必论说。他的这个观点在《中庸传》中则具体表现在他将诚、明等皆谓之中，他在注解“率性之谓道”时说：“曰诚、曰明、曰孝、曰忠、曰恕、曰和，皆率性之具也。是六者，皆中之所以为中者也。”[④]在《答朱仲髦先辈书》中亦言：“如析《中庸》为二端，不知其所谓中者用之，则曰和、曰孝、曰礼、曰智、曰仁、曰勇、曰强、曰纯、曰一、曰明、曰诚，其实皆中之谓也。以故彼之学者惟知过不及谓之中，而于肫肫、渊渊、浩浩、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则莫之知也。”[⑤]即在晁说之看来，明、诚、忠、孝、和、仁等等都可谓之中。

将《中庸传》进行分类归纳后可知，他在注解时直谓诚、明、忠恕、礼等为中的地方共十四处。[⑥]其中，直谓“中也，诚也”的地方有九处，如其在注解“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而不能载焉。语小，天下而不能破焉”[⑦]时说：“中也，诚也。语夫天下莫能事之大，则其大者，诚也。语夫天下莫能分之小，则其小也，诚也。盖虽大而中也，其小亦中也。人谁有憾于予哉？”[⑧]认为无论是大是小皆可以诚，皆可以中，人不必因为比天地小而有憾；直谓“中也，明也”有三处，如注解“《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⑨]时说：“中也，明也。”谓忠恕为“中”的地方有一处，即释读“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中庸传》，第 17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高明中庸》，第 4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高明中庸》，第 4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中庸传》，第 1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答朱仲髦先辈书》，第 38 页。
⑥ 因内容较多，故不一一列举，详情可参见附录 C。
⑦（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429 页。
⑧（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中庸传》，第 5 页。
⑨（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429 页。

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①]时说：“忠恕之为中也，均率是性，而为道莫之或远也。远于人则可须臾离也，以其不远人，而忠恕之名立也。为人父而忠恕，则已与一家去道不远也。为人君而忠恕，则已与天下国家去道不远也。忠恕以人治，人犹己，肫肫其中也。”[②]认为“忠恕”之道即是“中”；谓礼为中的地方有一处，即在注解“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③]时说：“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政犹地道之勉乎。树艺稼穑也，中庸之政，感人心而迹自化，蒲庐之比也。仁义者，诚明之异名也，仁义合而礼生焉。礼也者，广骛驰骋于仁义之中者也。”[④]则是将“礼”谓之“中”。

除了单独的将“诚”或“明”谓之“中”外，他还将“诚”“明”合体，并提出“中庸也，诚明两尽而道教行也”或“中庸也，明诚两尽而道教行也”的观点，如他在注解“子曰：‘舜其大知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斯以为舜乎！’”时说：“舜之所以为舜者，中庸也，明诚两尽而道教行也。”[⑤]认为舜之所以是舜的原因在于他行中庸之道，能够做到明诚两尽。在注解“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时亦用类似说法，说：“回所以为回者，中庸也，诚明两尽而道教行也。”[⑥]总之，在晁说之看来无论是“明诚两尽而道教行”还是“诚明两尽而道教行”均是中庸，而这个观点的提出源于他对《中庸》中“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⑦]的理解，他说：“诚明各有所致而相为用也。四时诚矣，较然著见，则自诚而明之，性也，犹天命之性也；日月明矣，其出入有信，则明而诚之，教也，犹修道之教也。未有诚而不明者也，未有明儿不诚者也。彼偏焉者，非诚明之正也。”[⑧]即在他看来，有诚则有明，有明则有诚，二者是共存

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430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中庸传》，第 5-6 页。
③（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440 页。
④（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中庸传》，第 9-10 页。
⑤（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中庸传》，第 3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中庸传》，第 3-4 页。
⑦（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447 页。
⑧（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中庸传》，第 13 页。

的，亦都是中庸。

另外，他在释读《中庸》时还指出《中庸》文本中有八节“脱缪”之处。其中，有四节他均以“无闻焉尔也”为由怀疑是《中庸》简编“脱缪于此”。如释读“子曰：‘舜其大孝也欤！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①]时说：“无闻焉尔也，疑简编缪于此也。”[②]其余四节他则借用郑玄、陆淳、胡瑗、司马光以及程颢和姚子张等人观点提出质疑，如对“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③]提出质疑时，就直言郑玄、胡瑗曾云此处脱误。[④]

总之，他反对学者将高明、中庸析分为二，进而注解《中庸》作《中庸传》并提出“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一物”的观点，其在释读《中庸》的过程中还对《中庸》部分文本指出脱误情况，体现了其释《中庸》而不尽信《中庸》的思想。

小结

因《诗晁氏传》、《毛诗传》等《诗经》学著述皆亡佚，故他反对《诗序》与《诗经》同时作，认为《诗序》非子夏独作亦非毛公独作而是多人合作，认为《诗序》亦不可尽信，并主张用《春秋》理解《诗经》的思想只是其完整《诗经》学思想的一部分而已。而他的《四书》学思想则主要体现在他对《论语》、《孟子》和《中庸》的态度上，从他建议东宫讲《论语》、为使《论语》的义理合理化而注解《论语》以及引用《论语》观点作为论据来看，他对《论语》是十分尊信的。而他对《孟子》则有着与《论语》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不仅质疑《孟子》文本，还反对“孔孟”并称和设科《孟子》取士。在释读《中庸》时不仅提出“极高明而道中庸为一物”的观点还指出《中庸》脱误之处，认为不应尽信《中庸》文本。综合其《诗经》学和《四书》学思想可知，他除了对《论语》比较尊信外，对《诗序》、《孟子》、《中庸》等均存在质疑，而这足以显现其“尊古”和“求实”[⑤]的学术观。

①（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435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中庸传》，第 7 页。
③（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440 页。
④ 郑玄注此句时说：“此句其属在下，著脱误重在此。”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1440 页。但胡瑗所言今未见。
⑤ 张剑先生在《晁说之研究》一书中认为晁说之具有“尊古”和“求实”的学术观。具体论述可参见张剑：《晁说之研究》，第 136-149 页。

第五章 晁说之经学思想的特点及影响

晁说之博极群经，经学思想广涉《易》学、《春秋》学、《诗经》学及《四书》学多个方面。与此同时，他于经学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博采众家、取中有舍、在尊经的同时亦疑经，形成独具特色的经学思想，也正因如此，他的观点经常引天下人与之争论，然其确乎自信，卒成一家之言。后世学者在论《易》、《诗经》 时亦经常引用或评论其观点，故其经学思想亦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具体而言，晁说之经学思想有着怎样的特点和影响呢？

第一节 晁说之经学思想的特点

晁说之于经学不仅远追商瞿、京房等人的思想还博引邵雍、司马光等近世学者的观点，可谓博采众家。此外，他在尊信《周易》《春秋》《论语》等原典的同时亦对后世注解的《周易》和《诗序》等提出质疑，表明其在尊经的同时亦疑经，故晁说之的经学思想的特点大致可用博采众家和尊而有疑来概括。

一 博采众家

陆游在《景迂先生祠堂记》曾说：“公（晁说之）之学深且博矣，于《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于《书》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于《诗》杂以齐、鲁、韩三家，不梏于毛、郑，于《春秋》考至贾谊、董仲舒，不胶于啖、赵。”[①]指出晁说之的《易》学、《书》学、《诗经》学及《春秋》学皆参考众家之说，揭示了其经学思想具有博采众家的特点。在对晁说之经学思想及其著述进行分析之后深知陆游所言并非虚言。

晁说之在《太极传后序》中曾言：“二十年间，辄作《易传》四种，名曰《商瞿传》，视其有师也。”[②]指出将所作《易传》命名为《易商瞿大传》《商瞿小传》《商瞿易传》《商瞿外传》是因为他认为其《易》学效法的是商瞿。至于这四种《商瞿》传是否真的效法商瞿却因它们的亡佚而无法考证了，只能说他将《易传》命名为《商瞿传》表明他确实有追随商瞿《易》学的倾向。而其所作《古周易》和“《易》《玄》相参”的观点则很大程度上是对邵雍《易》学的吸收和

①（宋）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 238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七《太极传后序》，第 8 页。

借鉴，这些前文已有论述，兹不赘述。由此可见陆游言其“于《易》自商瞿下至河南邵先生”确无虚言。而除了陆游所提及的商瞿、邵雍之外，他对京氏《易》亦有研究。他曾在寻古《周易》的过程中于元丰五年（1082）寻得《京氏传》，又为了更好理解《京氏》易，乃于元祐三年（1088）据《京氏传》作《京氏易式》。即使在初学《京氏传》时知其“文字颠倒舛讹，不可训知”[①]，但并未因此放弃而是继续服习，在习京氏《易》三十四年后“乃能以其象数辨正文字之谬”[②]，校订《京氏传》，之后又于政和六年（1116）据传修订《京氏易式》。从他对京氏《易》服习的时间和重视程度上可断定京氏《易》对其《易》学思想也一定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此外，司马光对晁说之的《易》学思想的影响更是比较明显的，《宋元学案》中载“涑水弟子，不传者多。……景迂得其数学……涑水尝令景迂续成《潜虚》，景迂谢不敢，然《易玄星纪》之谱，足以绍师门矣”[③]、“文正著《潜虚》，未成而病，属先生补之，先生逊谢不敢，然文正之门，传其《太玄》之学者惟先生”[④]、“独景迂湛深经术，亲得司马公之传”[⑤]，不仅将晁说之列为涑水弟子还指出传司马光《太玄》之学的惟有晁说之。南宋韩淲曾说：“《太玄》其辞准《易》，其数可以起历而已，盖得于浑天仪者也。司马君实为《潜虚》，得其用意之所在矣。晁以道作《星谱》，可谓善发明矣。二家之书出，而《玄》之学备，欲观之者当参考也。”[⑥]韩淲将《潜虚》和《易玄星纪谱》列为后人研究《太玄》之学的必备书，这也佐证了《宋元学案》提出晁说之虽未续《潜虚》，然其所作《易玄星纪谱》足以绍师门观点的正确性。此外，晁说之《易》《玄》相通以及《易》《玄》相参的观点亦是在司马光和邵雍二人的影响下形成的，此点在前文亦有论述，兹不赘述。

他在《诗之序论四》中说：“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⑦]指出孟子、荀子、左丘明、贾谊、刘向等人在论说《诗经》时都未有一语提及《诗序》。从他断言孟子等人未有一语提及《诗序》可推测他应该翻阅并通读过他们关于《诗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题京房易传后》，第 4 页。
②（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题京房易传后》，第 4 页。
③（清）黄宗羲、全祖望著，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 1 册），第 4 页。
④（清）黄宗羲、全祖望著，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 2 册），第 860 页。
⑤（清）黄宗羲、全祖望著，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 2 册），第 862 页。
⑥（宋）韩淲、陈鹄撰，孙菊园、郑世刚点校：《涧泉日记·西塘集耆旧续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27 页。
⑦（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一《诗之序论四》，第 38 页。

经》的著述或言论，否则难以做出这样的评说。此外，他还呼吁学者不能因为仅存《毛诗》便处处听信《毛诗》，说：“昔之人于《诗》也，未尝胶固底滞如此也。闻关关者必责之以《关雎》之好德，闻采采者必责以《卷耳》之勤劳，可不可耶在？”[①]认为对《诗经》的解释不应桎梏于《毛诗》一家。而这与陆游所说的“于《诗》杂以齐、鲁、韩三家，不梏于毛、郑”是比较相符的。

对于晁说之“诋孟”思想，全祖望曾言：“景迂不喜孟子，盖亦迂叟之派，其说经不苟同于前儒。”[②]认为晁说之“诋孟”思想大概是受司马光的影响，对二者学术进行分析发现，确实如全祖望所言，司马光的“疑孟”思想对晁说之有一定的影响。如晁说之在反对“孔孟”并称时就曾借助司马光的《疑孟》，在《申刘》中对禹避丹朱进行申辩后指出“其荐益事，则温公辩之矣”[③]，虽从现存文本中未找到司马光对禹荐益一事的论辩，然不能以此而否认司马光“疑孟”思想对晁说之的影响。除司马光外，其“诋孟”思想亦受到荀子、李觏、刘恕等人的影响，如他在《孔孟》和《辩诬》中多次引用荀子诋孟言论，在《辩诬》一文中提及见李觏的非孟言论并产生共鸣，在刘恕质疑《孟子·万章上》“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④]基础上对刘恕意有所遗的地方加以论述作《申刘》等等。

在释读《中庸》的过程中更是旁征博引，据其记载，在《中庸传》中他引程颢所言有四处、先儒和近世学者所言各两处、王肃所言有一处、胡瑗所言有七处、司马光所言有四处、刘敞所言有一处、皇氏和熊氏所言各一处、郑玄所言有三处、陆淳和姚子张所言各一处、二程先生所言一处、张载所言一处，[⑤]他所言与《中庸传》中的引用情况完全符合，由此可见，他于《中庸》更是博采众家。

总之，晁说之于经学不仅追循商瞿、京房、郑玄、陆淳等宋以前学者的学说，还采纳胡瑗、邵雍、司马光等宋代学者的言论，足以显现其经学博采众家的特点。亦如韩淲所言“晁以道最为穷经之士”[⑥]“经史律历，无不精考”[⑦]，而

①（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五《与张明仲书》，第 24 页。
②（清）黄宗羲、全祖望著，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 2 册），第 896 页。
③（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四《申刘》，第 15 页。
④（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258 页。
⑤ 此言记于《中庸传》后“又记”，参见（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二《中庸传》，第 22 页。
⑥（宋）韩淲、陈鹄撰，孙菊园、郑世刚点校：《涧泉日记·西塘集耆旧续闻》，第 22 页。
⑦（宋）韩淲、陈鹄撰，孙菊园、郑世刚点校：《涧泉日记·西塘集耆旧续闻》，第 12 页。

能达到“穷经”或“精考”的条件之一便是能博采众家，集前人之说。

二 尊而有疑

陆游对唐宋时期的学风进行总结时，说：

>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①]

指出自宋庆历后经学学风发生转变，学者对《周易》《周礼》《孟子》《尚书》《诗经》等经学不再盲目尊信而是提出质疑。后清末皮锡瑞释读这段话时说：“宋儒拨弃传注，遂不难于议经。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②]他认为陆游所谓黜《诗序》者说的便是晁说之，然而，在对晁说之经学思想进行分析后可知，他不仅黜《诗序》亦疑《孟子》，不仅疑经亦尊经。

于《易》，他以《周易》文本为据反对以己意注解《周易》。在论证观点时不仅引《易经》《易传》所说作为其论据，还直言《易传》释经详细明了，并以此为出发点指出如义理派《易》学那样以己意注解《周易》并不能洞察到《周易》的真正奥秘，故他尊的是《周易》本身，疑的是后世学者对《周易》的注解和阐释。不仅如此，他还主张恢复古《周易》并作《古周易》，表明其尊古、追古的学术观。

于《春秋》，他借《春秋》“尊王”“重信诛盟”“重地”大义论时政，又专本诸经评《春秋》三传及三传学者。其对《春秋》大义的引用和借鉴已然说明他对《春秋》经的尊重与认同，而从经的角度论三传得失时偏重于三传的不足则显露出他对《春秋》三传的内容与观点并不满意而是有所质疑。

于《诗经》，亦如皮锡瑞所说，他黜《诗序》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论《诗序》是否与《诗》同时作、论《诗序》作者、论《诗序》是否可信的出发点就已表明他对《诗序》的怀疑。而于《四书》，他尊信《论语》，怀疑和抵制《孟子》，释读《中庸》的同时亦指出《中庸》文本的脱落情况，均说明他在尊经的同时

①（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乐保群、田松青、吕宗力点校：《困学纪闻》（全校本），第 1095 页。

②（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20-221 页。

亦对经的传或内容等有所怀疑。

总之，博采众家是其经学思想得以“深且博”的原因，尊而有疑则是其经学思想得以“卓乎独立”“特立独行”的根本所在。他虽采众家，但不肯苟同于笺疏，他虽尊古经，然意在自成一家之言，体现了特立独行、成一家之说的人生和学术态度。

第二节 晁说之经学思想的影响

晁说之在商瞿、京房、邵雍、司马光等人的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学思想，陆游评价其学“卓乎独立，确乎自信”[①]，洪迈指出“晁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②]等等，也正因如此，晁说之的经学思想对后世学者也产生了影响。通过翻阅后世文献发现，他的《易》学和《诗经》学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而《春秋》学和四书学等思想影响甚微，故本文主要分析和论述他《古周易》和《诗经》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一《易》学思想的影响

晁说之的《易》学思想尤其是其主张恢复古《周易》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较大，后世学者凡论说古《周易》必提及晁说之，如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列《古易》五家[③]，其中之一便是晁氏《易》。又如俞琰在《读易举要》中说：“河南吴仁杰撰《易图说》三卷，又集《古周易》、费直《易》、郑康成《易》、王弼《易》萃为一书。后有吕大防《古易》、晁说之《古易》、王洙《古易》、吕祖谦《古易》、周燔《古易》端平丙申吴人何元寿刊于湖广饷所。”[④]亦将晁氏《古易》列为一家。

不仅如此，后世学者在论述《易》时也会评述或引用其《易》学观点，如吕祖谦在《古易》中曾言：“近世嵩山晁氏编《古周易》，将以复于其旧而其刊补离合之际览者或以为不安，祖谦因晁氏书参考传记复定为十二篇。”[⑤]表明吕祖

①（宋）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第 238 页。
②（宋）洪迈撰，穆公点校：《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88 页。
③ 王应麟列《古易》五家：吕微仲、晁以道、睢阳王氏、东莱吕氏、九江周燔。见（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乐保群、田松青、吕宗力点校：《困学纪闻》（全校本），第 105 页。
④（清）俞琰：《读易举要》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宋）吴仁杰：《古周易·东莱吕氏古易》，通志堂经解本。本书原标作者为吕祖谦，但结合俞琰《读易举要》卷四书所论以及《古周易》中的内容可知，《古周易》的作者应是吴仁杰。

谦的《古周易》因晁说之影响才定为十二篇。又如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虽言“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①]，但《周易本义》中亦引用六条晁氏《古周易》中的观点。另外，俞琰在《周易集说》对晁氏《古周易》的态度与朱熹是一致的，即既有批驳亦有引用，他说：“孔颖达谓《系辞》分上下无异义，直以简帙重大是以分之；晁以道乃曰：‘古者竹简重大，分经为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盖皆不知六十四卦约之则为两十八也。”[②]认为晁说之主张合上下经为一大概源于说之不懂“六十四卦约之则为两十八”的道理，与此同时，还说：“吕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岩、吕东莱、朱紫阳皆以分经合传，非古……读易者要当审其是，不可狃于旧说，而复以《彖传》为彖云。”[③]认为晁说之等人“分经合传”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周易。即在他看来，晁说之的这些观点均是不正确的，但这并未影响他对晁说之其他观点的认可或引用，据统计，他在《周易集说》中引用晁氏《古周易》的地方就多达十九处（其中两条与朱熹《周易本义》同），同时，他十分赞同晁说之将《文言》置于《系辞》前，故在《周易集说》中依晁氏《古周易》列《文言传》于《系辞传》前。[④]从上述可知，虽然朱熹、俞琰等对晁说之《古周易》的观点并不能完全接受，但他们在著述中对晁说之观点的评述或引用已然代表着他们对晁氏《古周易》的关注，换句话说，晁说之《古周易》中的某些观点对朱熹、俞琰等人均有所影响。

除了吕祖谦、朱熹、俞琰等宋代学者外，明清学者对晁说之《古周易》的观点亦有引用，如明代熊过的《周易象旨决录》所引约三十条、胡广的《周易大全》所引约二十条，清代惠栋的《周易本义辨正》所引约百条、翟均廉的《周易章句证异》所引约二百多条等等，但他们所引大多细碎或与朱熹、俞琰所引相同，故在此不在赘述。[⑤]总而言之，晁说之《古周易》虽然亡佚，然其部分观点仍旧得到后世学者的关注，对后世学者有着一定的影响。

二《诗经》学思想的影响

晁说之《诗经》著述虽仅存《诗之序论》四篇，然通过查阅现存文献发现，晁说之的《诗经》学思想尤其是《诗之序论》中的观点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其

①（宋）朱熹撰，廖名春点校：《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9 页。
②（清）俞琰：《周易集说》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俞琰：《周易集说》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俞琰：《周易集说》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可见本文附录 C 对晁说之《古周易》的部分辑佚。

《易》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与《易》学思想对后世产生影响的表现形式一样，其《诗经》学思想的影响亦主要体现为后世学者对其《诗之序论》中观点的引用或评说。而最早对晁说之《诗之序论》中的观点进行引用的应该是宋代学者王应麟，王氏在《诗考》一书中对说之认为齐鲁韩三家以《王风》为鲁诗等观点进行引用[①]，虽未进行评说，但已从侧面说明王应麟对晁说之《诗之序论》的关注。

对宋及以后《诗经》学相关著述进行收集和整理的过程发现，从南宋到明这段时期，几乎没有学者关注晁说之的《诗经》学思想。直到清代，关注晁说之《诗经》学思想的学者较以往增多，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在论述《诗经》时往往会提及晁说之在《诗之序论》中的观点，如毛奇龄在《诗传诗说驳义》一书中说："《卷耳》，晁说之曰：'《鲁诗》以此为康王时诗'。……《鹊巢》《采蘩》，晁说之曰：'《鲁诗》以二诗为康王时诗。'《采蘋》，晁说之以此为康王时诗。……《驺虞》，晁说之又谓《鲁诗》以此为康王时诗。"[②]引晁说之《诗之序论》三中的观点加以标注。又如范家相在《三家诗拾遗》说："晁说之《诗序》曰：'《鲁诗》以《苍耳》《鹊巢》《采蘩》《采蘋》皆康王时诗。'今无所考，意《鲁诗》在北宋时或尚未亡耶？"、"《驺虞》，晁说之言《鲁诗》谓诗作于康王之世。皆无他书可证。"[③]他不仅引用晁说之《诗之序论》三中的观点，还指出此观点已无法考证。

另外，亦有一些学者比较关注晁说之在《诗之序论》四中对《凯风》的注解。如黄宗羲在《孟子师说》中说：

> 甬上讲诗至《凯风》章，万贞一言："不安其室，不得谓'亲之过小'"。……后见宋晁说之《诗序之论》云："孟子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而序《诗》者曰：'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于先君无妻道，于七子无母道，过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欤？孟子之言不妄，则序《诗》非也。"始恍然于贞一之说。[④]

---

① 王应麟对晁说之《诗之序论》的引用有五处，其中所引"晁说之论云：'齐鲁韩以《关雎》《葛覃》《苍耳》《鹊巢》《采蘩》《采蘋》《驺虞》《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皆为文王诗。'"有误，晁氏原文为康王诗。王应麟所引详见王应麟：《诗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54、69页。

②（清）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范家相撰，钱熙祚点检：《三家诗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49页。

④（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孟子师说》卷六《小弁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5页。

在这里，黄宗羲讲述了他在讲《凯风》时，对其高足万贞一所说的“不安其室，不得谓‘亲之过小’”半知不解，但后来读了晁说之在《诗之序论》所讲才懂得其中含义。

而阎若璩在《四书释地又续》中则说：

> 宋晁说之以道《诗序之论》曰：“孟子‘《凯风》，亲之过小者也。’而序《诗》者曰‘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于先君无妻道，于七子无母道，过孰大焉。孟子之言妄与，孟子之言不妄，则序《诗》非也。”黄太冲亟取其说，载《孟子师说》。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成志，成母守节之志，非如《郑笺》指孝子自责言。因检《孔疏》亦言“母遂不嫁，为之快绝”。复忆东汉姜肱，性笃孝，事继母，恪勤母，既年少，又严厉。肱感《凯风》之孝，兄弟同被而寝，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叹作诗者，能安母于千载之上，感诗者，亦能安母于千载之下。诗之有益人伦如此，当日采诗者亲睹其事，序诗者申美其事，遂不为圣人所删，《序》曷可非也。盖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尔。若果嫁矣，则真于先君无妻道，于七子无母道，是之谓恶，岂仅仅过而已乎！[①]

阎若璩认为《凯风》与《序》并不相抵触，“采诗者亲睹其事，序诗者申美其事”，故无论是《凯风》还是《序》皆能“安母于千载之上”， 正因如此，他认为晁说之所说的“孟子之言妄与，孟子之言不妄，则序《诗》非也”并不正确。不过，无论是黄宗羲的赞成还是阎若璩的反对均说明晁说之《诗经》学思想在清代仍有影响。

总之，无论后世学者对其观点的认同或引用还是批评等等，都可从侧面反映出其《易》学、《诗经》学思想中某些观点对后世仍有影响。

小结

晁说之经学思想的形成得益于他对京房、邵雍、司马光等人思想的吸纳和发展，他不仅博极群经且博采众家，在尊经的同时又质疑某些不合理部分。而他的经学思想又影响着朱熹、范家相、黄宗羲、阎若璩等后世学者，从吸收前人思想到影响后人思想，使其成为学术传承的重要一员，也让我们感受到学术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传承与发展的。总而言之，在分析其经学思想的特点和影响后，可以深刻感受到晁说之对中国经学史尤其是《易》学和《诗经》学史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①（清）阎若璩：《四书释地·四书释地又续》卷下《凯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结语

回顾学界关于晁说之的研究，从将其放在家族或整体人物中研究再到分析其诗歌、散文，后扩散到对他的专题研究，可以看出对他的重视程度是逐渐提高的。与此同时亦注意到学界缺少对他经学思想的整体研究，而这也成为本文选题的初衷所在。

通过对其生平及经学著述简单的归纳整理，认识到他在官场中沉浮却未迷失自我，在学术中徜徉亦未随波逐流，一直坚守着特立独行、成一家之说的人生和学术态度。而通过对其《易》学、《春秋》学、《诗经》学以及《四书》学等思想进行较为系统和详细地论述，则更为深刻的认识到无论是其主张恢复古《周易》、反对以己意注解《周易》、提倡《易》《玄》相参的《易》学思想，还是借《春秋》论时政、从“经”的角度评析《春秋》三传的《春秋》学思想，亦或是论《诗序》作者和内容、以《春秋》解《诗经》的《诗经》学思想，又或是尊信《论语》、抵制《孟子》、释《中庸》而不尽信《中庸》的《四书》学思想都有着博采众家之说、尊古而又疑古的特点，同时又体现出其特立独行、成一家之说的人生和学术态度的追求。

其经学思想的形成得益于他对前人学说或思想的借鉴、吸收或批判，而他的经学思想则影响着后世学者，如他批判那些以己意注解《周易》的学者，服习《京氏》易几十年又吸收借鉴邵雍和司马光等人《易》《玄》相通、《易》《玄》相参的观点而最终形成独特的治《易》路径和《易》学思想，而他的《易》学思想尤其是关于《古周易》的见解又影响和启发着吕祖谦、朱熹、俞琰、胡广等人。这也正是思想和学术传承的完整链条，即在借鉴和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思想或学术体系，又影响着后人学术思想和体系的构建，如此循环才使得学术思想不断发展。此外，他于经学，不肯苟同于一家之言，既远追古人之师又近采学者之说的治学路径更是提醒着当代学者在学术研究中不应囿于一家之言而应博采众家之长，形成独具特色又不失逻辑的学术思想。

总之，晁说之的经学思想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影响深远，其价值远高于世人对他的评价，亦如全祖望所言：“昭德晁氏兄弟大率以文词游坡、谷之间，如补之、咏之，冲之皆盛有名，独景迂湛深经术，亲得司马公之传，又为康节私淑弟子。……但世知推龟山、了翁，而不知景迂更过之。《宋史》乃为补

之、咏之作传，而景迂失焉，陋矣！”指出世人只知杨时和魏了翁而不知晁说之、《宋史》只为晁补之和晁咏之作传而忽略晁说之均是学识浅薄、孤陋寡闻的表现。可以说，通过对晁说之及其经学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方知全祖望所言甚是，晁说之虽不及欧阳修、司马光等人闻名遐迩，然其经学思想亦有其独特价值和意义，故晁说之理应是中国古代经学史上不能忽视的一位学者！

另外，由于本人学识浅薄，对《尚书》及《尚书》学的认识不足，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未对其《尚书》学思想进行分析论述，仅于文中列出其关于《尚书》的著述，期待有识之士的解读。

参考文献

一、古籍

[1]（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2]（汉）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
[3]（汉）扬雄撰，（宋）司马光集注，刘韶军点校：《太玄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
[4]（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5]（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6]（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7]（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
[8]（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9]（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0]（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1]（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2]（宋）司马光著，王永榜等点校：《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年。
[13]（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14]（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15]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16]（宋）苏轼撰，（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
[17]（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18]（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19]（宋）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2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21]（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22]（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四部丛刊续编》景旧抄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年。

[23]（宋）《靖康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24]（宋）余允文：《尊孟辨》，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25]（宋）王应麟：《诗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26]（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27]（宋）陆游：《陆放翁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 年。
[28]（宋）王楙著，王文锦点校：《野客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29]（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30]（宋）晁公武著，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31]尚恒元、彭善俊、尚珊著：《司马光轶事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32]（宋）韩淲、陈鹄撰，孙菊园、郑世刚点校：《涧泉日记·西塘集耆旧续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34]（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
[35]（宋）朱弁：《曲洧旧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36]（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37]（宋）晁说之：《景迂生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年。
[38]（宋）晁说之：《晁氏客语》，长沙：岳麓书社，2005 年。
[3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
[40]（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乐保群、田松青、吕宗力点校：《困学纪闻》（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41]（宋）朱熹撰，廖名春点校：《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42]（宋）司马光著，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年。
[43]（宋）邵雍：《邵子易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
[44]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年。
[45]（宋）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点校：《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年。
[46]（宋）洪迈撰，穆公点校：《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47]（宋）刘敞：《春秋权衡》，通志堂经解本。
[48]（宋）吴仁杰：《古周易》，通志堂经解本。
[49]（宋）蔡节：《论语集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
[51]（元）马端临著：《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
[5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53]（明）马峦、（清）顾栋高著，冯惠民整理：《司马光年谱》，北京 ：中华书局，1990 年。

[54]（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55]（清）范家相撰，钱熙祚点检：《三家诗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56]（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
[57]（清）黄宗羲、全祖望著，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58]（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59]（清）朱彝尊：《经义考》，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
[60]（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61]（清）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
[62]（清）俞琰：《读易举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3]（清）俞琰：《周易集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清）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5]（清）阎若璩：《四书释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今人著作

[1]耿之光、王桂照修，王重民纂：《无极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
[2]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80 年。
[3]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宋代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0 年。
[4]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
[5]彼得、王德毅等：《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台北：鼎文书局，1988 年。
[6]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7]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8]姚瀛艇等：《宋代文化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
[9]方俊吉：《孟子学说及其在宋代的振兴》，台湾：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
[10]谢祥皓、刘宗贤：《中国儒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1]董根洪：《司马光哲学思想述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王兆鹏：《两宋词人年谱·叶梦得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13]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4]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年。
[15]董洪利：《孟子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
[16]姜林祥主编，李景明著：《中国儒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7]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8]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2001 年。
[1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0]钱钟书：《容安馆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21]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22]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 年。
[23]张剑：《晁说之研究》，北京：学苑书社，2005 年。

[24]王铁：《宋代易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25]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26]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 年。
[27]张岂之主编，李似珍著：《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宋元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28]陈战峰：《宋代<诗经>学与理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
[29]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
[30]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1]张岂之主编，朱汉民著：《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2]黄俊杰：《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3]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4]赵生群、方向东：《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二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年。
[35]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36]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37]朱汉民：《宋代<四书>学与理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38]傅璇琮：《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年。
[39]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40]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41]张尚英：《宋代<春秋>学专题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年。
[42]陈来、杨立华、杨柱才、方旭东：《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3]戴维：《论语研究史》，长沙：岳麓书院，2011 年。
[44]周予同：《群经概论》，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
[45]王其俊：《中国孟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年。
[46]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47]俞樟华：《中国学术编年》（宋代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48]李朝军：《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49]王政、周有斌：《古典文献学术论丛》（第 4 辑），合肥：黄山书社，2014 年。
[50]吴国武：《两宋经学学术编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年。
[51]刘云超：《天人之际与易学诠释》，济南：齐鲁书社，2015 年。
[52]夏君虞：《宋学概要》，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 年。
[53]潘雨廷：《潘雨廷著作集》（第 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三、学术论文

（一）期刊论文

[1]王德毅：《宋代澶州晁氏族系考》，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刊行会：《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日本同朋舍，1989 年。
[2]姚瀛艇:《宋儒关于〈孟子〉的争议》，邓广铭、漆侠:《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 年。
[3]傅璇琮、李岩：《宋代诸晁学术考略》，邓广铭、漆侠：《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 年。
[4]顾歆艺：《从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辨>看宋代尊孟非孟之争》，孙钦善等：《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年。
[5]叶国良：《先秦古礼书研究之反思——以晁说之<中庸传>之写作动机与影响为例》，龙宇纯先生七秩晋五寿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龙宇纯先生七秩晋五寿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 年。
[6]夏长朴：《尊孟与非孟——试论宋代孟子学之发展及其意义》，姜广辉：《中国哲学》第 24 辑《经学今诠三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
[7]魏涛：《司马光佚书<《大学》《中庸》广义>辑考》，姜锡东：《宋史研究论丛》（第 14 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 年。
[8]朱天助：《宋代“疑经”与“编古易”问题之辩证——以易经为例》，姜广辉：《朱子学刊》（第 24 辑），合肥：黄山书社，2015 年。
[9]杨世文：《宋儒对<周礼>的考辨》，彭裕商、舒大刚：《川大史学》第 2 辑（历史文献学卷），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0]桂枭：《宋代党争与<诗经>学转型——晁说之<诗经>学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 18 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年。
[11]刘树勋：《孟子研究综述》，《国内哲学动态》1981 年第 6 期。
[12]陈克明：《略论司马光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辑刊》1982 年第 5 期。
[13]刘蔚华：《略论司马光的<潜虚>》，《中州学刊》1984 年第 1 期。
[14]曹锦清:《宋代疑经思潮与理学的形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1 期。
[15]程郁：《求实——司马光史学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天津师大学报》1986 年第 2 期。
[16]吾妻重二：《宋儒晁説之について——考証の学と仏教信仰——》，《东方学》（东方学会）1987 年第 73 号。
[17]杨渭生：《从<疑孟>看司马光的学术思想》，《晋阳学刊》1988 年第 5 期。
[18]江口尚純：《晁說之の詩序批判--王安石の詩經學との關わりに於いて》，《東洋の思想と宗教》1990 年第 7 号。
[19]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 年第 5 期。
[20]陈寒鸣：《宋儒孟子观论述》，《中国哲学史》1997 年第 1 期。
[21]叶福翔：《司马光哲学发展大纲》，《中华文化论坛》1997 年第 3 期。
[22]舒大刚：《试论宋人恢复古周易的重要意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23]夏长朴：《晁说之与<晁氏客语>的关系》，《国立编译馆刊》2000 年第 1 期。

[24]李传印：《历史上的尊孟与非孟思潮》，《文史知识》2001 年第 12 期。
[25]李传印：《孟子在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化》，《中国文化研究》2001 年第 3 期。
[26]龚来国：《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0 期。
[27]雷家圣：《从经学到理学——略论北宋儒学学术取向之转变》，《史耘》2003 年第 9 期。
[28]张剑：《求实与尊古——晁说之学术思想及其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4 年第 3 期。
[29]马纳、马斗成：《宋代澶州晁氏家学试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30]张剑：《晁说之年谱》，《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
[31]孙先英：《<孟子>升经与王安石变法--兼论尊孟疑孟的争论及实质》，《求索》2004 年第 5 期。
[32]郭文佳：《宋代的疑经思潮与<春秋>学的地位》，《中州学刊》2004 年第 1 期。
[33]李朝军：《晁说之年谱简编》，《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六卷第 1 期。
[34]王君萍：《司马光“疑孟”与 余允文“尊孟”之比较研究》，《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005 年第 1 期。
[35]李朝军：《晁氏文人与苏轼交游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36]李祥俊：《北宋诸儒论扬雄》，《重庆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2 期。
[37]何新所：《宋代昭德晁氏家族文化传统研究》，《中州学刊》2006 年第 1 期。
[38]朱汉民：《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湖南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
[39]周淑萍：《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中的四种关键力量》，《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4 期。
[40]李朝军：《论北宋晚期的晁氏家族文学》，《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9 卷第 4 期。
[41]黄夏年：《晁说之与净土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6 卷第 2 期。
[42]束景南、王晓华：《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历史研究》2007 年第 5 期。
[43]郭齐勇：《由“四书学”的形成看儒学的开展》，《中山大学学报》2007 年第 6 期。
[44]周淑萍：《宋代学人对两宋非孟思潮的理论回击》，《现代哲学》2007 年第 5 期。
[45]杨新勋：《论宋儒疑经与文献学发展的关系》，《图书与情报》2007 年第 5 期。
[46]夏微：《宋代<春秋>学述论》，《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47]林素芬：《司马光易学思想蠡测》，《东华人文学报》2008 年第 13 期。
[48]吴国武：《略论北宋经学与儒家诸子学之互动——以经学新变与理学形成为中心》，《孔子研究》2008 年第 4 期。
[49]董锡阁：《简析宋代<春秋>学繁荣的原因》，《安徽文学》2008 年第 12 期。
[50]景圣琪：《宋代晁氏宗族的文学和文献学成就》，《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6 卷第 2 期。

[51]刘京臣：《宋代晁氏家族诗歌特色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6 卷第 3 期。
[52]邓锐：《<春秋>书法对宋代史书褒贬的影响》，《安徽史学》2009 年第 6 期。
[53]许秀文：《宋代<春秋>学研究方法探微》，《广西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2 期。
[54]曹树明、宋锡同：《王弼“卦主说”探微——对<易传>以来“卦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管子学刊》2009 年第 1 期。
[55]孙旭红：《北宋<春秋>学内在理路及历史价值》，《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
[56]孙旭红：《经史观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
[57]孙旭红：《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58]孙旭红：《宋代理学与<春秋>学》，《北方论丛》2010 年第 1 期。
[59]郭晓东：《论司马光“中和”学说及其在道学史上的意义与局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
[60]郭晓冬：《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的诠释：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
[61]段海宝、方国根：《司马光中和思想试论》，《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62]程欣：《晁说之诗歌研究综述》，《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0 卷第 5 期。
[63]郑熊：《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1 卷第 6 期。
[64]吴汉平：《两宋“孟子升格运动”过程中“非孟”思潮论析》，《三峡大学学报》2011 年第 6 期。
[65]刘成国：《论唐宋间的“尊扬”思潮与古文运动》，《文学遗产》2011 年第 3 期。
[66]冯至纲：《<孟子>升格的关键文本——析论宋余允文<尊孟辨>》，《人文与社会学报》2011 年第 8 期。
[67]魏涛、王向辉：《司马光思想研究主要范式的回顾与反思》，《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68]刘红卫：《疑孟派与尊孟派论桓管》，《管子学刊》2012 年第 4 期。
[69]颜复萍：《北宋疑孟思想的探究》，《名作欣赏》2012 年第 5 期。
[70]伍宝娟：《宋代孟子升格运动境域下之苏轼论孟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7 卷第 9 期。
[71]邓锐：《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8 期。
[72]张立文：《司马光的潜虚之学的价值》，《晋阳学刊》2012 年第 2 期。
[73]魏涛：《改革开放以来司马光哲学研究述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4 期。
[74]肖满省：《<古周易订诂>研究》，《周易研究》2013 年第 3 期。
[75]孔卿：《试探北宋非孟者的非孟动机》，《绥化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1 期。
[76]李敬峰、周勤勤：《从胡宏<释疑孟>看两宋之际尊孟思潮的转向》，《齐鲁学刊》2013

年第 6 期。
[77]王瑞升：《论宋代的尊孟与非孟》，《有凤初鸣年刊》2013 年第 9 期。
[78]张钰翰：《北宋扬雄<法言>、<太玄>疏解著述考》，《理论界》2013 年第 7 期。
[79]田小中：《司马光<太玄集注>研究》，《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
[80]吴国武：《五臣解孟子与宋代孟子学》，《国学学刊》2014 年第 3 期。
[81]陆畅：《李觏非孟思想探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
[82]鲍君惠：《略论宋代嵩山的隐士》，《中原文化研究》2014 年第 2 期。
[83]裴亚兵：《李觏、司马光、晁说之疑孟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14 年第 31 期。
[84]裴亚兵：《<嵩山文集>校勘札记》，《琼州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1 卷第 6 期。
[85]王毓：《司马光理学思想特征及其意义探析》，《孔子研究》2014 年第 1 期。
[86]侯道儒：《北宋思想家对于扬雄<太玄经>的看法》，《清华学报》（台湾）2014 年第 4 期。
[87]裴亚兵：《晁说之对王安石新学的批评——以<儒言>为中心》，《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 期。
[88]王治田：《“辩正新学之违僻者”：晁说之<儒言>述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7 卷第 3 期。
[89]王冉冉、邓瑞全：《司马光<潜虚>政治哲学思想初探——以<气图>和<体图>为中心》，《浙江学刊》2016 年第 4 期。
[90]侯道儒：《司马光<太玄集注>中的君子与小人》，《台大历史学报》2016 年第 58 期。
[91]连凡：《论<宋元学案>对朔学的诠释与评价——以司马光及其弟子刘安世、范祖禹、晁说之为中心》，《保定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0 卷第 6 期。
[92]吕继北：《晁说之与佛教僧人交游考》，《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 年第 5 期。
[93]连凡：《全祖望对司马光及其弟子思想的诠释与评价——以<宋元学案>为中心》，《焦作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
[94]殷慧：《宋代礼、理融合视野下的<中庸>诠释》，《哲学研究》2018 年第 5 期。
[95]郭畑：《从宋人关于扬雄仕莽的争论看忠节观念的强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96]刘成国：《宋代尊扬思潮的兴起与衰歇》，《史学月刊》2018 年第 6 期。
[97]张杰、韩括：《浅析司马光理学探索与诗歌创作》，《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二）学位论文

1. 博士论文

[1]蔡根祥：《宋代<尚书>学案》（博士学位论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1993 年。
[2]许维萍：《宋元易学的复古运动》（博士学位论文），东吴大学，2001 年。
[3]郝佳敏：《宋代<诗经>文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2 年。

[4]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4 年。
[5]张剑：《宋代晁氏家族与文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 年。
[6]杨世文：《宋代经学怀疑思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5 年。
[7]王晓薇：《宋代<中庸>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05 年。
[8]滕春红：《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6 年。
[9]郑熊：《宋儒对<中庸>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7 年。
[10]邵明华：《邵雍交游研究——关于北宋士人交游的个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 年。
[11]孙旭红：《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 年。
[12]张钰翰：《北宋新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 年。
[13]鲍君惠：《宋代嵩山人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4 年。
[14]程建：《回归与重构——宋代<诗经>诠释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5 年。
[15]包米尔：《司马光哲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7 年。
[16]高华夏：《理学视域下的北宋<中庸>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7 年。

2. 硕士论文

[1]施辉煌：《王安石与北宋<孟子>学》（硕士学位论文），国立成功大学，1999 年。
[2]刘京臣：《宋代晁氏家族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鲁东大学，2007 年。
[3]周君芸：《邵雍弟子考》（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2007 年。
[4]李立红：《宋儒关于<诗序>问题的争议及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7 年。
[5]孟耕合：《北宋<中庸>之“诚”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9 年。
[6]陈伟：《宋代晁氏家族散文史论》（硕士学位论文），鲁东大学，2009 年。
[7]方丽：《邵博<邵氏闻见后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1 年。
[8]王健：《朱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1 年。
[9]李妍：《司马光儒家哲学思想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2 年。
[10]岑贞霈：《宋代疑孟索考》（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4 年。
[11]裴亚兵：《晁说之专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5 年。
[12]张庆研：《晁说之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7 年。

附录

附录 A 晁氏《古周易》部分辑佚

《郡斋读书志》载“晁以道《古易》十二卷”[①]；《直斋书录解题》载“《古周易》八卷”[②]；《文献通考·经籍考》载“晁以道《古易》十二卷”，后又有“并十二篇为八篇”[③]的记载；《宋史·艺文志》载“晁说之《录古周易》八卷”[④]等等。然晁氏《古周易》已亡佚，故从后世关于《周易》的著述中加以辑录，由于文本内容较多，所以主要从朱熹《周易本义》、俞琰《周易集说》、熊过《周易象旨决录》、胡广《周易大全》中进行辑录，朱熹《周易大全》用中华书局 2009 年版，而《周易集说》、《周易象旨决录》、《周易大全》皆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中，从《周易本义》中辑出 6 条，从《周易集说》中辑出 19 条，从《周易象旨决录》中辑出 29 条，从《周易大全》中辑出 18 条，共 72 条。今按《题古周易后》所载“《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进行排列。

卦爻一

（讼卦）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褫，康成本作拖。晁以道曰：如拖绅之拖，乃得象意。（《周易象旨决录》卷一）

（师卦）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周易本义》卷一）

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周易大全》卷四）

（小畜卦）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晁以道曰：血，古文“恤”字，忧也。（《周易象旨决录》卷一）

---

①（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43 页。

②（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2 页。

③（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六《经籍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523 页。

④（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百零二《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5038 页。

（豫卦）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晁景迂曰：古冠礼未有簪名。冠簪之训至侯果始有之耳。（《周易象旨决录》卷二）

（复卦）六三，频复，厉，无咎。

频，郑氏作卑。晁以道曰：卑，古文“频”字，今文作“颦”。（《周易象旨决录》卷二）

（坎卦）《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郭京举正及晁氏所载徐氏语皆云：“习”上脱卦名“坎”字。然景迂谓古文不脱。（《周易象旨决录》卷二）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险，古文。郑向本作检，郑云：木在手。晁氏谓象数合。（《周易象旨决录》卷二）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晁氏云：先儒读“樽酒簋”为一句，“贰用缶”为一句，今从之。（《周易本义》卷一）

《本义》：“晁氏云：‘先儒读“樽酒簋”为一句，“贰用缶”为一句。’今从之。”（《周易大全》卷十一）

（离卦）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晁景迂曰：无“凶”字者，得象数。（《周易象旨决录》卷二）

（大壮卦）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晁以道曰：易，古文疆场字，与象数合。（《周易象旨决录》卷三）

（明夷卦）（明夷卦）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晁氏曰：约周髀而言当作股。（《周易象旨决录》卷三）

（损卦）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弗损，晁氏客语为读者，是初九之遄往，迹与心合，故曰尚合志。（《周易象旨决录》卷三）

（姤卦）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晁以道曰：苍颉篇柅作檷，柮也，巽为绳之象。（《周易象旨决录》卷三）

（升卦）九三，升虚邑。

晁以道曰：四邑为丘，四丘为虚，非空虚也。（《周易象旨决录》卷三）

（井卦）九五，井洌，寒泉食。

嵩山晁氏曰：井者，阴之质也，故静而虚；泉者，阳之用也，故动而实。（《周易大全》卷十七）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汲取也。晁氏云：收，辘轳收繘也。（《周易本义》卷二）

收，虞翻指鹿卢收繘者，晁氏依之。（《周易象旨决录》卷四）

晁氏云：收，鹿卢收繘者也。（《周易大全》卷十七）

（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晁氏曰：“形渥”，诸本作“刑剭”，谓重刑也，今从之。（《周易本义》卷二）

《本义》：“晁氏曰：‘“形渥”，诸本作“刑剭”，谓重刑也。’今从之。”（《周易大全》卷十八）

（渐卦）六三，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据晁氏“磐”作“般”。（《周易象旨决录》卷四）

（丰卦）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虽，晁以道云：当作“惟”，古文本作“惟”。（《周易象旨决录》卷四）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晁以道曰：主，古文“斗”字。（《周易象旨决录》卷四）

（旅卦）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琐，今按晁以道云：琐琐，玉声，亦小石意。（《周易象旨决录》卷四）

（中孚卦）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几，郭京作近，孟、荀、一行作既……晁以道曰：古文读近为既，《诗》“往近王舅”是也。（《周易象旨决录》卷四）

彖二

（讼卦）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

嵩山晁氏曰：上以刚陵下，下不险，则未必讼。下以险陷上，上不刚则未必讼。外健而内不险，未必生讼。内险而外不健，未必能讼。（《周易大全》卷三）

（比卦）比，吉也。

嵩山晁氏曰：王昭素谓多此“也”字（《周易大全》卷四）

（同人卦）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 唯君子为能

通天下之志。

传此三字（同人曰）羡文，本义衍文。嵩山晁氏曰：按虞翻诸儒无一人为之说者，特王弼失之耳。《周易大全》卷六）

（豫卦） 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嵩山晁氏曰：刚应志行，以爻言豫之才也。顺以动豫，以卦言豫之德也。：（《周易大全》卷七）

（观卦）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

晁曰：当无以字（《周易象旨决录》卷二）

（升卦）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嵩山晁氏曰：或谓《彖》主三阳，言五“井洌，寒泉食”是阳刚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不食”是水未见于用，未有功也。二“瓮敝漏”是既不得水并其瓶而亡之，羸其瓶，而凶者也。（《周易大全》卷十七）

（革卦）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晁以道曰：兑无为水之义，必字误（《周易象旨决录》卷四）

（艮卦）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晁氏云：“艮其止”，当依卦辞作“背”。（艮其背）（《周易本义》卷四）

嵩山晁氏曰：只当依卦辞作背。（《周易集说》卷十八）

晁氏谓“依卦辞作背”是也。（《周易象旨决录》卷四）

晁氏云：艮其止，当依卦辞作背。（《周易大全》卷十八）

（归妹卦）无攸利，柔乘刚也。

嵩山晁氏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阳居阴，有男以不正从女之象；三五以阴居阳，有女以不正从男之象，行皆失正。故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妇，妇制其夫之象，故为无攸利也。（《周易大

全》卷十九）

（巽卦）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晁以道、徐氏新义“申命”之下有“命乃行也”一句误写入。（《周易象旨决录》卷四）

（既济卦）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嵩山晁氏云：济下脱“小”字，当作“既济小亨，小者亨也”。（《周易集说》卷十九）

嵩山晁氏曰：孔氏《正义》亦谓合有两小字。（《周易大全》卷二十一）

象三

（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嵩山晁氏曰：天行健当作天行乾。（《周易集说》卷十一）

健，依晁氏作乾。（《周易象旨决录》卷一）

（泰卦）九三，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东莱吕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际也。今本作无往不复。晁氏云：宋襄本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大全》卷五）

（谦卦）上六，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嵩山晁氏曰：多国字（《周易集说》卷二十一）

（临卦）九二，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胡安定晁景迂冯厚斋曰：未，羡文，不达爻义。（《周易象旨决录》卷二）

（坎卦）（坎卦）　六四，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本义》：“晁氏曰：‘陆氏《释文》本无贰字。’今从之。”（《周易大全》卷十一）

（益卦）上九，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偏辞虞孟作偏晁本从之（《周易象旨决录》卷三）

（井卦）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释文》云：“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嵩山晁氏曰：王昭素云“成”字诸本或有或无。（《周易集说》卷十三）

（归妹卦）初九，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嵩山晁氏曰：孟氏京氏无此“以”字（《周易集说》卷二十五）

（小过卦）（小过卦）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嵩山晁氏曰：“恭过则伪，哀过则毁，俭过则陋，而君子以之者。盖有为而为之，将矫之以为中也，时有举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矫之以循墙；时有短丧之宰予，故高柴矫之以泣血；时有三归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矫之以弊裘。虽非中行亦足以矫时厉俗也。（《周易大全》卷二十一）

文言四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晁云：“疑”，古云“凝”字是也。（《周易象旨决录》卷一）

系辞五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嵩山晁氏曰：姚信谓“能”字当作“从”。（《周易集说》卷二十八）

姚信、晁说之皆曰：“能”当作“从”。（《周易象旨决录》卷五）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嵩山晁氏曰：“而成位乎其中矣”，王肃作“《易》成位乎其中矣”。（《周易集说》卷二十八）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晁景迂云：体用本乎释氏，圣人未尝有体用并言者。（《周易象旨决录》卷五）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

嵩山晁氏曰：易字陆音容易，韩音变易，今从韩。（《周易集说》卷三十一）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释文》仁作人……嵩山晁氏东莱吕氏皆从释文。（《周易集说》卷三十二）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嵩山晁氏曰：“服”字，《说文》作“犕”音备。（《周易集说》卷三十二）

说卦六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晁氏曰：荀爽、《九家》、《集解》干为龙。陆德明《释文》喻阳气也。（《周易象旨决录》卷七）

乾……为良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晁以道曰：驳马其九四乎。（《周易集说》卷三十八）

序卦七

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嵩山晁氏曰：先儒说蒙为微昧闇暗弱之名，得于微弱，而失于昧暗矣。若蒙之名义在乎昧暗，则屯之草昧，已兼乎蒙矣。（《周易集说》三十九）

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

嵩山晁氏曰：案王辅嗣《略例》所引，下有“履者，礼也”一句，误入注中。（《周易集说》（卷三十九）

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晁氏云：郑无“而泰”二字。（《周易本义》卷十一）

朱子曰：“晁氏云：‘郑氏本无而泰二字。’”（《周易集说》卷三十九）

《本义》：“晁氏云：‘郑无而泰二字。’”（《周易大全》卷二十四）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

嵩山晁氏曰：郑本作“物不可终久于其所”。（《周易集说》卷三十九）

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嵩山晁氏曰：《未济》之终，复始于《乾》、《坤》。《玄》以《将》准《未济》，曰：阴气济物乎上，阳信将复始乎下。明此理也。（《周易集说》卷三十九）

杂卦八

丰多故也。亲寡旅也。

嵩山晁氏曰：荀本“丰多故亲”为句，无“也”字。下云“寡旅也”。（《周易集说》卷四十）

嵩山晁氏曰：“丰多故”今本有“也”字，按荀本无之。（《周易大全》卷二十四）

《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嵩山晁氏曰：郑本“忧”作“消”。（《周易集说》卷四十）

附录 B《论语正义》辑佚

《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元学案·景迂学案》《经义考》以及《嵩山文集》中所附晁公祖的《题嵩山景迂生文集后》、子健所作的跋均对晁氏《论语正义》有所记载，其中，《题嵩山景迂生文集后》和《宋史·艺文志》标为“五卷”，《郡斋读书志》和《文献通考·经籍考》标为“十卷”，《经义考》中记有“宋志五卷，通考十卷”，其余各书未标卷数。晁氏《论语正义》已亡佚，现从朱熹《论语集注》辑出6条，从蔡节《论语集说》中辑出2条。《论语集注》选用《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论语集说》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里仁第四

4·12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景迂晁氏曰：依于义而行则此既宜之故无所怨；依于利而行专利于此贻害于彼，不胜怨也。（《论语集说·里仁》）

述而第七

7·34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晁氏曰：当时有称夫子圣且仁者，以故夫子辞之。苟辞之而已焉，则无以进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将使圣与仁为虚器，而人终莫能至矣。故夫子虽不居仁圣，而必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处也。（《论语集注·述而》）

7·36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时之弊也。（《论语集注·述而》）

景迂晁氏：此夫子救时不得已之言也。（《论语集说·述而》）

泰伯第八

8·13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晁氏曰：有学有守，而去就之义洁，出处之分明，然后为君子之全德也。（《论语集注·泰伯》）

乡党第十

10·5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

循。

享礼，有容色。

私觌，愉愉如也。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间绝无朝聘往来之事。疑使摈执圭两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如此尔。(《论语集注·乡党》)

10·27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晁氏曰：石经“嗅”作戛，谓雉鸣也。(《论语集注·乡党》)

颜渊十二

12·4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晁氏曰：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故无入而不自得，非宾有忧惧而强排遣之也。(《论语集注·颜渊》)

附录 C《中庸传》中直谓诚、明、忠恕、礼等为中处

《中庸传》存于《嵩山文集》卷十二中，本次辑录内容以《嵩山文集》四部丛刊续编影抄旧本为底本，以《景迂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景迂生集》摛藻堂四库荟要本加以参校。

诚为中处：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者何？中也，诚也。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而不能载焉。语小，天下而不能破焉”者何？中也，诚也。语夫天下莫能事之大，则其大者，诚也。语夫天下莫能分之小，则其小也，诚也。盖虽大而中也，其小亦中也。人谁有憾于予哉？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者何？中也，诚也。教之所以为教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者何？中也，诚也。道之所以为道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者何？中也，诚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者何？中也，诚也。

“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者何？中也，诚也。

“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诗》曰：‘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者何？中也，诚也。

“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者何？中也，诚也。

明为中处：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者何？中也，明也。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何？中也，明也。

“《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者何？

中也，明也。

忠恕为中处：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者何？忠恕之为中也，均率是性，而为道莫之或远也。远于人则可须臾离也，以其不远人，而忠恕之名立也。为人父而忠恕，则已与一家去道不远也。为人君而忠恕，则已与天下国家去道不远也。忠恕以人治，人犹己，肫肫其中也。

礼为中处：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者何？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政犹地道之勉乎。树艺稼穑也，中庸之政，感人心而迹自化，蒲庐之比也。仁义者，诚明之异名也，仁义合而礼生焉。礼也者，广骛驰骋于仁义之中者也。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个人简历：

张文娟，女，汉族，1995 年 4 月生，山东泰安人。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就读于菏泽学院，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17 年 9 月至今就读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师从魏涛老师，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史，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张文娟：《北宋：嵩阳书院发展的关键时期》，《华夏文化》2019 年第 3 期。

张文娟：《司马光和晁说之学术渊源考——以对扬雄的态度为对象的考察》，《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 年第 9 期。

致谢

寒来暑往，四季更替，三年转眼即逝，距离离开郑大的时间愈来愈近，这三年所发生的事情如电影般在脑海中放映，犹记 2017 年 3 月复试期间首次踏入郑大校园时是在导航的帮助下才找到历史学院，如今历史学院已成为我在郑大最熟悉的地方之一。在郑大遇见了一群可爱的人们，他们是我在郑大期间最大的收获，此刻，无尽的感激之情涌上心头。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魏涛老师。我生性愚钝，幸而魏师不弃得以入其门下，魏师对待学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他悉心指导下我的大小论文才得以完成，印象最深的是 2018 年 9 月魏师赴台湾交流，在百忙期间仍留意与我论文相关的资料并传送于我。除了在学业上给予的指导外，魏师还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分享给我们，希望我们少走弯路。可以说魏师不仅仅是我的学术导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他给予的帮助不是用这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尽的，他的这份恩情，我定牢记于心，时刻铭记。

其次感谢历史学院的老师们。感谢论文答辩组各位老师在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和答辩中提出的各种宝贵意见，感谢每一位任课老师在课堂上精彩的讲解，感谢学院其他老师和辅导员给予的帮助。还要感谢小萍师姐将学习和生活经验全部毫无保留的分享于我，感谢同门中亚、宁宁、莹莹和室友小静、文杰、思宁以及师妹师弟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一路走来所有给予关心和爱护的亲人朋友们！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不辞辛苦将我养大，感谢他们为我营造的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感谢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感谢他们允许我任性。

一路同行，感恩遇见。

张文娟

2020 年 6 月 9 日于半解堂